

# 蘇聯經濟

# 新論

附：蘇聯資本主義  
義化問題論戰

英·多布教授著

梁純夫譯



生活書店發行

# 蘇聯經濟新論

英·多布教授著

梁純夫譯

生活書店發行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五月

# 蘇聯經濟新論

著者 英多布教授

譯者 梁純夫

發行人 徐伯昕

生  
重慶·上海  
活書店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五月版

## 譯者序

關於蘇聯經濟，國內曾有過不少長文和專書的介紹。但是我總覺得這些文字常常偏重於整個體制的兩極端：一端是社會主義制度的條文，另一端是「五年計劃」的數字成果。其實，從制度到計劃的成就，中間是經過一連串適應和實踐過程的。而我們所需要了解和學習的，正是這種適應和實踐過程。即使瓦爾加的「兩種制度」也未能免去上面所說的缺陷，這一缺陷，希望能夠因本書的出版而得到一點補足。它很少列舉「五年計劃」所成就的數字，也從未提到制度的條文。它所專注的是蘇聯經濟計劃的產生，成長，以及它在實踐過程中對現實的種種適應。就在這純客觀的敘述中，作者指出社會主義經濟和資本主義經濟的基本差別，而駁斥了若干人們的曲解。

蘇聯抗拒納粹侵略的耐力以及紅軍在東線的輝煌成就改變了人們過去對它敵視或藐視的觀念；而在這當中，却又出現了種種對於它的曲解和幻想。早在紐約時報登載列斯納的文章以前一年多，倫敦泰晤士報便常常有一些通訊說到蘇聯已走向資本主義的道路。他們也有工資差別啊！他們也有財政問題啊！他們也有市場問題啊！他們也有賦稅制度啊！本書寫作的動機，也就是為針對這種誤解而加以辨釋。其中有幾章，是根據於在倫敦「英蘇協會」的演講擴大而成的。作者莫禮士、多布（Maurice Dobb）是英國劍橋大學經濟學教授，在本書前，曾著有「革命以後的俄國經濟發展」，「政治經濟學與資本主義」，「工資論」，「蘇聯經濟與戰爭」等書。最近又寫了一本書叫做「蘇聯的人民和生計」，聽說是專為盟國人士瞭解蘇聯而寫的，已由朱葆光譯成中文，重慶中外出版社印行。

這薄薄的小冊，我在今年春初便開始翻譯，經過幾次長期間斷，直到這淫雨的秋末才整理完成；可是也因此有機會作了再三審慎的校改。而在這期間，重慶輿論界又曾爆發了一次關於蘇聯經濟制度的小爭論，那是由列斯納在紐約時報發表的文章引起的。這次爭論的主題，正是本書要解答的問題。因此乘本書出版之便，把這些文章搜集起來，附在本書後面，也許能幫助讀者對蘇聯經濟制度作更深入的瞭解。

本書中有一些術語，是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在實踐過程的產物：如「基本建設」，「基本投資」，「管制數字」，「計劃成本」，「計劃利潤」，「流通稅」，「成本價格」，「對內合作社」……，在翻譯時頗費躊躇。在這方面，應該特別感謝吳清友兄的奔走查攷。這些術語，本來想在這裏逐一加以解釋，但恐怕解釋不充分，反把它們歪曲了。讀者如從書中細心尋繹，并參考同類的著作，也許更能領悟它們的真義。本來，要認識蘇聯經濟的全貌，單靠這小冊是遠不夠的。

附載各文，承「大公」「新華」兩報及「文匯」「文協」，「中蘇文化」等編輯部允許重刊，併此致謝。

純夫誌。

一九四四年十月重慶警報之夜。

# 蘇聯經濟新論目次

譯者序

第一章：蘇聯經濟計劃發展的路向	(一)
第二章：蘇聯爲什麼也有財政問題	(二八)
第三章：勞動自發性與工資差別	(四四)
第四章：戰時經濟動員	(七〇)
附錄：蘇聯資本主義化問題論戰	
一、共產主義教條的基本修正(列斯納)	(八六)
二、蘇聯的新資本主義(紐約時報)	(九〇)
三、亨利·明斯致紐約時報編者的信	(九二)
四、駁所謂共產主義教條的基本修正(戈寶權)	(九四)
五、認識蘇聯(公孫慶)	(一〇八)

- 六、認識與幻想(梁純夫)……………(一一三)
- 七、蘇聯的革命是否已經完結(杜蘭第)……………(一一八)
- 八、蘇聯資本主義化了嗎(斯蒂芬斯)……………(一二三)
- 九、蘇聯是否將轉變到自由企業制度(約翰斯敦)……………(一二六)
- 十、關於講授政治經濟學的幾個問題(里昂諾夫等)……………(一二九)
- 十一、關於「蘇聯立國精神」答客問(孫科)……………(一六六)

## 第一章 蘇聯經濟計劃發展的路向

人們有時會碰到這樣的言論，認為「利潤心」在蘇聯經濟制度中仍然扮演著顯要的角色；從這出發，似乎要說這一制度和我們（英國；以下凡提及「我們」或「我國」均指英國——譯註）自己的本質上類同了。不過，作這種論調的人常常顯露出這是意味着金錢的動機在生產工作上依然是顯著的一個。換句話說，他們是把「利潤心」和金錢的動機當作意義相同的詞兒使用。可是，把作為「工作」報酬的工資或薪水和作為資本家「廠主」的收入的不同意義的利潤混為一談，必然是故步自封的；并且，如像泰晤士報上最近一些關於「利潤心」的通訊所暗示，可以引出一大堆廢話來。蘇聯經濟和別國的資本主義經濟的基本差別是，在決定工業政策上——在決定出產和投資以及出售的方向和體積上，個別商行或商人的利潤高度化不再是決定的因子。在別的地方由千百個獨立的「廠主」的各自主意所決定的事情，在蘇聯經濟中是由構成經濟計劃的決議的一個單一的一致的複合體所決定。這一差別又和另外一個關連着：即是在蘇聯，土地和資本是社會的而不是私人的所有這一事實。這樣，不單國家對於全部生產裝備有完全的支配權，并且由所有權獲得的利潤或其它收入都不能作為一種收入範疇而存在（它是否作為國家各不同部門活動之間的財政關係的一種會計範疇而存在，那是另外的問題）。國家因此能夠由直接的而不只是間接的干涉來控制生產資財的使用；而個人的收入便完全等同於工作所得，依照着所做工作的總量和種類而差分。收入的差別是存在的，但在程度上自然遠比由於



財產私有所生的收入差別較小；并且沒有兩種收入來源，由於社會的或階級的差別所致，而只有一種。

無疑地，對於這些說法也有例外的地方。一個合作集團（不管是從事於製造傢具，刻木或修鞋的工匠合作，或者是一個集體農場）的生產裝備不是由國家直接支配的，至少不是像對國家工業的裝備那樣程度。不過這種團體的自治權只限於它們藉以登記的一定法令所規定的範圍內（類似於我國的共濟會和綜合大學），而如像我們將來所講到的，它們和國家之間已經有了某種經濟關係的形式被發展着，使它們的活動能夠配合於一個總的經濟計劃。此外，這種集合團體的份子的收入代表着這團體的活動所得的均攤，而不是嚴格意義上的工資。不過，因為這種合作社紅利的分派是根據於每一個人對共同利益所作作的貢獻，它比較上最近似於工資，而沒有那樣近似於別的什麼。（註一）再則，無疑地這裏還有個別農民耕種者的舊階級的殘餘；而任何公民都可以從他投入國家公債的錢上得到利息的收入。不過，個別農民的舊階級的殘存者是相對地那樣少（他們大約有一百萬多，而佔有土地不到已耕地的百分之一），簡直不值得重視；而一個平常的工資或薪水收入者從他的公債所有權上所得的進項不會超過他的工資或薪水的百分之四或百分之五，即使最大的所有者也很難超過他的收入的百分之二十五。

因為決定蘇聯經濟政策的是經濟計劃，而不是各別商行或「廠主」的個別主意，因此這一經濟制

〔註一〕參看作者所著「蘇聯經濟與戰爭」一書第七章。集體農民也可以從他被容許有的自己的農場建築物或分地的生產品上得到一些收入；這種出產品可以在家裏消費或在當地「集農市場」出售。但是因為這種建築物或分地每處只以兩英畝為限，它們的相對重要性是不怎樣值得重視的。

度各不同部門之間的基本連繫不再是通過市場，和通過市場上價格變動的媒介，而是包含在計劃中的各不同工業出產程序之間直接連繫。我們在本國所熟悉的經濟制度中，經營的決策是基於於價格的預期（它們不純是慣例的結果）；基於於在這事情之後市場將要顯示怎樣的情形的猜測。當前的協調是由價格變動的實效所形成，這種變動是緊隨着生產和投資的具體行為中實際上所採取和體現的決策而起的，同時它們又引起對原來行動的修正（通常只是在一段遲滯的時間後才發生，而這時間的長短是決定於所下的投資的性質和它的附帶的約束）。在蘇聯的計劃制度中，各不同工業的生產決策的協調是由這些決策所控制的生產和投資的具體行為事先做好的。個別工業以及它們內部的構成部門將企劃它們自己部分的計劃，正如我國的個別商行所做的一樣。但是除非這些計劃已經被交織入全國的統一經濟計劃中，也許在執行的過程中被加以調整和修正，它們是不發生實效的——除非它們已經和所有其它部分的計劃協調一致，它們是不會在行動中體現的。經濟學者們曾論及的經濟學上的「試驗與錯誤」的過程大體來說不是發生於生產的任務已經被規定之後，而是發生於與那計劃有關的生產活動開始之前。這種事先計劃好的協調一致是否成功顯然將依靠於兩件事情：各不同部分的計劃所根據以構成的估計的完全性和真實性，以及中央設計當局在每一有關特殊體中協調那計劃的各不同部分而使它們構成一個完善的整體的能力。換句話說，它將依靠於這計劃與經濟現實的外在符合和依靠於它的各因素的內在聯貫。因為最好的計劃也似乎不會達到百分之百的完善，由於客觀的或主觀的原因——因為有些事情如自然的變幻等，是永遠不能夠預見的，同時因為所有的人類制度都有弱點——如果一種計劃經濟要避免過期的停滯，混亂和波動，是需要一個第三種條件的。它必須準備對這制度的各個特殊點作隨後的調整和修正，以適應不可預見的偶然事件，同時又要使這種修正的實行盡量避免妨礙

這制度中其它部分的活動。這，如我們將要說到的，部分是行政處理的適當伸縮性的問題，和部分是經濟問題，例如資源的動員和貯備的存在等。解決這些問題的能力不是一夜間能夠發展出來的事情。有利於它們的解決的條件也許不常常是存在的和也許是需要發展的。在開頭的時候，要把擺的問題的具體形態也許只是被模糊地知道，甚或完全不了解。在設計當局甚至能夠知道什麼問題應該發問，什麼材料對於它的決策有關，和當這些材料被搜集起來時怎樣處理它們，在這些之前，一種從經驗中學習，製出不完全的計劃和從初步的錯誤中學乖的過程，也許是必需的。此外，構造一個計劃是比之控制它的執行較易的；而除非能夠控制它的執行，人們很少有機會解決上面所提到的第三種型的問題；隨後的調整和修正以適應未被預見的或不完全地預見的偶然事件。斯大林有一次會說（在第二次五年計劃的最後第二年中）：『只有官僚們才可以認為計劃是以計劃的製成而完結。計劃的製成只是開頭；具體的計劃的方向只有在它的製成之後，在這計劃已經在它的完成過程中被試驗過之後，在它已經被修正過而變為更確實的之後，才是開始的。』

在「新經濟政策」的初年，在二十年代，蘇聯計劃機構便已經種下它的根源和渡過它的初步學程。這是在戰爭和內戰的破壞之後一個恢復的時期，而還不是一個新建設的時期。此外，它又代表着一個過渡的時期，當時社會主義的因素跟小規模的農民農業，包括了已耕地的十分之九以上，以及某種數量的私營貿易，躉售和零賣的，同時併存着。這種私營貿易大多數是極小規模的；其中大多數是行商和市場小販。可是在二十年代的初年它也佔有了貿易總額的一半以上。在二十年代的中期，這比例便降減了；而蘇聯政府常常藉着它對於大規模工業，金融和運輸的所有權來控制經濟體系中的「司令臺」。不過在整個經濟中工業仍然缺乏優勢的比重；而由於重工業的薄弱，它發展的可能性也有

限。在這種條件之下，作為整個體系的任何綿密計劃的基礎是很薄弱的。工業和農業之間的聯繫主要是通過市場；而這一個關係表現於農民和社會主義化工業工人之間的就是列甯認為這一時期的特徵的工農聯盟。結果是，生產的總量，農民在第一步所種栽的，和在第二步當收穫後拋進市場的，無論自己消費它或存儲在倉庫裏，是依靠於流行的價格和預期的將來價格；依靠於一種收穫對於別種收穫和對於農民也是消費者之一的工業製品的相對價格。政府可以用多種方法影響農業：例如，用關稅政策或購買政策。但是這樣做必須是間接地通過它對市場和價格結構的影響；而在這裏國家貿易機關所能加於要入市場的牛產總量的影響是受看極大限制的，和私營貿易者的競爭完全不同。政府無能直接計劃農業的生產；因此工業計劃不能建立在糧食供應和原料供給的任何確實已知數上。相反地，這些事情只能作粗略的估計，不單聽命於天氣的無常和它對於收穫量的影響，並且還要聽命於農民對於市場情形的極端無常的反應——這種反應通過它對於市場的交互影響甚至可以開始某種累進的運動。在新經濟政策時期的某些年間，市場上農業供應對於價格變動的反應會表現得非常銳敏。由於每年農產品供應是一個知道不全的因子，農村對於工業貨品的需求數量也同樣算不出來，這數量的不確定又影響了都市的需求結構（除了基本食料的需要）以及工業的和出口的原料的供應，因而使工業的和進口的程序都變成不安定。一九二三年那有名的「剪刀危機」（這樣稱呼是因為工業的和農業的價格之間的廣泛擴張，而發展和脅迫成一種工業的銷路危機），雖然被運用一種降低工業的和提高農業的價格的壓力迅速地克服了，實是一種可能發生的不可預見的混亂局面的徵兆。在以後幾年中，一個更進一步的擾亂因子便大顯身手了。那些富農們，雖然數目很小，並且他們所擁有的土地面積總數從全體比較起來更見渺小，却控制着入市農產品的一個不相稱的大部分，因為他們是較大的農戶，能夠主要是為市

場而生產，除了他們自己和他們家屬的半活需用外還有大量的剩餘，而小農則除了生活需用外只有極少的剩餘，甚至完全沒有。國家收購機關因此發現它們而對着一個受這種初期資本家的小社會集團有力地影響着的市場，他們并且藉着一種不自覺的互相串通，常常能夠使市場轉向於對他們自己有利；（註一）而在一九二七—八年中，工業和農業關係上某些新的困難便加強了計劃，特別是基本投資和工業化的龐大計劃在新經濟政策這一時期的條件下推行的制限。

計劃機構的發端一般認定是從一九二〇年二月開始，當時，還在內戰和干涉戰爭的砲火平息之前，「國家電氣化委員會」便在列寧的創議之下成立，以列寧的老黨友克爾西沙諾夫斯基工程師爲主導。這機構被付託以準備一種計劃使全國在十五年內電氣化的任務。在這以前，曾有多種這類或那類的計劃委員會附屬於控制工業的機關「最高經濟會議」之下。不過這些計劃只是部門的計劃；它們之

〔註一〕尤其是在一九二六和一九二七年，富農們每在收割後向貧農和中農購去穀物（他們常常無力運送他們的穀物到市場去，並且多數是早已把穀物抵押掉的），並不賣給國家收購機關，却囤積起來直到農業年度的末尾（即下年的春季或夏季，在下次收割以前）造成缺乏以提高穀物的價格。有着一些資本，他們便能夠囤積起來而等待着，貧農却不能這樣做。這一行動并不如最初所想像的那樣使這一年的豐腴月份和瘦削月份的價格歸於齊一。由於都市儲存的不多，如當時的實際情形所示，國家收購機關在秋季和冬季買入的不足使它們在春季收集供應品的急切需要更爲緊強，因而迫成了收購價格高漲到饑荒的水平。甚至鄉村的貧農們也常常願意用漲大了的價格買回他們去秋作抵押品賣給富農的穀物。在一九二六年下半年，政府決心摧毀這種富農的壟斷；他們實行禁止穀物的私人貿易，并嚴格控制收購機關所出的買價，以防在春季或夏季爲獲得供應品而出任何高價。這一行動成功了。但是在下一年度，在一九二七年，雖然在秋季和春季的期間有意增加了運送給穀物區的工業製品的總量，穀物的收集却比上年少了百分之十五。

間很少合作；當時也沒有原料，穀物或燃料的貯存；計劃者們大多是在黑暗中摸索；而使他們的紙上計劃釋成行動的機構也極稀罕。決定的步驟是始自第八次蘇維埃會議議決成立一個叫做「勞動與國防會議」的機關，在經濟領域有着最高執行權——一種「經濟內閣」，不僅經營着工業（如像「最高經濟會議」以前所做的），並且牽涉到全國經濟活動的所有部門。一九二一年二月一日，「國家電氣化委員會」被擴展為「國家計劃委員會」。這是一個咨議機關，而不是執行機關。它直屬於「勞動與國防會議」，向它報告所有有關經濟活動的人民委員會和各部門的計劃（應注意的是，也包含財政人民委員會或「國庫局」）。設立這新機關的法令第一條說明，它是要配合「勞動與國防會議」而「在第八次蘇維埃會議所認可的電氣化計劃的基礎上共同研究出一種全國性的統一經濟計劃，并對這計劃的執行作總監督」。克爾西沙諾夫斯基由「國家電氣化委員會」的主席變為「國家計劃委員會」的主席，而前者的工作人員也大多數併入這新機關。計劃委員會的全部人員最初只有四十人，主要是經濟家和工程師。到一九二三年，經過進一步的改組之後，它的工作人員已增加到三百。在一九二五年，「國家計劃委員會」的分支部已在各共和國，分區和省區建立了起來，連繫着和附屬於母體機關。

當時關於這常常被稱為「經濟參謀部」的正確職權問題曾有許多爭論。托洛斯基堅持它要被賦與執行權。列甯雖然是它的創立者，却反對這，因為他看到一個專家團體和一個政治機關——一個必須同時執行和立法的國家最高機關——的職權混亂的危險。把議決案定為政策和發佈法定命令的權力因此仍然屬於「勞動和國防會議」。不過，一九二三年黨的一項議決案認為有把下面的原則制成本法令的必要，即：『凡有普通重要性的國家經濟問題，非經「國家計劃委員會」通過。高級機關不能加以決定。各級經濟團體在執行議決案時如企圖隱瞞「國家計劃委員會」必受處分。』這機構成立後幾個

月，關於一種統一的經濟計劃的真實含義，以及它和特殊部門及各別工業的部分計劃之間的關係，曾有熱烈的討論。在對一個新組織的訓話中（一九二一年五月十六日），列寧宣稱，在他們的計劃製作中他看不到任何統一原則的跡象，他們似乎是採用着同時使一切事情完善的方法，而沒有研究出那件事情是依靠着什麼，因以建立一種按部就班的連貫體系。他極力主張要採取嚴肅和合方法的程序，並提示當前的任務應該是為下兩年的經濟研究出一個暫行性的一般計劃，而以糧食供應為基本因子。因為這一基本因子的不確定性的巨大因素，在計劃上應依照供給的等於，不及或超過目前的估計而準備三種不同方案。還有一種需要完成的基本任務是，要研究出一種分別先後的明細計劃，那應該是均一地適用於所有供應品類和生產前件的分担，並要使一種供應品類的分担和另一品類的分担之間保持着若干聯繫，後者的需要是和前者的需要相連着。瓦爾加在那時候曾寫道，「德國從前常有這種情形，蘇聯現在也常常碰到這種情形，就是，一個工廠不得不暫時停工，只因爲担任它的生產必需項目的十個當局當中有幾個沒有能夠出產它們」。在這開頭幾年，似曾有一種趨勢要從每種工業的估計出發，看它能生產什麼和它需要什麼，然後把幾種工業的計劃歸併起來而成一個總計劃；而爲着使它們適應於可能受各部門之間的協商和潦草塞責的折衷辦法所影響，需要有時時的調整。關於從主要「生產因子」（勞工，原料，糧食和燃料，運輸便利等等）的有效供應出發，然後依照先後需要的程度分派它們的相反程序，似乎沒有被採用。無疑地這部分地是因爲缺乏必需的材料根據。但這和一個行政問題也有連帶關係：即「國家計劃委員會」所據以建立的原則。在它存在的頭兩年間，它被分爲六個部門（農業，工業，運輸，動力，商品交換，供應），和另外十個各別的設計委員會，每個附屬於一個人民委員會（例如：農業，糧食，運輸，對外貿易，工業，等等）。這種依據所謂「作業」原則的

劃分後來受到非議，因而引起一種依據機能劃分工作的原則的改組。(註一)克爾西沙諾夫斯基當時曾談到消除「每一分離主義的趨勢」的必要；而反對各部門分離主義的鬥爭似乎會是那次改組的要旨。

不過，有好幾年，「國家計劃委員會」所完成的工作也還沒有超過一些各部門程序的勉強的合作，主要是互相競爭諸部門的要求之間的仲裁，以及有關經濟情況上特殊弱點的一連串特別調查。它製出了一連串關於燃料，運輸，糧食和對外貿易的局部計劃。它負責報告一九二一年九月蘇聯飢荒區農業的恢復情形。它建立地方機構以發動市場研究。這些大多數可以比擬於我國的「皇家委員會」或「閣部委員會」，而與它們後來發展的具體行動計劃大不相同。一件比較重大的工作是那很詳細縝密的「關於經濟分區化的報告」，它成爲後來在五年計劃下許多新的建設計劃的地域配置的基础。但是最重要的新方案恐怕是在一九二五年準備的第一次以年度計的所謂「管制數字」(Control Figures)因爲這是統一計劃中第一次嚴格的試驗。它們是代表着從經濟相互關聯性的綜合觀點出發的，而不是從已經根據局部需要所構成的部門程序出發的，一種年度計劃的界誌。真的，構成這些頭一次「管制數字」的那一百頁薄薄的小冊，原不過是試驗性的和臨時性的。它並沒有要求成爲一種行動方針或最

(註一)關於這次改組，波爾洛克博士曾寫道：「除了負責『國家計劃委員會』的全部活動，使它連結起來和代表它向政府負責的主席團之外，又成立了三個部門，它們的主席同時是『國家計劃委員會』的副主席。這三個部門就是建設，生產和經濟政策。」(見所著『蘇聯計劃經濟的實驗』二五〇頁—德文)建設部便是後來強調基本建設和重工業作爲經濟關係全部結構的重點的發軔。初時它主要是涉及電氣化計劃和發展燃料的供給。生產部再分爲工業，運輸和農業三組，前者負起了監管每種工業的個別活動的任務。經濟部包括國內貿易的市場關係，對外貿易和金融。



後計劃，使一切部門都切合於它的普洛格魯斯提的鐵榻（雅典傳說：強盜普洛格魯斯提將俘虜縛於鐵榻上，身長者截之，短者強伸之。——譯註）。它不是建築物本身的肢體，而無寧是圍繞在建築物四周的踏架：各種人民委員會的行動計劃或最後方案在它的基礎上樹立起來的一般方針或指南。只有托洛斯基等人才過分地推崇了這些「管制數字」；認為它們是「發展的社會主義底光榮的歷史音樂」；它們是連結着「以前馬克斯和恩格斯的一八四八年的「共產主義宣言」和以後人類社會主義命運的不可中斷的綫索」；「它們創立的日子應該在蘇維埃的日歷上印上紅色。」像這樣過早地判斷，他宣稱「每一個數字不單是一個圖樣，而且是一道命令。」在別的方面，它的被接受却是比較慎重的，在某些方面并且相當冷淡。「國家計劃委員會」的主席本人在介紹它們時也只聲言它們是「對於製定實際行動計劃的工作的近似方針」；而「勞動和國防會議」的主席，雖然承認這些數字在初步預習上的價值，却否認它們作為來年各部門計劃的構成的指導原則。原來的意圖是，這些數字要被提交各種經濟人民委員會，包含工業，而它們也要在九月中把它們自己的部門計劃，連同對於「管制數字」的任何批評，提交「國家計劃委員會」。在此後一個月內，「國家計劃委員會」便要發表它對於這些部門計劃的評論和修正；而經過這種方案的交換過程，來年的確定經濟計劃便由「勞動和國防會議」加以批准。實際的情形是，有許多各別的當局曾置這種「管制數字」於不理；并且沒有多少時候之後，這些「數字」便變為很不受信任了。當時會有這樣的評論：「「管制數字」成為可怕的事情：人們甚至用它們來恐嚇小孩。造成它們不受信任的主要原因是它們所根據的數物估計的錯失。在這一方面，以後年間它們的繼起者是比較幸運的。雖然它們仍不過是試驗性的近似數，它們的估計却是現實主義地得自各地下級計劃機關的建議，和經過各種當局所供給的統計的改進。（計一）到它們存在的第三年，

在事實上和在理論上一樣，它們似乎已經成爲一種初步的骨幹，最後的行動計劃是圍繞着它們建立起來了。有一件特別重要的事情是一九二五—二六年度冬季的事件所着重指出的，那就是，如果政府機關要有任何運用的權力，和如果計劃要有任何穩定的基礎，儲備（例如穀類）的積集掌握在政府的手中是必要的；而在以後的年間，某些基本必需物的儲存便開始建立了起來。最後，在一九二七—二八年，「國家計劃委員會」便負起了準備發展國民經濟的「五年計劃」，那是要成爲從一九二八年秋季開始五年之內的正式方案的。（註二）準備的任務包含着，第一，一種卓越的一般投資和建設的計劃，概括一個時期而使它的各別部分結合成爲一個整體，並包含當前各種活動的部門程序；其次，一連串新的和極基本的研討，關於大規模投資計劃所涉及的「有限因子」和決定因素的性質和作用。隨着這一「計劃」的創始，計劃工作上翻開了完全新的一章，而隨着農業上集體化政策的成功，一種以前從未有過的也許可以稱之爲「世界設計」的基礎被打下來了。

這裏似乎應該對於工業行政本身說幾句話。這事情在各不同時期曾經過許多變化，而組織的模型遠遠不到一切工業或甚至同一工業的一切部門的統一。任何關於這方面所作的一般計劃無可避免地是不完全的，並且必定很快地便成爲不合時宜了。在三十年代的開頭，基層的工廠和上峯的「最高經濟

〔註一〕在提出頭一次「管制數字」的時候，「國家計劃委員會」怨訴着它所得到的統計常常不單不正確，而且有偏向；例如工業托拉斯們有時會因爲懼怕財務人民委員會而少算了它們的剩餘資產。「國家計劃委員會」有權審核所有的賬簿和計算書。但是要審查各部門所提交給它的總報告背後的細目，自然是一件繁重的工作和需要相當時間。

〔註二〕事實上，「五年計劃」草案的製成是開始於一九二六年，準備在一九二六—二七至一九三一—三二年度的期間實行。但還只是一個草案，到一九二八年才成爲定式，在以後五年起實行。

會議」(實際上是一個工業人民委員會)之間還有一個好幾級的系統。「最高經濟會議」本身也有工業各特殊領域的所謂「總署」(Chief Administrations)作爲它的直屬機關。在它們下面是一羣羣同類工業組織成的「組合」,每一「組合」可以包括一種工業,如棉花或工程中的某一特殊部門。(註一)這些「組合」在財政上是獨立的團體,主要是從事於原料的供給,最後生產品的售出,以及對它們各自工業部門的工業政策執行一般的監督。它們也負責各企業成員的經理人員的任用,以及勞工訓練和供給的組織。在它們之下有許多「托拉斯」,每個有它的「信託部」:這些「托拉斯」是由相關的或接近的工廠集結而成的。這整個系統的特徵就是在經理上和指導上的所謂「專職主義」的原則:這是說,一個特定個人(或部門)只負責他所管制的工業或工廠的一個特定職務或方面(例如勞工或原料或財務)。(註二)在這以後變遷的趨勢首先是簡單化這種多環的制度和根本取消這系統中的某些階段,其次是放棄「專職主義」而採用一人單獨負責特定領域內的所有業務,雖則容許他在所屬工作上專職者們協助他。在一九三四年,「組合」被取消了(註三),同時各種「托拉斯」的數目

〔註一〕這些「組合」成立於一九三〇年,原本是代替「辛狄加」的功能,這些「辛狄加」曾經以「托拉斯」爲始其而在廿年代的過程中被建立起來,掌握着商業的行動,後來并伸張權力,分頭監督各自的特殊工業部門。  
〔註二〕照哈巴德說,五年計劃時期最初的行政制度是趨向於「現存的七級組織的分離和較大的專門化」。他又說:「同時它們對於實際生產企業的工作程序的直接干預受到嚴格的限制。對於結果的責任被轉移到下層去了。」(見所著「蘇聯的貨幣與財政」頁三七。)

〔註三〕這裏也有一些特殊的例外。舉例說,煤礦工業在每個主要的煤區,如頓巴斯,烏拉爾,庫斯巴斯,卡拉甘達,莫斯科區,中央亞細亞和外高加索,都有區組合;而這些區組合各有二十二個,十一個,五個,或三四個托拉斯隸屬於它們。(見梅拉諾夫斯考斯所著「社會主義工業經濟」頁五七七。)

被減少了。在上層工作中，「最高經濟會議」曾被再分為許多新創的人民委員會，各自負責特定的工業領域。糧食已經在一九三〇年脫離它的權限；而在兩年之後，「最高經濟會議」便讓位於三個各別的人民委員會，即重工業，輕工業和木材。後來這些委員會又被再細分。通過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二日蘇維埃人民委員會會議的一道命令，機器製造業被從重工業人民委員會分離出來，而置於一個分立的人民委員會之下，掌管摩托，牽引機，機具，火車頭，農業機器和電力機器，以及橡皮和玻璃的製造業。在這以前，國防工業已被置於一個分立的人民委員會之下。在一九三九年的頭兩個月，主要工業的人民委員會便來了更嚴格的拆分。重工業人民委員會被分割為燃料，電氣，鋼鐵，非鐵金屬，化學品和建築材料等委員會。新近成立的機器製造業人民委員會又支解為重工程（機具和火車頭），中工程（摩托卡車等）和一般工程（用具等）。在糧食方面，漁業，肉類和乳產被另立人民委員會而脫離糧食人民委員會；在輕工業方面，紡織業自成立一個人民委員會；在國防工業方面，劃分為飛機，造船，火藥和軍器。由於這種變革，分立工業人民委員會的數目增加到二十一的高數字。「總署」在外表上仍然存在，作為各個人民委員會的直屬機關；雖然它們的重要性無疑地已經由於人民委員會的倍增而退減了。（註一）這些委員會把任命經理人員和供給及出售的商業行為之權從舊日的「組合」襲取過來。它們同時掌管那些科學研究所，那是依據完全專門化的路線組織起來，而附屬於各種工業人民委員會的。在生產單位較大的工業部門，工廠今天一般地是和人民委員會的這種「總署」發生直接關係的，前者的經理和後者的負責人互相作個人的接觸。可是，在生產單位較小的地方，或在結構

（註一）以一九三七年的重工業而論，在單一的重工業人民委員會消滅以前，這些「總署」所包括的部門為：鋼鐵，油，化學品，非鐵金屬，動力，採礦；建築材料，銀和鉍等；總共有三十三個。

複雜的工業部門；各工廠仍然集爲托拉斯，它是負責財政的單位，而「總署」發生直接關係的也就是這托拉斯。（註一）

「國家計劃委員會」本身在三十年代中期和後期也曾經歷過一些組織上和規模上的改變。一九二六年的變革所分成的三個主要部分，到一九三五年便增加到十一個，每個部分掌管一個特定的領域如建築，工業，農業，動力，運輸，貿易及分配，勞工，和科學等。在一九三五年，又作了進一步的改組，使那所謂「綜合計劃」有更大的卓越性；五個「綜合計劃」的部門被創立了（例如，一個是處理一般生產計劃的，一個是處理財政計劃的，等等），而從前那十一個部分所網羅的經濟活動主要部門現在由十六個部分來分擔。一般的工作方針是決定於一個主席和一個由各部門的人員推選出來的七人評議會。在一九三八年二月，這裏曾發生一次似乎不算不重要的規程上的改變。在「國家計劃委員會」的上層，除了評議會的擴大外，又加上了一個十一人的會議，而這會議是作爲一種常務委員會而設置的，它直接向「人民委員會」（等於英國的內閣）負責，並和它發生直接關係。在今天，「國家計劃委員會」的主席本身是「人民委員會」的一員。「國家計劃委員會」內面的「綜合計劃」部門減少爲四個（一般經濟計劃，基本建設，財政，和生產的地域分配）；而各自掌管一種特定經濟活動的部分增加到二十六個。

首先是使經濟計劃根基於現實的材料，其次的控制計劃的實際行動，使任何必要的調整和修改不致引起過度的脫節，關於這兩項的重要性，已經被強調了。自從「五年計劃」實施以來，計劃方法和

〔註一〕主要地爲地方市場服務的小規模工業是在共和國或省區的，而不是在聯邦的人民委員會的控制之下，各共和國都有地方工業和市鎮經濟的人民委員會。

機構曾有了很大的改進，而這是大大地有賴於上述兩項方針的。顯然的，任何經濟計劃必須同時包含一種政治的和一種實踐的或現實的因素；而想要成功，這兩種因素必須是完全融和的。從一方面來說，它是政策的陳述和目的表現；從另一方面來說，它是潛能的估計，根據於目前事實的報告。前一因素主要是關於下面三者的決定，即：用於新建投資的資財的比例，這種投資在重工業與輕工業之間和在輕工業各不同部門之間的分配，以及最後，新建計劃的地理分佈。和這有關的是工資政策。就一般工資水平而論，這和用於消費品工業的資財總數是一件事。但若工資政策牽涉到各不同等級，工業或地區的特殊工資的結構時，它對於需求結構以至於特定工業的出產政策（例如比例於日用必需品的奢侈品生產）便發生獨立的影響。如果這一種類的「政策決定」構成「計劃」的經綫，顯然的，根據於現實材料而有關可用生產資財的估計必須成爲它的緯綫。可以織在幕布上的可能花樣的數目是有限的。政策決定了可用資財能被運用於怎樣的目標；但是可用手段也制限着在任何指定時間上可能選擇的目標。例如，明天能有把握的新建設工作的總量將被嚴格地制限於今天所存的重工業的體積以及它的製造材料的出產能力。而今後十年內希望能有把握的建設總量將大大地受影響於在這十年間你所做的建設的多少，以及它是屬於怎樣的類型（例如，是紡織廠的或鋼鐵廠的）。從這一方面來看，經濟計劃的基本問題決不是可以自由伸縮的手段，在一列預先決定的已知目標當中的簡單分配，使所有這些目標照着它們先後次序的位置適合於一個有限的範圍（如像一些經濟學者所曾描繪它們的那樣）。無庸說，這些問題有點類似於一個爬山者對於那少數他可以選擇的路徑的考慮，而他的選擇是大大地決定於他作爲一個爬山者的自己的品質的；或者說，是類似於擺在一個將軍面前的問題，他面對着一些敵對的戰略計劃，每一種他要作爲一個整體來研究，而依據在他支配下的武器的性

質和數量來在它們當中加以選擇。

當「計劃」已經寫在紙上，有關資料的搜集和使用并不終止。把它付諸實行的過程本身就是一種放驗它是否與現實相稱的過程。把「計劃」所設定要做的來實行就是把問題付諸於現實（如像一個科學家在他的實驗室所作的那樣）：那是不能用任何別的路徑發問或解答的問題。這是控制着「計劃」的完成的重要性的一方面：這可以使「計劃」像一個活着的有機體一樣，能夠生長和改變它的形態，作爲它的活動的一部份。換句話說，計劃具現的途徑當翻成實際時，即給與計劃機關以新鮮的經驗和新的材料，而這些機關必須不斷地注意着，不單要接受和精選這些材料，并且要改正那「計劃」的形態，使它遵循着這比較接近於實際經驗所要求的途徑做去。假如那「計劃」太過硬性，是一種脫離環境而必須遵從的程序，嚴重的頓挫和脫節是必然要發展和擴大它們所影響的地區的，如果這些挫折和脫節的修復拖延較久的話。在另一方面，假如可變性的便利太大，計劃程序只有勸導性而沒有命令性，它的條款的脫漏定會發生於下級機關，而這種脫漏本身將引出新的不可預見的因素和隨此而來的頓挫和脫節。一九三八年「國家計劃委員會」的修正章程說明了，它的首要職責必須是「保證在經濟各不同部門的發展中注意正當的比例，和採取的必要步驟防止發展的不均衡」。這必須是同時意味着，對於「計劃」的條款的不應有脫略必須迅速加以改正，而在實際情況要求修正「計劃」的場合，這種調整必須用一定的方式做到，使經濟的其它部分的受擾亂減少到最小的限度。要這能做到成功，需要一種觀察和在每一點上分析當前情況的進步機構和技術，以及一種管制的機構和技術。它還需要——至少藉此可以較易收效——擁有一種儲備（例如原料），容許在某些特殊方面的某種調動：如我們所知，這是在初期所不會存在的一種奢侈。

猶像「國家計劃委員會」的眼睛和警戒者一樣，計劃機構的下級單位有着他們的基本作用。「國家計劃委員會」必須不被設想得那樣簡單，如像一羣專家居住在莫斯科的一座大樓房，從最初的原則來設擬計劃，而只通過一堆統計與外界發生接觸。它在今天是憑兩系列的計劃機關跟經濟領域中的行動單位連繫着。一系列是向下通過經濟行政機關，通過人民委員會和托拉斯而到達個別工廠。例如在舊日的重工業人民委員會中，曾有一個金屬的設計團體或部門，約有三十個工作人員，而和「國家計劃委員會」本身的一個包含四五個人的相應部門直接溝通。另一系列是地理的地向下移行：通過共和國和省區到縣區，每一地區有一個設計局，而這是和它的直接上層發生直接聯繫和隸屬於它的。而這些計劃章魚的觸手的這些末梢，不單探索着它所置足的地層——採集計劃所由構成的材料——並且每月都警戒着它的執行，報告顛擗，監督改正和順應。它們是行動計劃的「前進軍官」。此外還需要記着的是，在任何最後程序的構成之前，初次設擬的「計劃」（以每一年度的計劃而論，通常這被當作管制的限度）是向下通過各級組織，沿着上述的兩個系列的雙重路綫進行。這種下行運動一直通達於個別工廠中的生產會議，在這裏它被作為討論的主題。然後這運動被倒轉過來，而草案便回歸原處，經下級機關加以比較具體的細目的充實，并帶同着它在路上所積聚的修正和批評。（註一）只有到這

〔註一〕據奧波連斯基—奧辛斯基所說：「各部門的和各共和國的計劃有時候和原來的範圍（即原來的方針草案）相差頗遠。」（見所著「蘇聯的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頁四五。）就出口貿易的年度計劃來說，謝爾孟斯基描述其程序如下：「對外貿易人民委員會把管制範圍通知出口合作社和人民委員會的代辦所。根據於這一管制範圍，出口合作社和代辦所草擬他們初步的年度計劃，而把它們交給對外貿易人民委員會。在這些計劃草案的基礎上，人民委員會寫成它的年度計劃，而把它呈請政府批准。」（見所著「蘇聯出口貿易」頁七六一七。）



時候它才由「國家計劃委員會」作最後修剪和完成的工作，而呈遞政府賦與政府法令的形體，使它對所有國家機關有約束的力量。

對於眼前環境的適應是要有短期計劃的準備，那是爲着當前的階段而具擬并且配合着長期計劃的體制的。蘇聯的計劃設計常常強調着所謂「透視計劃」和「行動計劃」的分別。每一年度的「管制數字」原本只是當作一種「透視計劃」而草擬，各種人民委員會和工業部門便根據它來起草它們的本年度實際行動計劃。「五年計劃」類似於「透視計劃」或概算，概括着將會發生的事件的主要形態。在目前，「管制數字」構成一個年度的行動計劃的發端或首次模型，和「五年計劃」的比較一般的方針相配合，不過是輔助和順應於後者的。此外，在這種年度計劃裏面，還有分季計劃。

在每一季開始之前，分季計劃被加以重新檢查，以適應季節的特殊性和上季計劃的成就所引起的最後改變。這表明着社會——經濟計劃已經化成爲具體的現實到怎樣的程度……在工業的某些部門，在托拉斯和特別在企業裏面，每月的，和常常是每十日的或甚至每五日的計劃方法是採用的。（奧波連斯基——奧辛斯基著：「蘇聯的社會主義計劃經濟」一九三二年版頁三三—三四。）

在計劃的技術方面，二十年代中期在計劃上的初步嘗試和此後十年間發展了的方法的基本分別是在那所謂物質平衡（Material Balances）的方法。這事情開端於二十年代末期這種技術研究的完成。它同時代表着一種蒐集基本資料的方法和一種把部分的或分段的計劃整合成一個總的計劃而使它們受到相互間的一致性的考驗的方法。那出發點是以各種生產綫上的相關技術係數標出了各種生產因子（原料，勞工，燃料，機器的耗損，）之間的量的比率和一種既定的出產計劃。在這些決定的常數的

基礎上，出產計劃的複雜性便以每類生產品的平衡或等式的形式被分析出來，看每類生產品從所有來源的全部供給是否適應它的需要——如當前的鑄供給計劃是否適應於各種建造和修理的計劃所包括的總需要，等等。隨後，這方法不單被應用於生產的互相關係，并且也被應用於各類消費貨品的出產和消費者需求的總量與結構；生產關係中的財政；以及不單是依照着全蘇聯的規模，并且還有分區的。用現實的或物質的名詞來說，它實質上是生產程序的一種成本估計；而依據這些結果使生產計劃的一部分和所有其它部分相聯接——如使被服工業的程序和紡織工業的程序和建造材料及熟練勞工的供給相聯接。這種成本估計的資料顯然可以有程度不同的現實性。如果它們是根據於不同項目的單純平均數，當不同企業的相對重量對於一個既定的出產總體的貢獻變更時，或當出產的品質本身起了變化時，它們對於一個變化着的形勢便會給以一個不完全的繪像。在第一次五年計劃中，很明顯地，這一類的資料有着嚴重的缺陷，比方，如像我們所見的，在大多數年中都沒有能夠使生產成本達到預期的減縮。在這一方面，第二次五年計劃是比較優越的一種；而自從第三十年代初期以來，根基於每一個別工廠的正確調查以及對於每一特定生產品的主要類型的係數，似乎有了很大的進步。例如，一位作者在「一九三七年『國家計劃委員會』的月報中曾指出當構成物質平衡時已計算到生產品質的傾向的最新進步；例如，不再籠統地說一個火車頭，而說一個以某種速率行走的火車頭，等等。這裏，再應注意的是，「計劃」的條文即使在這一點上也不具有消極資料或客觀事實的估計的性質。最後寫進「計劃」中的一種特定出產的生產成本數字，比方註明一種比上年減低的成本，是同時為一種實際可能性的估計和必需的節省（例如燃料或原料或勞動時間）的訓令。

生產係數，機械設備的能力，勞動力的有效供給，以及燃料或動力的報告，構成了從工業本身搜

集來的基本資料。在農業方面，因為糧食和原料的供給是依靠於它，情形又有些不同。在「新經濟政策」時期，如我們所知道的，由於個別農民願意送上市場的物產總和的波動，這是一個有着很大不定性的問題。自從集體農場運動勝利以後，在每個集體農場要繳納給國家徵收機關的產物份數方面，已經使經濟計劃得到遠較穩定的基礎：這種份數是依照着農場面積的估計，土壤的肥沃程度等，在每年早期於收割之前加以確定的。本來，這些繳納份數有着預約的形式；但是自從一九三三年以後，它們便明顯地採取了強迫繳納的形式。至於它的生產物的剩餘，一個集體農場可以自由支配和可以或者分給它的成員或者拿去當地「集農市場」出售的東西，構成了一種自由市場買賣的剩餘，那是不在「計劃」條文的範圍之內的。

構成「計劃」主幹的「生產計劃」，純然是一種在經濟體系中全部主要生產品的出產程序的總合。這些同時是每一方面的開支和生產，吸入和產出的程序，但它不是出產程序的偶然集合，各自分離地編排起來的：它形成一個完整的體系，使構成它的要素的個別出產程序藉我們前述的平衡方法互相接合。作為它的支柱的是「基本建設計劃」(Plan on Capital Construction)：新工廠的建設和擴充以及大規模革新的建設程序。自從「五年計劃」時期以來，這會有着蓋過其它一切的優勢。作為馬克斯的術語中所謂「擴大再生產」的體現，它必然是那體系必須依從的各不同生產部門之間的主要關聯的基本決定者。

包含在「總計劃」之內的，也有「財政計劃」：而在這一方面的建設，又另有一套平衡方法。在「生產計劃」的建設中所應用生產技術係數在這場合是被各種出產程序所必需的貨幣支出所代替。在這一方面這兩個計劃是互相連結的，一個是在物質的名義下表現出來，另一個是在貨幣的名義下的

複製品。例如，可以這樣估計：一定的皮鞋生產計劃將需要吸入這樣多的皮革，這樣多的各種類型的  
人的勞動時間，這樣多的機器的消耗，以及如此等等。「財政計劃」是開始於當這種成本估計已經被  
轉譯成貨幣的名義時。這時它便有着一種爲我們所熟悉的形式，即，像這樣一種企業，爲着完成它的  
Y 雙皮鞋的出產程序，將需要開支總共 X 盧布，分爲 X<sub>1</sub> 盧布的工資，X<sub>2</sub> 盧布的皮革，等等。這表示  
着這一出產程序的基本貨幣成本。從這基礎建立起來的一方面是「信用計劃」和「現金計劃」。另一  
方面是物價制度。關於後者，那程序是很簡單的。在基本出產成本的基礎上（即所謂「計劃成本」，  
Planned Cost）它包括對於機械設備貶價的補助，以及某種一般費用如行政費等），再加上小額利潤，  
即所謂「計劃利潤」（Planned Profit）（依照着流通百分比的變率計算）；而合起來的總數就是當  
一種企業已經完成它的生產程序，而把它的貨品提供到它們的下一用途時，它可以分爲三個主要部分：一部分是納入國家  
預算中的稅捐；一部分是爲着工業上的基本發展而要存入工業銀行的準備金；另一部分（在目前是比  
較小的部分）是留給企業自己支配的。很明顯地，這樣的企業在這方面就好像我國一家依照一種固定  
價格的契約（以契約上所預定的成本估計爲根據）爲政府工作的商行一樣。如果完成計劃的實際成本  
顯出高於「計劃成本」時，它所體現的實際利潤便將被減去一個等價的數額。在另一方面，如果它在

〔註〕當工廠被集結成托拉斯時，托拉斯一般估定這種「計劃成本」的單位。這意思是，那數目將是這托拉斯  
所控制的各不同工廠的某種平均數，高於效率較大的工廠的實際成本，而低於效率較小的工廠的成本。  
隨後便由托拉斯加以周密的考慮，在它所控制的各不同工廠當中，依照着每一工廠的特殊環境，從新配  
定這種計劃成本，以及所得的利潤。

完成它的程序中成就着比原計劃所預定的效率較大和較經濟——如果它能減少它的實際成本計劃成本之下，它便將體現一種比計劃利潤較大的利潤。關於這種補充利潤，一部分仍然歸入國家預算中和歸入基本準備金中，但是在這種場合，一個較大部分（約百分之四十）是由那企業自行處理，並可以用於用於這類的目的如職工的紅利，或工廠福利設備的改進（俱樂部，飲食部，托兒所，等等），或工人住居條件的改善。這從利潤中測出來的所謂「管理基金」，對於那企業的節省和效率起着一種集體激勵的作用。

當那企業已經完成和交卸它的計劃程序時，它被記入國家銀行貸方的「售出價格」不就是平常意義的市場價格：它單純是一種國家事務和另一種事務之間處理上的計算價格，而簿記上的借方和貸方也只它們之間發生效力。像這樣基於「計劃成本」，它是一種被經濟計劃所預先確定的東西。消費貨品最後零售價格，即通過商店櫃台對消費者進款的貨品交換的市場價格，是從這種工業售出價格上建立起來的，主要是加上了下面兩種數量：批發和零售的商業或分配機構的「計劃成本」（包含着分配機構的小額計劃利潤，以及運輸用費）和「流通稅」（Turnover Tax）這種流通稅是依照不同商品而有不同稅率的，而提供一種方法使成本價格和零售價格之間的差額直接轉入國家預算中；當大規模的支出被使用於基本建設或軍備上，或在何別的支出在消費貨品增加着流入零售市場當中不能取獲直接的果實時，這種差額是一定產生的；這是一種對於這類支出數率產生密切的函數關係的差額。這種流通稅的定率，實際就是依照人民購買力和需求結構而調整市場零售價格的主要器械。用零售價格的手段來求取各類商品的供應跟對於它們的需求之間的平衡，是一「財政計劃」所要處理的主要平衡或等式之一；而在一九三五年定額分配制度廢除後的諸年間，隨着零售市場和貨幣的重要性的恢復，國

於所謂「人民的貨幣收入和支出的平衡」和它在「綜合計劃」中所必要起的決定作用，在蘇聯的經濟刊物上曾引起熱烈的討論。（註一）

自從一連串的信用改革在一九三〇和一九三一年發生之後，信用制度便成爲藉工業控制生產計劃的執行槓桿。信用放款現在只能許給生產計劃中有特殊目的的企業；同樣的情形適用於長期信貸，資金發給，或存在工業銀行的準備金的撤回（那銀行現在是用財政支持所有基本建設的計劃的）。「信用計劃」容許爲着某一企業的便利而用一種墊付去支持那企業所不能用它自己的工作基金來支持的那些部分的出產程序。不過，這種信用放款是被撥定給特殊目的之用（例如工資，原料，燃料，等等），而除了被准許的之外，不可以劃給任何別的目的。因此，當一家織造工廠購買它的紗纒時，它將由國家銀行發出這種信用墊付。這織造工廠將在銀行賬簿上有相應金額被記入借方，而供給紗纒的紡織廠將有同量金額被記入貸方。當這織造工廠完成它的出產程序而把布匹提供到商業組織時，這一貨品過遞便有着劃銷銀行賬簿上的借方的自動效果。換句話說，這種信用墊付（這對於工業是一種負債形態）是照「生產計劃」被完成的程度自行清算的。國家銀行因此不單有辦法控制工業所需用的開支（例如工資和薪水或修理和建築），使不發生隨便的支用，並且從它在賬簿上貸方的結算率來看，它又有着一種很簡易的方法來檢查「計劃」的實際成就，以及報告失敗和頓挫。這種所謂「盧布（註）零售和批發的價格是受到管制的；有幾（屬於全國市場的比較重要的商品）是由中央政權機關確定的，別的是由各共和國政府或地方當局確定的。可是，自從一九三九年以後，爲着應付甚至在一個特定區域內同一物件的過大價格差變，所有主要糧食和所有標準工業貨品曾被集中確定一種價格表。不過，地方零售組織似乎還保留某種程度的自由處置，以便隨時變更價格以適應任何當地存貨的過多或不足，特別是在易壞貨品的場合。

的紀律」不單是作爲一種年終賬目核算，以回看曾被做了些什麼，并且作爲一種每星期的，還差不多是每天的，對於結果的檢察。也許再應加上說，在生產和供應的長流中，爲對付那些不可預見的延擱或障阻，可以藉助於所謂「非計劃信貸」，而容許在「信用計劃」中包含某種伸縮性以補「計劃信貸」之不足。這些可以由銀行按照特殊情形而自由處理；例如，拿來應付運輸的擱延，那是迫使一種企業貯存着已完成的貨品超過所預料的數額，或由於主要供給品的不到而延緩了的生產率。但是這種非計劃信貸只能容許於很短的時期內，至多一個月。此外，當「計劃」由於某種理由而被批准修正時，銀行可以開出一種補助信貸來助成所要做的必需調整。例如，有一年在七月中，曾議決增加耐用的消費品如傢俱和炊爐的生產，作爲下一兩個月的急要任務。甚至在這一計劃的修正被正式批准之前，國家銀行的列寧格勒支行便搶先發現在一個地方的貨車製造廠存有大量未用木材，而開出九個月的特殊信貸來支持一個新的傢俱工場以利用這木材，這是蘇聯「政府公報」的一篇社論舉出來作爲例子的一種搶先工作。

和「信用計劃」平行，「現金計劃」也規定國家銀行被授權發出通貨爲數額。因爲各組織間的往來事項單純由銀行中的簿記登錄來實行，現金的作用（除了極少數的例外）只發生於對個人所得的支付，個人間的往來事項，或倒轉來自個人的支付如捐稅，乘車費，或在國家商店購買東西等。在工業方面來說，「現金計劃」的基礎就是一定期限的工資和薪水清單。在農業方面，這相應的因子是付給集體農民的購買價格，作爲所謂「中央制」和「地方制」徵收的總計，以及付給國家農場的工資。因此在蘇聯經濟中，發出現金的數額并不起獨立因果作用；它本身是由「計劃」中別的因素臨時決定的，這如工資和薪水清單，那實際上是決定人民收入的決定因子。不過，在構成「現金計劃」當中，

單只確定某一定時期應付工資和薪水的數額，是不夠的。這種貨幣再次回到政府的期間，不論是作爲捐稅或儲蓄或經過商店櫃台，也必須被計算在內。此外，這種計算顯然不只是按照全聯邦的規模，并且還要分別每一地區；而這是有兩種理由的。首先，這種資料將使銀行能夠「事先計算它的存票是否足夠，它是否要從上級機關請領更多的供給，或者能夠從流通界撤回通貨。」其次，它在決定分配消費貨品的分區計劃中發生一部分作用。

「每一分區的財政機關，或者是財政人民委員會的當地辦事處，或者是國家銀行的本地支行，要寫下一時期本區內的約計現金情形加以分析。分析的初步目的是要決定應有的消費貨品的總價值，而這又轉過來成爲應該分配給供應人民需要的各種零售組織的信貸數額的指針。」（見哈巴德著：「蘇聯的貨幣與財政」，一九三六年版，頁六九—七〇。）

常常有人問到這樣的問題，即需求的結構是否有任何決定消費貨品的出產計劃的作用。它全然影響這種出產計劃呢，還是只影響到依照零售價格的水平而作的調整（通過流通稅），使消費者的消耗總額等於可用貨品的價值呢？這問題不容許有任何容易的答案；不過我想可以作一個大約的答覆。顯然的，消費力或需求的總量并不決定使用於生產消費貨品的資財總量。後者的量數將被決定於生產資財在投資和消費之間的分配的基本政策決定，那必須是任何計劃的出發點。這種基本決定一經採用，是不能在「計劃」實行以後的較晚時期由市場的影響加以任何可見分量的變更的。消費力的總量又將主要地被決定於在計劃發端時所體現的政策決定：它將部分地被決定於投資率（從這影響到就業的水平來說），也被決定於對工資水平所採取的政策（或者，在農業方面來說，被決定於農業徵收的購買價格政策。但是人民的可消費收入（以別於總收入）也將依靠於租稅政策和人民的儲蓄，不論是用購



買國家公債的形式或存放於儲蓄銀行。(註一)

關於特定商品和消費者對於一種商品與別些商品比較上的相對需求，像是無疑地需求有着相當的，雖然不是絕對的影響。在任何一次中，照計劃進行的各種商品的供應，將是適應需求的目前狀態的固定因子，而零售價格將是可變因子。純淨的結果將是那些供給較短的東西將要比那些較豐足的東西價格提高。商品供給的短少可以有許多不同的理由。也許因為它們是進口貨，或者它們的生產依靠於某種進口材料，而進口的可能性是極有限度的。或許他們包含着某些在建設工程和軍備上也很有需要的成分或副成份的使用。或許那些成問題的東西是相對的奢侈品，而在資源的分配上面，審慎的政策是要扶助基本的必需品（如像蘇聯會要那樣做的），使後者在生產計劃上有優先權。在沒有這些顧慮的地方，各種商品的需求現狀將無疑地是一個因子，它決定在下年的計劃中是否要增加設備以便特別對某一種工業擴大現有的工場和建造新的工廠；（註二）正如它將是決定是否對某一特定生產品的類型或陣線增加注意的因子一樣。應該注意的是，計劃當局是能夠像任何自由競爭的經濟一樣根據於消費者的愛好的十分完全的資料來作它們的決定的；它們將知道在流行價格上各種商品的存貨的流通率；它們可以從消費合作社和國家商居獲得那些品類是暢銷和那些是不的報告。假如它們利用像新圖樣的展覽和展覽品的選擇等的策劃來對消費者的選擇作有系統的研究（對於傢具，時裝，和建築模樣

（註一）「國家銀行」現在是屬於政府組織的銀行。個人的通貨和存款往來只能由「國家儲蓄銀行」辦理，那是為這種目的而有分支行佈滿全國的（約共六萬所）。

（註二）在這一關係上，零售價格對成本價格的比率將不是決定地作為比較於商品Y而增加商品X的出產的願望的尺度，因為要增加一種商品的出產，是包含着對別種商品割奪了更大的建造上的勞工和原料（例如工場的擴大建造等）；而這是必須打算在內的。

等，蘇聯曾作過這樣的嘗試）它們便很可能有較完全的報告是資利用。此外，在流通稅（這是填補零售價格和成本價格之間的差額的）對於各種商品的不同稅率上面，蘇聯的計劃有着一種比照於它們的原始價格而測定各不同物品在零售市場的相對短少性的簡單方法。直到現在為止，蘇聯計劃的首要任務還是在於重工業的擴展以及糧食，被服，住屋和娛樂等基本需要的滿足。這裏沒有個人選擇的複雜問題，如像英美經濟學者們所喜歡談論到的。一種滿足全體的基本需要的計劃本身便不是一件平凡的工作。和這比較起來，像要生產多少雞蛋和多少乳酪，多少變鞋和多少件外套，以及多少個湯鍋和多少輛搖籃車等的決定，都是次要和相對容易的。真的，隨着生活水準的昇高，這類的決定可能成爲比較複雜，由於較尖銳的奢侈要求佔據着較大的地位，連同它們在個人口味上的較大差異。在第二次五年計劃的末尾，對於高等貨品已經增加重視，對於消費者需求的供給也更適應了。而從這一階段所達到的程度來說，工業設備和勞動生產力將要充分能適合節省資源的需要，使故意的節省成爲沒有那麼迫切和甚至成爲次要的事情。這是一個接近於平等社會的特徵，當較高的需求以及它們最適度滿足的問題一經進入門檻，短少的問題便開始從窗口飛走了。

## 第二章 蘇聯爲什麼也有財政問題

蘇聯經濟的財政方面在我國恐怕比蘇聯經濟制度的其它方面更受誤解。至少在某一方面，公眾的無知曾被有利害關係的人們所利用，而流行的見解曾被給以完全錯誤的結論。誤解似乎大大地關連於，一方面是，對財政關係在社會主義計劃經濟中所起的作用的錯誤評價，另一方面是，對目前盛行於蘇聯的實際社會關係的偏見。這造成了兩種相反的態度。有時候發現人們對於蘇聯的財政機構和賦稅策略與其它國家之間的，期望着過於接近的類似性。有時候，相反地，覺得人們又這樣推測着，作爲一個社會主義的國家，蘇聯應該能夠把一切事情安排在絕對平等的基礎上，直接額定或分配給一切人以等數的貨幣收入，而不會引起任何種類的「財政問題」。

最常見的誤解是相信在某種意義上財政的問題（例如在那些「五年計劃」或「蘇聯軍備方案」中）是先於生產的問題；找出方法和手段來動員所需要的金錢（如用賦稅或貯蓄）是成功地動員和配置所需要的「生產資財」來建築蘇伯河水壩或建造軍火工廠，坦克和轟炸機的先決條件。「他們從那裏得到實施「五年計劃」的款子呢？」這是在民衆講壇上從各類聽衆發出的一个共通疑問。這一意念如果應用於傳統型式的資本主義經濟中，是包含有可以叫人相信的真理的充足因素的。但是一涉及一種計劃經濟，那就真正把馬車放在馬的前面了。決定新工廠的建立或坦克的出產的速率的，是「生產計劃」，以及支持它的可用勞力和原料的實在源泉，而不是「財政人民委員會」在國家銀行簿簿中記在

貨方的金額。這事情一經說出來是很易明白的；但是在公衆的思維和討論中它極普遍地被錯落了。

那麼，**蘇聯財政**的考慮畢竟還存在呢？爲何蘇聯還有一個要試算平衡的預算，和爲何它跟別的國家一樣採用公債和賦稅作爲歲收方策呢？這理由是，蘇聯的經濟依然是一種貨幣經濟，在這當中，收入是用貨幣來支付，而這些收入是花費在大家所熟悉的零售市場的商店裏。明顯地，這種種貨幣支付，首先是國家與個人之間的（工資、薪金等等），其次是支付從個人向國家的倒流（不管通過商店櫃台或由公債和賦稅或由「國家儲蓄銀行」的儲存），必須是平衡的，除非有些隱秘的貨幣囤積用私人積蓄的方式在某些地方被積聚起來。因爲「生產計劃」中每一變更都將影響到這一平衡的關係，無論是變更工資上付出的總數或消費貨品從工廠轉到商店的總數，或兩者同時，必須要常常有財政上的調整來使貨幣的循環適應於任何既定的生產結構。「財政計劃」將需要確切地和生產計劃配合起來，而這種配合又要隨着後者的任何基本變動而變動。任何既定年度的全部工資和薪金清單（連同集體農民們的可能貨幣收入，那只能是一種大略近似的估計）一經決定，而在這一期間可用於商店的消費品總產量也經決定之後，貨幣支付的循環可以有三種途徑來調整，使能保持必要的平衡：（一）變改對個人收入的直接稅，（二）變改國家公債或國家儲金所收集的總數，（三）變改貨品由一國家商店的櫃台或一個合作社到消費者之手的零售價格。當人們談到經濟計劃中所包含的「財政問題」時，他們所談論的主要就是這些調整。

現在我們到達了一個基本的論點。財產的收入，以及伴隨這而來的各種不平等，在蘇聯是已被取消了的。但是工作收入的差別，隨着工作的等第以及工作的性質和總量而不同，是繼續存在的。作爲生產和投資的調節器的利潤心已被放棄了。但是伴隨着工作和工資而起的日常經濟動機，仍然起着重

要的作用。無疑地，曾有種種企圖要引導新的社會的和集體的動機到工作中去（如近來的事件所示，這已有相當可觀的成就）；但是個人的金錢動機在使一個工人獲取技巧和增進他的出產上的重要性，不單沒有被否定，在蘇聯并且還被強調着，作爲馬克斯所稱的「社會主義第一階段」的時期的一個主要因素。爲着使這種金錢動機得到全力的發揮，依據各別工人所做的工作比例來支付貨幣工資還是不夠的：必須是工資和薪金的賺得者對於這種收入可以（在某種限度內）自由支配——自由地依照他們所選擇的方向來化費它，或變更他們化費和儲蓄的額數。因此作爲個人所得而付出的貨幣沿着這一或別一途徑流回國家，就絕不是一件可以漠不關心的事情。例如，變更所得稅的基準對於金錢動機的力量影響，就和用發行國家公債來動員等量志願儲蓄的效果不同；而這兩者每一種的變動又可以由商店售出的貨品的價格變動而有不同的效果。基本上，這就是爲什麼這裏也有着「一種待解決的「財政問題」，作爲經濟計劃的一般問題的一部份。

人們常常驚奇着，在蘇聯的賦稅制度中，直接稅所顯的作用這樣小，而間接稅的作用是這樣大；因爲直接稅是傳統地被認爲對抗經濟不平等的有利工具，而間接稅在它的社會效果上是不公平的。（註一）通常所作的簡短答覆是，間接稅的意義，在一個接近於經濟平等的制度中，跟它在個人所得上有着很大的不平等的制度中完全不同；而在沒有「五位數的所得」可以抽稅的社會，直接稅已失掉它

〔註一〕在這一方面，曾在財政人民委員長和「右傾」領袖之一的索科爾尼可夫在一九二八年寫道，蘇聯賦稅政策的未來趨勢將遵循一種穩定化的方向，然後歸結於在國家預算的進項的一般總數中間接稅的相對重量的減低（參考所著：「一九一七—二八蘇聯公共財政政策」。）這一說法顯出了，一種如第一次五年計劃所實行的完全計劃經濟，在「新經濟政策」時期還沒有被了解到，至少在右派集團中是這樣。

的特殊社會目的，並且必然是產量遠爲較小的。這是一部分，但也不過是答案的一部分；下面關於五年計劃時期所曾作到的蘇聯財政制度主要變化的分析，將給與這一類型的問題以更完全的說明。

蘇聯國家預算跟別些國家的一個重要不同是在於前者的國家投資佔據着優越的地位，以「發展國民經濟」的名義進行。（註一）工業上的投資，那在英國和美國（戰時除外）是私人資本市場的事體，在蘇聯是國家的責任；而總投資的三分之二是通過國家預算的。在二十年代的「新經濟政策」時期，雖然支出的這一範疇佔去了全部預算支出的百分之四十（一九二四——二八的平均數），它所表現的絕對總數還是相對小的；而這些年間國防支出只有一九一三年的數目的半數（註二）。在歲入方面，這一投資支出約略平衡於國家工業和貿易的利潤（連同其它國家企業的歲收）加上國家公債的收入。賦稅制度主要還是傳統的方式；許多稅收是沙皇時代強迫徵納的廣積。直接稅和間接稅的歲收差不多相等；跟沙皇時代的全部賦稅歲入比較起來，直接稅所代表的遠爲較大，間接稅遠爲較小。直接稅所採取的主要形式是抽自農民的「農業稅」：所有工業的或貿易的企業的牌照捐，不分國家的或個人的，隨着企業的流通量而差變；個人的所得稅，以及一種超額利潤和超額收入合起來的捐稅。間接稅所包括的是平常的國產稅和關稅。事實上，直接稅歲入有一半以上是來自工業稅或牌照捐；這是後來單一的「流通稅」的前驅，平常它是被列入「間接稅」中的。這一考慮應該喚醒人們所謂「直接稅

〔註一〕不是全部分派於道一名義下的總數都屬於基本投資。有一部分顯然屬於高級經濟機關，研究所等等的行政費用。不過它的大部分是屬於平常的基本支出；雖然基本的修繕和新建設一樣是包含在這些許可中。

〔註二〕根據前一九一四年的盧布價值計算。

「和」間接稅」的分界是變成怎樣不定，當他們碰到捐稅是從工業而不是從個人抽取的時候，而因此  
在這種情形之下，傳統的分法是怎樣沒有多大意義啊。

「五年計劃」所引起的財政狀況上的主要變化是國家對於投資支出的巨大增加。跟一九二七—八  
財政年度比較起來，「發展國民經濟」的支出在一九三〇年增加了四倍，一九三二年便增加了十倍。  
初看起來覺得奇怪的是，這一增加支出在「預算」的歲入方面被抵償的只有一小部分，那是藉賴於公  
債和直接稅如所得稅的增加：在一九三二年，個人收入的直接稅和公債合起來總共不過為發展國民經  
濟的支出的五分之一。直到一九三〇年，歲入方面的主要增加是列入「預算」的國家企業的利潤；而由  
於貿易的和工業的組織用它們的貯存來購買國家公債的增加比較少數。但是從一九三〇年起，增加歲  
入的主要來源，平衡於增加投資支出的，是「流通稅」。在一九三〇年以前，如我們所說過的，這一  
稅捐只以工業的和貿易的牌照捐的一種附屬物的形式而存在，作為依照企業的大小來變更捐稅的一種  
手段。在那一年中，賦稅改革減除了以前成為六項歲入的主要來源的七十多種稅捐；舊日關於捐稅和  
非捐稅，直接稅和間接稅的分類被拋棄了，而採用一種簡單的分類法，劃定全個廣泛的範疇，名為「  
由社會主義化經濟的歲入」和「為動員人民資財的源泉」。前一範疇包含流通稅，各類合作企業（包  
括集體農場）的捐稅，以及利潤稅。在這些當中，流通稅是遠為最重要的一種（註一）并且代替了舊  
日的國產稅和工業牌照捐。第二個範疇包括個人的收入認購國家公債，直接稅（包含所得稅和遺產  
稅），以及某種較小的執照捐和印花稅。

〔註一〕在一九三二年它便已經估據歲收總數三百萬盧布的一百七十五萬萬；一九三五年估歲收總數六百七  
十萬萬的五百萬萬以上；一九四〇年估歲收總數一千七百八十萬萬的近一千零六十萬萬。

這一「預算歲入」的增加，特別是流通稅方面的收入（它的稅率在一九三〇年以後便急激上漲）是被認為在五年計劃之下對基本投資增加支出的後果而不是前提。這種投資的一個顯著效果是就業上和總的工資清單上的龐大增加。在一九二八和一九三二年之間，工業上工資勞動者的數目整個來說增加了一倍（這結果是尖銳的勞工缺乏代替了失業）；單單在房屋建造方面，他們的數目便三倍以上；而從第一次五年計劃的全期來說，這個國家的總的工資和薪水清單增加了約四倍於以前的水平。這意味着消費者們的用費能力的一個近於等量的增加。此外，這種用費能力的增加無可避免地要比可以拿到商店裏供它購買的消費貨品的任何相應增加來得遠為較快；因為「五年計劃」的主旨是集中勞力和資源於建設工作，特別是建立重工業的建設工作，因而要這大部分的建設努力在五六年之內對消費貨品的增加流動發生效力是不可能的。這就是約從一九三〇年開始發展的所謂「貨品慌」的祕密，它的空虛舖子和購買行列當時在外國旅行家們當中曾引起這麼多的議論。零售市場上的這種失平衡，包括着未滿足的需求和短少的供應，跟我們今天在本國的擬似環境中所經驗着的平行現象并不是不相類似。不過它跟由一種不謹慎的貨幣政策所引出的「通貨膨脹」毫不相干，那種政策如有變更，會基本上變更了零售市場的情形，如像許多人們所曾主張的。（註一）

自然，假如私人的儲蓄增加（用儲蓄銀行存款的形式或認購國家公債）或所得稅相應於投資的增加而急激上昇，情形會是兩樣的。這樣一來，在支付工資上所增加的總額便可以在它們有機會變成零售市場上的用費能力之前被轉回到國家預算中：換句話說，即使「收入」已造成高漲之勢，用費能

〔註一〕無疑地在這一時期流通界的貨幣總額會有增加——差不多和總的工資清單的增加有同樣的比例。但這單純是要支付較大的工資額的後果——一種無可避免的後果。〇是就業量較大的一種結果。



力還可以被維持不使上昇，在某種限度內，國家公債上的儲蓄隨着收入的增加而增加，但也沒有達到所需要的程度。而在這種情形之下，要期望它們的增加來補助投資總額到一部分以上，明白地會是很背謬的。還有所得稅也可以作為吸收增長着的收入源流的一種手段。我想，稍加思索便覺得這也是不易實行的；或者至少會伴隨着極嚴重的困難和不利。當時為鼓舞「五年計劃」所需要的加大努力，「工資激勵」（按件計工，紅利，累進的計件制，熟練工人待遇較高等等）的作用曾被加以很大的重視；在工人方面（新從鄉村徵募而來，未參加過工廠工作和未受過工廠訓練的數目增加着），這鼓勵着他們對生產採取一種新的和積極的態度，使他們願意受訓練和獲得合理化工作的方法。我們最近在國內所聽到的關於對加工所得等征抽所得稅的洩氣影響，足夠使我們明白，要是在一九三〇年以工業上工資清單所增漲的同等程度對蘇聯工人增收所得稅，那是會用一隻手取去了另一隻手為增進努力和效率而給與的同一激勵物的。這原因大大地是「心理的」這一事實使它不為不實在和重要。因此，留下來唯一的辦法是，調整消費貨品的價格，特別是奢侈品或半奢侈品的，使它隨着需求的增加而上漲；而作為做到這一點的工具，和使零售價格與成本價格之間的差額轉入「預算」中去，流通稅便被加以很大的倚重。不過在三十年代的早期，有好幾年，這還不足以對付零售市場上的情形，而為着下面將要講到的理由，一種定量分配制曾被暫時引用過。

我們曾經說過，三十年代初期的所謂「貨品慌」與通貨的「膨脹」毫不相干。不過，曾有一個重要的方面形勢的嚴重性被非計劃的信用膨脹（即由下級團體所創舉的信用膨脹，而未經「計劃」的準備或許可的）的某種數額所加重；而就是這一事實構成了一九三〇和一九三二年重要的「信用改革」的原因。當時除了由「預算」中劃定的資金支出之外，又加上了利用留給企業自己支配的工業利潤那

一部分，以及用工業銀行發行債券的方法，來增加投資。（後者的主要來源是工業托拉斯和其它國家團體的公積金）。在某種限度內，銀行可以動用這些公積金的一定數額來對建設工程或工業擴充作長期的信用放款。不過，在第一次五年計劃中似乎曾採用過的非計劃的和未入「預算」的投資的主要形式，是在原料貯存上的投資（常常是由於工業經理人的發起，希望防避日後可能的缺乏），取給於銀行的短期信用放款或某種別的團體。在某些方面材料的獲得成爲競相搶奪，和在供應短少時囤積材料，結果是要使短少加重而使「計劃」脫節。在某種範圍內，它對於原料和熟練勞工的價格的競相提高似乎也應負責。因此，一九三〇年的「信用改革」取消了交換期票，禁止一個非銀行的組織對別一組織作任何形式的信用放款，而使「國家銀行」成爲短期信用放款的獨一來源。在一九三二年，「工業銀行」本身被組織起來了。自此以後，「工業銀行」只能照總計劃中所已認可的目的和數額給工業以通融；而「國家銀行」對一個工業企業的短期信用放款是要指定用於符合它的計劃生產程序的特殊目的，和除了在例外的情形之下，不能被轉移於別的使用途。這樣一來信用制度是被爲作「生產計劃」的財政簿記部門而被鑲進計劃經濟的其餘部份中。它們再不能藉賴它們前此擁有的在信用墊付上的有隙獨立性來對生產或價格發生獨立的影響了。

由於基本必需品的供應不足，正像其它消費貨品一樣，對於它們的分配加以管制是很必要的。經過一九二九—三〇年富農們的廣泛屠殺牛類之後，肉類特別來得缺乏，牛乳產品和糖也是一樣。某些物品如織物等完全斷絕了來源，因爲除了有關建設程序的大量機器進口之外，所有其它東西的進口都有截斷的必要。在別些方面，爲了償付五年計劃所急用的進口必需品，出口市場是比國內市場有着優先權。要保證每個人能得到主要糧食的基本最低量，同時要使從事最主要類型工作的工人對於短少商

品的分派有特惠權（多於這一最低量），定量分配是必要的。這種特惠的分派法正符合於「各盡所能，各取所值」的原則。早在一九二九年，麵包的定量分配便在有些地方實行起來，發動於較大的城市，而從列寧格勒和莫斯科開始。後來這被擴大到實質上包括全部都市人口；而定量分配又被應用於糖，茶，植物油和牛油，番薯，雞蛋，肉類，菓醬和通心粉。在一九三一和一九三二年，大量其它的消費貨品，如織物和肥皂，也被包括進去，直到定量分配囊括了通過合作社的組織網而出售的全部人工消費貨品的差不多一半，擴展到約七千萬人口。

這一定量分配制有着某些特異點。首先這定量分配是按類分級的，特惠權屬於手藝工人，後來是數主要企業中的工人。例如，在一九三〇年，手藝工人得到比非手藝工人加倍定量的麵包和肉類，而麵包的定量也加多百分之二十五；在一九三一年，所有重工業方面的工人都被置於這定量分配類級的頂端。同時，在基本糧食以外的短少商品方面，工廠飲食部和所謂「對內合作社」(Closed Cooperative)（即專為某些特定範疇的工人和職員而準備的合作社，他們在一九三一年擁有四千多萬人）有着有效供應的選擇權，而像皮鞋，一套衣服或一件外套等類東西，只有向工廠經理處寫下定單才輕易得到。（註一）其次，這定量分配有着在某種確定分配價格上不是最高量的，而是保證最低量的形式。這樣它便成了一種「苛刻的定量分配」，並且構成差別價格的一般制度的一部分。當供應充足的時候，

〔註一〕至於農民方面，供應短少的工業貨品是依照他們在穀物等方面對國家收購機關完成交貨份數的比例來供給。（這是國內貿易人民委員會一九二九年一月的命令所規定的），穀物等類多能自給的農民，平常是不包括在一般糧食定量分配制之內的，除了在特殊化的工業種植區（例如種棉區）。對於外國人（外國工人和遊歷者）這裏會有著名的 Torgsin，只能用黃金或外匯來購買特殊的商店（Torgsin 的銷貨因此，在整個經濟上有着出口銷貨的意義，而在官方的統計中也被這樣承認）

超出定量的額外量數的購買，例如麵包和茶葉，是被允許的；不過這種「定量以外」的購買要付出遠爲較高的價格。以一般商品而論，價格可有幾種，那是依照它們是通過一個「對內合作社」，在一個所謂「貿易商店」(Commercial Shop)，或在私人市場出售而大有不同。假如你不是一個「對內合作社」的社員，你便要用比「對內合作社」雙倍或甚至三四倍的價錢向一個「公開的」國家商店或一個私家商人的貨攤購買。在這時候沒有單一的價格水準。這裏有着多樣的價格水準，而貨幣是依照你所能化費它的市場類別而有不同的購買力。結果是，大多數人只化費一部分他們的收入——他們準備用於基本需要的——於特許市場(定量分配證的持有者用低價向這裏購買定量物品)，這方面的總開支是受管制的，但是另外一部分他們是化費於相對不受管制(或管制較輕)的市場，這裏的價格遠爲較高，因爲它相當着剩餘用費能力的全部衝擊力。同時，消費者的特許範疇的存在是意味着，化費於不同市場的一定收入的比例，因而這種收入的購買力，是依照人們所適合的範疇的不同而有不同。結果是在收入與消費之間發生局部的，但不是完全的，分裂。任何個人的消費部分地依靠於他的收入，部分地依靠於他所屬的定量分配範疇(例如，他是否是一個主要企業中的工人)，和部分地依靠於他是否是一個「對內合作社」的社員和依靠於他所屬的合作社的次序範疇(供應上的)。對於在總體上有着大量增加的經濟，貨幣收入只能加影響於市場的相對不受制約的部分——主要是私人市場的價格，其次是公開的「貿易商店」的價格。

這一制度顯然是要調協兩個主要目的之間的衝突：使報酬最低的工人們獲得主要物品的最低定量，和使貨幣工資的激勵有活動的餘地，如我們知道，那在這一時期是曾被大大地利用過的。假如沒有定量分配，分配上就會不平等；而假如沒有類似於「對內合作社」，工廠飯店等的特許組織，在生

產前線的主要陣地上的工人們便不能被保證有效供給的優待權。在另一方面，假如不可能在一定數目之外化費任何額外收入（如像一種支出的全部定量分配制度所會造成之情形），工資激勵（熟練的和非熟練的工人之間的差分，累進的計件率等等）的鋒銳便會被嚴厲地鈍挫了。實際的情形是，這裏曾保留着化費額外收入於未受統制的市場的機會；雖然這種額外化費是被屈從於特別提高的價格，它的心理影響比較起完全沒有這種出路或貨幣收入僅夠開支是無疑地較小的。如果對於這一時期以及它在這個國家內所曾發生的問題加以較完全的研究，它對於一九三九年以來我們自己的戰時經濟問題可能提供有價值的參考。

同時，這種調協雖然對於一個時期很有用處，但在它不能以一種臨時的應變之計而止步這方面却表徵着許多不利。許久以前便清楚地看出來，特權範疇的制度會成爲與貨幣工資結構所要提倡的激勵制度相矛盾。這一矛盾在一九三二和一九三三年的過程中變爲特別明顯，當時曾開展了一種個別工廠自給的地方化制度，由此一個工廠的對內合作社便被鼓勵去直接和集體農場接洽它的糧食供應，或甚至使用它自己的分地或農場。一個人所屬的農場，以及這農場供應服務的效率，便成爲比一個人所得的工資更重要了。工資差失去它大部分的意義；而根基於貨幣工資差分的任何統一工資政策都成爲不可能了。這無疑地是一九三五年解除定量分配和恢復所有商店範疇的單一市場價格的主要理由。（註一）

不過，解除定量分配的主要原因是必需品如麪包，糖，肉類和茶葉等供應的增加；而隨着集體化〔註一〕自然，這些價格仍然依照地理上的不同地帶而差別；不過它們已不再在同一地方依照商店和購買者的範疇而有不同了。

的成功，供應地位大有改進，便在一九三五年一月一日開始了麵包和其他穀類產品的解除定量分配。在這年年底以前，肉類，牛油，植物油，魚類，糖和番薯等的定量分配券也被取消了。（註一）現在這些貨品在國家商店和合作社出售的價格比從前的定量分配價格大體較高而比「貿易商店」的流行價格較低；而為補償先前大大地依靠於定量分配貨品的工人們，貨幣工資率被提高了百分之十。這一改變在前此兩年間已經被打通了門路，由於這種「貿易商店」的領域的逐漸擴大，和「對內」供應的領域的縮小。（註二）在先前，「流通稅」是使「貿易商店」的較高價格和這些貨品的成本之間的差額轉入「預算」中的工具，而它在這些年間的增加大大地反映出「公開的」比較「對內的」零售貿易增長了重要性。在定量分配解除之後，這一課稅便成為使每種商品藉零售價格的調整而使可以出售的總額相等於當前需要的唯一工具。它的基本作用因此是填補成本價格和零售價格之間的差額，這種差額，如我們所說過的，是社會主義計劃經濟中高率投資的不可避免的產物。但是它還執行一種更進一步的作用：它是保證價格的提高應大部分集中於奢侈品而盡可能少及於必需品的一種手段。這是被用對不同貨品課以不同流通稅的方法達到，而這差別是從百分之二直到近百分之百的。（註三）由於這種有利於必需品而不利於非需品的稅率差分的調整，定量分配時期的價格特殊結構的特徵在某種限度內被保留了。因此又可以說，一個工資或薪水賺得者和別個之間的「實際」收入差別是少於貨幣差

〔註一〕據九月二十五日最高蘇維埃的命令。又十一月十四日的命令使所有的「托賓」商店在一九三六年二月一日結束。

〔註二〕據「計畫經濟」（一九三四年第四期）的估計，「貿易商店」的營業會從一八三二年零售流通量的百分之三增加到一九三三年的百分之二十二，並且企圖在一九三六年增加到百分之三十六。

別的，隨着一個人的收入的增加，收入陸續增加數的實際價值便降低了（雖然沒有以前那樣減得迅速）；而這種課稅是有着一般支出的累進稅——一種對收入在化費時的累進稅——的效用的。

當第二次五年計劃時期，投資率（對國民收入的比例）曾降減了少許；當時的投資較多是被導向消費貨品工業，而消費貨品在市場的流通便大大地增加了。成本價格和零售價格之間的差額問題因此穩定化了，而在一九三六和一九三七年的過程中，許多物品的價格便被降低。例如，一九三七年六月一月政府一道命令曾使大多數消費貨品的價格減低了百分之十五或十六。不過，在三十年代的後期，國家支出的另一範疇又開始和國家在國民經濟上的投資支出相競賽，那就是軍備的支出。在一九三五年以前，國防支出曾是相對地不佔重要的。在一九三五年，它所代表的不及全部國民經濟建設的四分之一，而在以前的年間還少過六分之一。到一九三八年，它便昇到國民經濟建設的差不多一半的數目，或佔全部預算支出的百分之二十（在一九三二年還不到百分之五）。到一九四〇年，盧布的絕對數字已經加倍多，而國防支出代表着全部支出的百分之三十以上。一九四一年的「預算」約計曾準

〔註三〕自然。用這種方法來差別課稅，只有當「生產計劃」安排好用適當的比例供應各種不同貨品時，才能顯出它平衡零售市場上的供應與購買的作用；因此藉維持一組貨品的供應使比另一組貨品相對地較為充裕，使價格的差別有利於前者而不利於後者，在某種意義上來說，正是那「生產計劃」，不過適當地調整價格的直接工具是課稅；而它是做這一事情的便利手段這事實，也許就是為什麼要採用這一方法，而不讓成本價格和零售價格的差別最初作為商業或工業單位的額外利潤而產生，然後把這些利潤課稅到「預算」中去。如果後一方法被採用，也許會證明不易防止各企業由於競爭勞力和供應短少的原料以擴大生產，而生產價格遠高於它們的成本的貨品，因而同時使原料和勞力市場陷於紊亂，並且，由於不合適物品的供應增加過速，便很難維持所期望的價格差分，使有利於必需品而不利於非必需品。

備使國防支出比上年提高百分之五十，即佔全部支出的差不多百分之四十。

假如說用以支付投資和軍備的歲入有任何一種來源，可以說那就是「流通稅」。這一課稅的歲入數字跟國防及國民經濟建設合起來的支出數字表示着很可驚的近似。更有意思的是，這兩項數字在十年間的增加表示着一種密近的相應：在一九三二年，它們分別是一百七十萬萬跟二百五十萬萬盧布；一九三四年是三百七十萬萬跟三百七十萬萬；一九三八年是八百萬萬跟七百五十萬萬；一九三九年是九百萬萬跟一千萬萬；一九四〇年是一千零六十萬萬跟一千一百三十萬萬。一九四一年的約計中，這兩項數字是一千二百萬萬跟一千四百四十萬萬，它們之間的擴大差額由利潤稅的增加約略填補了。

當我們談到歲入方面的流通稅和支出方面的國防跟國民經濟建設時，我們已經涉及全部「預算」的三分之二到四分之三了。歲入中比較次要的項目是利潤稅和國家公債的發行；在支出方面是社會和文化服務，包括教育，健康和公安。在一九三九年以前，這後一項目只次於國民經濟建設的支出，而在一九三八年還比國防支出多出一半。可是到一九三九年，國防費便超過它而把它貶到第三位；而在一九四〇年，比照於國防和國民經濟建設的各有五百七十萬萬盧布，它只佔有四百二十八萬萬。在歲入方面，利潤，公債和直接稅（它佔全數不到百分之五）總合起來約等於社會和文化支出的數字。

至於沒有通過「預算」的投資部分（約佔三分之一）：它主要是出自工業利潤的那一部分，由各企業保留下來而儲存於「工業銀行」作為準備金的；不過這種支出的批准是要它的用途包含在「計劃」之內的。通過或未通過「預算」的利潤再投資的分別似乎是前五年計劃時期的殘留，當時的投資率很低，而分別是依據於這種利潤被轉投入別的工業領域或投回同一領域。但是明顯地，一種工業所得而留回工業中的那一部分利潤跟被稅入「預算」中的部分之間的分別仍然有着它的重要性；因為如果有



一部分利潤被留下來給各企業支配，便是給它們提供一種集體的激勵，使把成本減輕和迅速完成它們計劃上的出產額，以便有較多的基金讓它們自由化費。（註一）

像這些項目是被列入所謂「財政計劃的統一財政平衡」中的，雖然它們沒有被列入「預算」中。「統一財政平衡」也包含國家銀行爲補助工業和貿易的工作資金而放出的信用借款。它被計劃爲經濟各部門之間的所有主要支付（不是對製造過程中的貨品或通過商店櫃台的貨品的支付）的一種平衡，因此它是「生產計劃」的補足，而「生產計劃」是所有商品和生產因子的供應和運用上的一種平衡。顯然的，這兩種平衡必定整齊地互相糾結起來：一方面是，在嚴格的意義上，財政平衡依靠於並且是「生產計劃」的價格表現，而另一方面是，當非爲零售市場的當前供應而工作的生產資財體積較大時，「財政計劃」也將達到一個較大的總量（當其它的事情是相等時）。決定財政平衡的大小和形態的是關於生產資財的配置的決議，而不是前者範圍着生產資財轉移的可能性。

自從一九四一年六月以後（按指蘇德戰爭爆發以後——譯者），自然的，一種定量分配制度又不得不被恢復過來了，首先是實行於西部各城市。和許多別的國家不同，蘇聯在戰前便曾建立起儲備，不單在主要原料方面，並且在糧食方面。但是在隣近火綫的地區，運輸的擁擠不久便使通常的供應受到限制。在七月十四日，定量分配券被發給莫斯科的居民，包括麵包，麥粉，穀類，糖，脂肪，肉類和魚，并擴展到離糧食供應較遠的其它大城市。在金錢方面曾開創一種「國防獻金」，可以用現金或物品捐助。在它開創的最初八個星期內，現金方面曾收到約四萬五千七百萬盧布；另外有數千噸穀物，肉

〔註一〕在一九四〇年的「計劃」的全部計劃利潤三百三十萬萬盧布當中，約有二百二十萬萬被稅入「預算」中而一百一十萬萬留給工業。

類和乳品由集體農場獻出。科學家們把他們的斯大林獎金捐獻，也有貴金屬如金，銀，或白金製成的物品（這自然可以用作購買外匯）。在十二月，一種新的戰爭稅宣布了，有着輕微地累進的所得稅的形式。所有的公民從十九歲到六十歲（婦女到五十五歲）都負有這義務，只有軍隊和他們的家庭，殘廢者和養老者，以及其他缺乏獨立收入的倚賴者除外。工人，公務員，作家，藝術家等是照漸進的等級繳納，從每年收入一千八百盧布的百分之七到每年收入二萬四千盧布的百分之十一。這課稅是在來源上便被扣除了。農民們，不論是集體農民或個別農民，是依照農場的肥瘠的估計而每一農戶每年繳納一百五十至六百盧布。豁免兵役的人要比平常多納百分之五十的稅率。明顯地，歲入上這兩種來源的產量比較起現時蘇聯軍火生產的體積來似乎很小；而在蘇聯戰爭經濟中擴充戰爭生產資財的方法無疑地是對消費和生產資財的轉移加以直接統制，而不是用賦稅的手段。

## 第三章 勞動自發性與工資差別

那會是嚴重的錯誤，當人們的心思被攝於計劃的技術方面，只注意到蘇聯經濟制度的從上而下的調協和指導，而忽略了那由從下而上的積極參與和自動性所構成的民主要素——這後者有着大量的證據可以證明是完全同等地重要的。一九四一年六月以來的非常事變（按指蘇德戰爭）所曾明確地確定的事情之一是，西方人一般認為蘇聯人民大都是被動的羣衆，在計劃和命令的執行上很少說話和更少有自發性，這種觀念需要大大地修正了。事實上，非常事變曾指出了，平常的入伍公民，無論他是一個農民或鄉村教師而轉為游擊隊員，兵士或飛行員，或者是一個撤退的流徙工業的工人，都有着臨時組織的自立性和能力的極高水平。事實上，近年來的非常事變，平時和戰時的一起，已經展示出許多自發的榜樣，暗示着平常工人對於他所參與的工業和社會採取了一種全新的態度；以及許多社會道德，那看來是對於社會所有權和集體責任的一種新感覺的明證。曾經有人指出了，蘇聯軍隊的戰術是大大地依靠於戰場上小集團的自發性——小的編隊，有着獨立行動的戰鬥能力和計劃能力。」（註一）這在工業上也是同樣真實的，計劃的成功會大大地依靠於一個人對於他的職務的責任感，那程度和流

〔註一〕G·斯蒂芬斯在一九四二年六月二十二日孟徹斯德晚報發表一文引證一位蘇聯軍事權威的話說：「你們教導你們的兵士要他們熟習各種編隊。一個兵士要期望明確的命令來對付各種編隊。我們教導我們的兵士要他們跟個別敵人作戰……指揮官盡他的能力訓示他們。但如果他的路子不成功，我們期望我們的兵士找出他們自己的路子。」

行性恐怕是無可比擬的。

當所謂斯塔漢諾夫運動在三十年代的中期開始發表時，在這個國家內（英國——譯註）它極普遍地被輕視爲一種宣傳面具。別的人也認爲它不過是俄國裝束的泰勒主義（Taylorism 美國的一種所謂生產合理化運動——譯註）而不加重視。但是隨後的事件以及對這運動的進一步探究指出了，它是不能這樣輕輕地被放過的。主要被應用的方法并沒包含有新的原理，而其中有些真會使美國科學管理的學生爲之愕然。它們有許多顯示着一種在基本形式上的分工的擴大。像重工業人民委員長奧爾狄奧尼基德西在當時曾說：「所有這當中沒有什麼新奇的事情，沒有什麼叫人惶惑的事情……適當的分工，工作地的適當組織，技術過程的適當處理——這裏你就得到斯塔漢諾夫運動的祕密。」（註一）唯一新奇的事物是，它表顯了一種工作方法合理化運動，那是出自個別工人本身的自發性的：就因爲這樣，它的成就在工業管理上成爲一種驚人的奇蹟。在別些國家一般是由機能工頭和效率工程師所計劃的事情，常常引起一般工人的暴烈反對，這裏現在是由工人們本身自發的。（註二）此外，它是着重於工

〔註一〕見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在聯共中央委員會常務會議中的講辭。

〔註二〕英國報紙大部分對於這種事情很少注意。在另一方面法國報紙雖然常常採取批評態度，却比較了解。例如巴黎時報的莫斯科通訊員在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二日指出：「這運動首先第一證明它有它的根基在蘇聯工人們的個人自發性中，而不是在管理方法上。」在和泰勒主義比較時，甚至秉持極端態度的哈巴德先生，他說斯塔漢諾夫運動是「誇張的奇術」和「搖旗吶喊的運動」，却承認它有着「一種跟泰勒主義的重要差別，因爲泰勒主義是從上而下的措置而斯塔漢諾夫運動是立基於工人自己的發明天才」，又「那會是一種錯誤，認爲斯塔漢諾夫運動在結果上對於增進工業效率毫無裨益。」（見所著「蘇聯的勞工與工業」，頁七八—八〇）

作方法或技術的合理化，而不是着重於工人方面的加大努力，像先前的突擊隊和社會主義競賽運動所常做的那樣。它表現着一種質的經營，而不單注意於量的方面。它是一種思想的而不是良好注意的產物——並且是在大多數工人們從完全新的角度來思考他的職務。斯塔漢諾夫在烏克蘭伊爾美諾礦場的革新包含一個簡單的原則：拆卸和架構兩種工作過程的分離，使每個拆卸手不需從一種動作轉換到另一種，使尖鋤和機器鑽孔器能夠在全部班次中連續地被利用。以前，拆卸手只做兩個半至三個鐘頭的拆卸工作，其餘的時間被花費在架構方面。這是兩個班次的事，第三個便是修理的班次；而結果是，空氣鑽孔器只工作五六個小時，二十四小時中其它的時間便都閒着。新的方法使一組斯塔漢諾夫運動者和兩個使用機器鑽孔器的架構工人能夠在五小時三刻的班次中達到一〇二噸的出產，後來甚至更多。後來這一改進又和另一種結合起來：改變頂層的工作方法，使拆卸手不致過度緊張，和使被拆卸的煤直接落在運輸機中，因而使煤更迅速地從礦面移開。

這先驅的成就（斯塔漢諾夫告訴我們，最初曾受到甚至他自己礦場的別的工人們的懷疑）差不多在它率得及發表以前便迅速地在別的工業中找到模仿者。愛美佐基亞，維諾加拉多娃和她的一個同名的伙伴發明了一種照管諾爾弗路普自動織機的新班制，而連同九個非熟練的助手管理着二二〇架織機；因而達到了比郎卡郡（英境——譯註）或新英格蘭的最高數字多出百分之五十的出產。列寧格勒斯高魯霍德鞋靴工廠的斯麥塔寧宣佈了打破捷克拔佳工廠（全世界最有名製鞋廠——譯註）的最近紀錄。克里伏諾索夫提高了他的火車頭的蒸氣出產量，因而提高了他的火車速率，是用反壓的乳劑，用絕緣的管子 and 圓筒，以及許多其它小改良。瑪利·丹青科在農業方面（在甜蘿蔔的生產上），馬其耶夫卡的馬登罐廠的工人們，一個植物罐頭廠的工人們，西伯利亞的礦工們，都跟着有同等的成就。在

頓內次的金屬工業中，愛勒門科和高涅內夫增加了一個電氣熔爐的出產到每天四十四至四十八噸，而歐洲的慣例以前認爲三十八噸是最高度了。在牽引機電氣裝具的製造上，每個人的生產能力提高到比美國的主要工廠多百分之五十的水平；在高爾基城的摩托車工廠中，製造一個舌門的生產時間比美國福特廠所需要的減少百分之二十，而在活塞方面減少百分之四十；在塔干洛格，一個汽鍋製造廠的出產增加到這樣的程度（四至五倍），以致打消了曾被計劃到的一個新工廠的建造。幾個月之後（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全蘇斯塔漢諾夫運動者大會在莫斯科舉行了，而斯大林，在對他們演講時宣佈說，他們的自發的創舉已經成功了『突破舊有的出產標準，而給被估定的工業能力和工業領袖們所準備的經濟計劃提出修正。』不久之後，這裏很難有一個工廠沒有它的斯塔漢諾夫運動者的集團了：這是說，那些有着獨出心裁的重大成就的工人們，有資格被加以這一稱號和受特別紅利的獎勵的。在較大的工廠裏，他們的數目常常達到以千計；例如，莫斯科的卡加諾維支球承工廠，到一九三六年八月爲止，在一九〇〇〇個工人中便有二千多個斯塔漢諾夫運動者。

我們已經說過，這些成就的主要部分代表着，不僅僅是「突擊」的方法和暫時的「奮發」，而是工作方法上的永久改善。一經開路，這些方法便可以很容易地被甚至較少進取心和較沒有好訓練的工人們所摹仿，因而提高了生產力的整個水平。這是有一大堆的例子可以證明的。在建築業上，俄國的泥水匠傳統地要準備他自己的灰泥，攜帶并砌壘他自己的磚。現在這些不同的工作被分開給一班中不同的份子做了。此外，砌磚工作的佈置被那樣改變了（把磚放在砌磚者近旁的吊板上，等等），普通他只需把磚舉起一呎而代替了一碼多，而化費在砌壘一定數量的磚上的精力便減少到不及以前的三分之一。

在孔特索夫斯亞毛織工廠，女織工捷古誇娃從掌管兩架織機變為掌管八架，使她的出產從四十公尺增加到一七二公尺。她說服廠長改變織機橫梁的構造，把拖帶按期清潔以防止滑脫，而這就使織機的速度從每分鐘一三五轉增加到一四五轉；同時她使梭子加大。

在一個製造X光儀器的工廠裏，

磨機匠科洛波夫增加了他的生產能力六倍，是首創用一種磨機來磨製兩頭釘的面，而不像以前那樣使用鉋機；用這種方法它們便可以兩面同時用兩個磨機來進行。在烏里特斯基工廠，金屬旋盤工成功了每班旋好十一個金屬帶，代替了以前的兩個半，是用兩個支柱代替了一個，和用一定的方式安置他的切器。在羅斯托夫的農業機器工廠，旋盤工普魯沙昌科增加了他的生產能力六倍半，單是用一種特形的鑿子代替了平常的一種。（見馬爾攸斯：「斯塔漢諾夫運動」，載一九三六年七月號「國際勞工評論」。）

諾西可夫，伏羅希洛夫火車頭工廠的一個鍛工，曾兩倍或三倍他的定額出產，解釋他的改進如下：『在以前，我慣常親自從熔爐中取出鉄條而把它們放在鉄鏈之下。但是現在我全部時間站在鐵鏈前，而由別的人把鐵條遞給我。我從一個地方移動別個地方時，那鏈子便停止生產了。』在新的佈置之下，那鍛工站在鏈子前，由一個助手把鐵條從火爐取出來而放在鏈子下，這樣鏈子便可以全部時間生產了。斯塔漢諾夫本人曾這樣說過：『每六個鐘頭的班次拔出六噸煤或多一點，不需要格外的努力。最需要的是確實地把工作組織起來。』斯麥塔寧作過類似的解釋：『許多人以為增加勞動生產力只能由肉體勞動的代價得到。再沒有比這錯誤了。勞動生產力只能由技術的圓熟駕馭而增加。』在另一場合，斯麥塔寧曾說：

『爲要工作得好，你必須熟知你的機器：你必須懂得它的內生活……我的一四〇〇雙鞋的生產，不是肉體勞頓的結果，而只是由於維持一種格律，和因爲我對於每一動作都加以小心的研究。』（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十四日第一次斯塔漢諾夫運動者大會）

另外一位斯塔漢諾夫運動者，伊凡諾伏紡織廠的基里亞諾娃也說：『假如斯塔漢諾夫運動要進步，更理智的方法要被採用……我曾達到了超越的結果，是由於消除不必要的運動，而這就是我的工作的全部祕密。』

這運動也不是沒有弱點和誇張，而在某些方面，它甚至變成有點熱狂。有時候它表現着短期的動率加速而犧牲了長期的成就。在有些毛織廠裏，管理織機數目的增加犧牲了每架織機的效率。有時候它被容許造成出產上的變動而很少注意到由此引起對「計劃」的其它部分的脫節（例如，對原料或裝具的增加需求）。理髮店裏，或製藥所工人們和修鞋匠摹仿它的機械企圖，後來在蘇聯報紙上成爲笑柄。但是這些例子，雖然它們常常給外國新聞記者提供好材料，跟這運動的堅實成就比較起來顯然是不關重要的。甚至像在科學工作的領域，有些它的慌忙採納也許造成笑話，但在原則上有許多地方會證明這種思想應被採用於工作的方法以及工作本身。很快地，注意便被轉到要獲得「工作上的相互調整，不單是屬於一種業務的各別部門或工場，並且是屬於所有在同一生產部門中合作着的有關業務」；我們曾聽到一個有趣的例子，一個加里甯紡紗廠的女工人首先在所有生產各階段的斯塔漢諾夫集團當中建立了一種「連絡縱隊」的制度。

若干年前，一種獎勵或保育敏捷工人的制度運動便已經被鼓舞起來了。這些有進取心的工人先鋒的衝成就增加了這種努力的重要性；而輿論特重於這一事實，即一個斯塔漢諾夫運動者的責任的一部



分是，不應滿足於表現出他能夠超越，而是要訓練更多的落後工人來追隨他的榜樣，和繼續不斷給他們以援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曾有一道訓令（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痛責那集中注意於個人生產紀錄的趨勢，而強調增加斯塔漢諾夫運動者和把這運動轉變成爲一種羣衆運動的必要。在這之前，在這運動的週年紀念日，職工會的報紙怨訴說，斯塔漢諾夫運動者的行列還沒有包括「大多數」的工人（雖然在許多工業中他們包括了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並力促職工會會員們幫助所有的工人變成爲斯塔漢諾夫運動者，而對於質的改進和量的增加應該同樣注意。對於遲慢出產的原因曾加以特別研究，而工場討論會被組織起來以研究適當的補救辦法。關於這，一個有趣的例子是（發生於兩年之後）一次在奧爾第奧尼基齊召開的沒有到達標準出產的慢手工人們的工作會議。這些人約佔全部計件工人的百分之六。這會議曾被形容爲管理工作上的奇蹟。被指出的原因中有：領班的常常更換，機器的停滯，工人的時間太多被佔據於準備工作的佈置上，和不適當的訓練；而被採納的補救辦法包含着：改善訓練的利便，和每個慢手工人被配置給一個較有經驗的以備諮詢和指導。新方法的特別教師被派到所有的主要工業中，而各不同工廠中進步工人的經驗交換以及特種斯塔漢諾夫運動學校的設立也被安排了。（註一）着重點的劇烈轉變發生於全部蘇聯的工業中，從機器到人民，而趨向於注重個人連同他的特殊問題和才幹。斯大林在一九三五年的一次演講中宣佈說：

我們慣常談，「技術決定一切。」……這一口號使我們停止了技術的缺乏……那是很好的。

〔註一〕一九三九年九月二十三日消息報曾舉出一些有趣的例子，關於斯伐得斯夫斯克的斯塔漢諾夫運動教師們跟烏拉爾建造工程技術參謀團的合作情形，後者是指導新工具等等的技術圖樣的適應，根據於他們在工作方法上所曾進行的實驗來給教師們以提示。

但它是不夠的，它是遠不夠的……沒有駕馭技術的人民，技術是死的。在能駕馭技術的人民的管理下，技術可以并且應該完成奇蹟……已經是到時候應該了解到，在這世界所擁有的一切有價值的資本當中，最有價值和最決定的是人民。

不是沒有理由的，「聯共黨史」結論中的一部分曾說，蘇聯的普羅列塔利亞「已經不是一種照這名詞的老意義的普羅列塔利亞」：它「已經變形為一種完全新的階級」——成為「一種爲人類歷史以前從未知道過的那樣的工人階級。」

這些革新者們所屬的男女類型不是毫無分別的。大多數很年青，在二十五到三十歲之間：蘇維埃新一代的男女，他們的工廠經驗和他們學校生活的後期是落在蘇維埃政權的時期內。不過，如莫洛托夫所指出的，大部分他們不是共產黨員。他們也有一些是在三十到四十五歲之間，而曾有長期的工業經驗的。但是他們當中最普通的特點是，他們曾受過某種類的技術訓練——至少會通過一般知道的事謂「技術最低度攷試」，不過，也不是他們全都這樣。例如，布西根是比較近年才從鄉村出來，從一個貧寒的農家出來，初時在高爾基汽車工廠的建造中當一名木工，後來在鐵工場當塗油匠。當他開始從事蒸汽錠的工作時，起初他不斷地調換職務，直到他怨訴說他從不曾留在一個職務上有夠長時間來熟練它，而苦惱得差不多像一個專找麻煩的人那樣發火起來了。先前他只是「半識字的人」，像他形容自己的，而在工廠裏「沒有人會教過我，我自己教自己」。如像斯大林所指出的，他們不是有野心的事業家或給自己做廣告的人：他們是「單純的和謙遜的人民，毫沒有野心要獲得國家人物的光榮。」他們是嚴肅者，有良心的工人，有着一種絕頂程度的對於他們的工作的自豪和對於他們的同伴的責任感——「有着文化和技術知識的人民，他們能夠適當地利用在工作上的時間因子，他們學會了計算

着不單每一分鐘，并且每一秒鐘。」（以上引文均見一九三五年十一月第一次斯塔漢諾夫運動者大會中的演講錄）他們對於他們自己的心得并不嚴守祕密，相反地，他們是頭一個強調他們的方法應該大眾化和願意把這種方法教給別人的。在一九三九年的過程中，他們曾經發動起來的運動的衝力展開了一個新的局面。這新局面在兩個地方同時創生起來，在烏拉爾和在哈爾科夫的機器工廠，而特別強調工人們對於數種生產過程的駕駛和管理機器的加多。（註一）

這種改變的成就的決定證據自然必須從它們對於勞動生產力的效果去找尋。不幸地在這方面我們不能夠獲得正確的統計證據，因為每人的出產數字不能使人們分別出那些是工作方法改變的效果，和那些是作為以前年間建設的結果而加入服務的新機器和裝備的效果。不過，有若干理由可以主要地歸功於斯塔漢諾夫主義的是，隨着這種革新之後兩年之間，勞動生產力增加的總數超過了曾被期望的——即它超出了「計劃」中所準備增加的分量。這裏我們至少可以從表面上證明這運動的成就就是很重要的。第一次五年計劃中一個顯著的缺陷是，勞動生產力沒有提高到曾被計劃的程度（因此生產價值沒有達到被要求的程度）。就全部工業來說，第一次五年計劃曾準備每個工人的生產力提高一倍（照一九二六—七年的盧布價值計算）；而到一九三二年，實際的增加還不及百分之二十五。第二次五年計劃所預定的增加率較低，即百分之六十二。但是比照於前期，這數字實際上被超過了，而到一九三七年，便達到比一九三二年增加百分之七十八。（註二）莫洛托夫在一九三九年三月十八次黨大會

〔註一〕關於後來斯塔漢諾夫運動的進步，一九四〇年六月曾有一個有趣的例子，當時有一個列寧格勒的職工發明了一種十分便宜的電力裝置，當機械中有需要注意時便亮起信號，而有破損時便自動停止，這樣便增加他能照顧的機械數目。

中的報告宣布說，「我們在第二次五年計劃時期增加勞動生產力的計劃被超過了，是因為沒有什麼計劃能夠爲斯塔漢諾夫運動作準備。這增加在第二次計劃的最後兩年在重工業方面特別顯著。在鋼方面，每個工人每年的出產是一九三二年的二五三噸增加到一九三六年的五七五噸和一九三七年的七四〇噸（或者略多於德國的，雖然未到美國的一半）。（註三）在斯塔漢諾夫主義創始的一九三五年，是『多年來工業第一次完全完成它的減低生產成本的計劃』特著的一年，而大規模工業的勞動生產力曾提高了百分之二、九，比照於一九三四年的百分之一〇、七和一九三三年的百分之八、七。（註四）在第二年的頭七個月中，重工業方面的生產比上年同期增加了百分之三六，而「計劃」所準備的只是百分之二六，而勞工供給也只增加了百分之六。『計劃』曾預定一九三六年重工業方面每人的出

〔註二〕這是引自貝特爾海姆的「計劃經濟」中關於一九三七年大規模工業的數字。莫洛托夫在一九三九年三月的十八次黨大會中的報告舉出第二次計劃末期百分之八十二的更高數字。哥林·克拉克先生把一九三四年一七的三年間加以估計，而下結論說，一勞動人民每人的平均收入整個來說在一九三四和一九三七之間增高了百分之四十二（蘇聯統計論頁六八）。

〔註三〕有些工廠如馬格尼多哥爾克表現了更高的數字（由於它們的超等裝備），勝過了美國的平均數字，不過這些還是例外的。一九三六年每人每天的平均煤產從頓巴斯的二〇二〇公斤到庫士巴斯的一九八八公斤，比照於英國在一九三六年的一一九四公斤和魯爾（德國煤區——譯註）的一七一〇公斤。

〔註四〕參看「國家計劃委員會」一九三六年編的「第二次五年計劃」。馬爾考斯指出在一九三四和一九三五年每人每小時的增加是百分之一〇、六和一、七。這一時期每人每年的出產是傾向於比每人每小時略加快一點，這是由於曾設法減少缺席，因而增加每人每年的工作鐘數。但這差別是很小的。馬爾考斯指出在一九二八年每個工人每天的鐘數是七、三七小時，（包含加工）而平均一年的工作日數是二六四、二天；在一九三四年這相應的數字是七、〇九小時和二六七、七，一九三五年是七、〇六小時和二六八、二。

產增加百分之二三；但是單在頭七個月它便增加了百分之二八。同樣的，煤工業方面每個工人的出產在這同一時期增長到意料之外的百分之二二、九。（註一）於整個工業來說，勞動生產力的增加在一九三六年近於百分之二十；比去年的高數字增加了百分之五十的比率。

在第一次五年計劃時期改進生產力的過程中，照成果支付工資的制度在工資勞動者當中已經很普遍；而到三十年代的後期，差不多有四分之三工人是照這制度的種種變相支付工資的。在煤礦中，這百分數高到百分之八十，每十個地下工人中有九個是用某種計件形式雇用的。在建築方面，泥水匠和漆匠有着一種集體的計件制。這是對於斯大林在一九三一年六月的有名「六點演說」所特別提到的工資激勵加以強調的，在這次演講中他強調需要使工資結構能對工人們的獲得訓練（因而提高熟練的程度）和增加生產有最大的激勵作用。這是爲着要嚴格遵守個人負責的原則和終止工業上對於人的因素的輕視，同時爲着使技術人員和「專家」有較好的條件和改變對他們的態度。他說到勞工市場上由於

〔註一〕斯特勞斯曾經視斯塔漢諾夫運動爲「一種官方宣傳和官方壓迫的造作」以及「自然沒有什麼工人階級的羣衆運動」，他的奇怪論據是說，像在一九三六年所獲得的那種進步，必須用「一九三七年的嚴重退步」的代價來購買，因爲勞動生產力的增加在一九三七年又較小了。（見所著「蘇聯」，二九七頁）。因爲在運轉我們所涉及的是生產力的增加率，我們只談到每年改進的結果。真的，那結果會是很嚇人的，要是斯塔漢諾夫運動在所有隨後的年間都保持了同樣的改進率，如像它在它存在的頭一年那樣。假如我們面對着以後年間的生產力實際退落，人們便可以有理由說「退步」——短期的收穫用長期的生產力損失來購買——而不是由於單純的改進率的鬆弛。但是事實上，改進率在一九三九年又顯示出一種新的暴漲，隨着上述的斯塔漢諾夫運動的新的浪潮而來：在一九三八年，勞動生產力增加百分之十一，而一九三九年增加了百分之一六、七。

失業的終止和代之而起的勞工缺乏情形所產生的新局面，那是需要『用一種有組織的方法徵募勞工，』代替了『像我們從前所做的，依靠於勞工的自動流轉』，和『用有組織的工資新方法』來對抗『工人跳廠』。(註一)他說：

在有許多工廠中，工資尺度是那樣的，差不多毀壞了熟練的和非熟練的勞工之間，以及重工作 and 輕工作之間的所有差別……我們不能再有這樣的情形，要一個鐵工和一個清道夫同等待遇，而一個司機的所得不比一個錄士多……我們再不能容忍工業中人格的蔑視……勞工必須被給與這樣的配置，使每一個工人集團負責它的工作，它的機器和它的工作的品質。

關於工程師們和「專家們」，他能夠看出一種有意義的『某些部分從前表同情於沒落階級的智識分子對於蘇維埃政府的態度的改變』；他說到『一大羣那些甚至昨天是沒落階級的，已經開始在許多工廠中和工人階級攜手工作着』，因而表顯出『在舊派技術智識界當中已經發生着心理的改變』。『工人階級必須建立它自己的技術智識界』，而同時『那是我們的任務，要改變我們對於舊派技術智識界的態度，對它的分子加以大大的注意，把他們拉進合作的工作中，和改善他們的物質境况』。(註二)強調個人負責的結果之一是，單人指揮的原則的更加堅持：這原則從前曾有一些時候在理論上被採納，但不是常常在實踐中被完全注意到。在另一個場合(在第十六次黨大會)斯大林曾率直地說：『工人們不斷訴苦說，「工作沒有主腦，沒有系統」。我們再不能容忍讓我們的工廠從生產機構變形而為議會。』

[註一]他還說『我們有很多的工廠沒有在最近六個或甚至三個月內變換它們的人員至百分之三十或四十的。』  
[註二]是一九三一年六月二十三日在經濟學家和工業經理人大會中的演講。

一種極普通的計件工資制的形式是那所謂「累進計件率」的制度，而在許多工業中，大部分計件工人是用這種方法支付工資的。（註一）在這制度下，在一定出產率之上的報酬是用一種累進率加多着。例如，各種不同工作的出產定額（作為每單位時間的出產率）是被首先規定了的：這定額由職工會的工廠委員會和經理部共同議定（各種不同工作的技術評價另有專人負責），而一經確定之後，這定額在每年或每季計劃的所有計劃預算中便居於一個決定的地位，所有超過定額的出產使用比基本計件率高百分之五十的工資支付。在有些情形中，超出定額百分之十是照百分之五十的更高率支付，超出百分之二十是照平常的比率加倍支付，依次類推。低於定額的工人仍照標準率支付工資而不加多；不過假如他的工作遲緩是由於他力能控制之外的原因，他的所得被保證於常態所得（即一個工人做到定額生產的所得）的三分二的最低度。顯然的，這制度的效果是給與超過以前的平均數或常態出產率以上的任何出產速度的增加以一種特殊的誘導，和增加對超過常度的更大距離的誘導。這樣，它便代表着對於工業先鋒們的一種特別獎金：加給那些由改進工作方法或加大努力而給同伴們提高了熟練標準的人們。自然，一個提高標準的模範工人是應被珍愛的，尤其是在這一特殊時期，當（由於勞工從鄉村向工廠的傾流）工業中的勞動部隊日益加多地由新的農民徵募所構成，並且緊迫需要着打破悠閒和紊亂的舊傳統，而要從那樣珍貴的新基本裝備中吸取每一盎司的力量。

不過，這一報酬制度是和它類似制度一樣有着一個難題。當工作的較高速度是較大努力的產物時，關於增加報酬自然有許多話可說，不只是比例地，而甚至照比出產的提高更大的比例（因為，在

〔註一〕例如，在一九三七年，鋼鐵業中有百分之七十五的工人是計件制的，而這些人當中，有一半以上是用累進計件率計算。

定額之外，任何出產的增加是一步比一步困難的，並且包含着逐步增大的緊張。除了少數例外，這樣做不會引起特殊的困難。但是當較高出產是改進工作方法的結果時，情形便完全兩樣了。新方法一經被採用，較高的生產率便不一定是由於工人們的較大努力（至少，不是照出產提高的比例）。此外，較高的速度不再需要為少數人所特有；它們可以變成爲一般的了。甚至「慢手工人」也可以摹仿先鋒們和學習新方法，而從前被認爲例外的速度終於不再是強者或有力者的專利品了。當遇到這種情形時，問題便立即發生了。從工資值方面來說，這改進歸結於不是一種下降的而是一種上昇的生產成本；因爲出產額的一定增加已由工資上的超出比例的增加所對消了。

當第一次五年計劃時期，在勞動生產力上曾發生的增加無疑地主要是由於工人所用的技術裝備的改進；這種改進是以前年間基本投資的成果。新的機械過程曾被建立；新的和現代化的工廠曾被開設；標準化曾被擴大，而跟着改進了生產的不斷流轉的方法。古比雪夫在第十六次黨大會的報告中曾指出，在過去三年內所曾發生的，每個工人在出產上的增加，是密切地關連於這些年間對每個工人的基本投資的增加，並加上說，「這兩組數字的相互依賴是很明顯的」。（註一）

五年計劃的原則之一是，由當時的巨額投資所造成的生產力應許使生產的貨幣成本大大地降減（因而使投資的機會擴大或使對消費者的最後價格降低）。這需要着工資率提高的比例應小於每個工人的生產力的增加。部分地這是工人們是否以消費者的資格通過較低價格或由貨幣工資的直接增加而分

〔註一〕關於技術改進的一種量度是，工業中對每個工人的動力供給（以每人每小時的瓦時計算）在一九二八年和一九三二年之間增加了百分之三十三。（見「國家計劃委員會」出版的「第一次五年計劃的完成」，頁二七五）



享被增加的出產的問題。「計劃」中體現的政策選擇了這二者之間的折衝。但這不只是實在工資的最後增加應循的路線問題。無疑地，在這樣一個社會中，在那裏所有的收入都是由某種方式的工作收入所構成，而利潤不再作為一種收入範疇而存在，是沒有工業收入的兩個階級（工資和利潤）之間分享所得的爭端的。（註一）因為投資效率是一種政策決定，它構成「計劃」的基石之一，貨幣工資上的改變和生產力上的改變之間的關係甚至不影響到被投於基本建設上的總數——比較於被直接消費的總數來說。不過因為農業是以集體耕種的而不是工資的制度為依歸，農業人口的收入在工業貨品的名義下將依靠於工業和農業貨品的相對價格；而因此關於工業貨品的物價政策對於耕種人口和工業工人之

〔註一〕伏斯奇斯（後來的「國家計劃委員會」主席）在一九三二年的「積蓄和消費之間」存在着一種相對的矛盾。但還只是現在與將來之間的矛盾。它并不含蘊着敵對的階級矛盾。〕見一九三二年一月十日的「布爾什維克」。〕

有些現代經濟學者斷言，甚至在資本主義社會，貨幣工資政策（例如，貨幣工資是否隨着出產的增進而提高）對於全部生產品到達勞工手上的分量沒有什麼差別。因為這是為着整個制度而由他們所稱的「壟斷程度」所單面決定的。不過這「壟斷程度」的曖昧觀念，進一步分析起來，顯然包含着「交易強度」，「價格韌度」，等類的事情，而因此本身可以受被採用的貨幣工資政策的影響，可是在一種計劃經濟中，在那裏投資和消費貨品的出產是由一致的決議直接計劃好的，貨幣工資的水平無疑地對於消費水平不能有什麼影響（除非是通過一種心理的激勵而加影響於消費貨品工業中的勞動生產力）。事實上（如我們在前章所看到的）在「計劃」所據以決定的一定投資率之下，零售價格對成本價格的比率，（以工資來算）必定是這投資率的一個函數，而所定貨幣工資的水平將單只決定價格的水平以及為調節那價格水平所需要的貨幣總數；它不能影響上述的比率，因此不能改變一般的工資購買力。

享消費貨品的有效供應的方法是一個重要的決定因素。(註一)

這樣一來，如果增加生產力的所得是由較高的貨幣工資和生產的較低貨幣成本所分享，那構成計件率的尺度基礎的出產標準將需要隨着勞動生產力平均數的提高而每年加以修正。事實上，這正是蘇聯在三十年代初期所實踐的。(註二)只要生產力的提高完全或主要是由於新裝備的出現，這是毫不成問題的事情，雖然要使這種調整不致擾亂的各不相同工作的和不同工業的工資之間的關係，不能不有一些困難發生。可是由斯塔漢諾夫運動所造成的改進却創造了一種新的形勢，並在引起生產的計劃成本 and 財政計劃的大變動上有着破格的結果，這種改進有點像是估計不到的。即使它們是新技術的直接產物，它們也不是新裝備的而是工人們自己的開創力的直接結果。在強度的累進計件率之下，斯塔漢諾夫者們收入的增加是很可觀的；而當這運動攫取了廣大的工人羣衆，和影響了普通工人的出產時，這結果便不只是超出預算地膨大了整個工資清單，並且實際上提高了，而不是降低了，生產的單位成本。許多斯塔漢諾夫者們在幾個月內便三倍或四倍了他們的收入。斯塔漢諾夫本來每月賺五百至六

〔註一〕無疑地，因為作用的是工業和農業生產的相對價格，以及這每種對於工資的關係，假使貨幣工資和農業生產的購買價格同時提高，而工業價格不變，那結果正如工業價格降低，而工資和農業的購買價格不變時一樣。教科書中所說的——關於工業價格所定的政策造成城市與鄉村的相對購買力差異——只有在某一定的農業購買價格的政策之下才適用。

〔註二〕一個半官方的關於定率的報導說「每當生產的技術過程有改變時，或每當標準因新方法出現而變成不合用時，這標準是要被修正的，並且通常是至少每年一次。」(轉引自哈巴德的「蘇聯的貨幣與財政」)。

百盧布，到一九三五年九月，十八班的工作便賺一千盧布，而別的同僚有在一千至一千六百之間的。布西根的收入從三百和三百五十之間到一千以外；克里伏諾斯從四百到九百；諾維格拉多娃從二百一十六到近一千二百。（註一）有一個時候，關於出產標準在新形勢中的正當處置曾相當混亂。在某些場合中，工業經理部顯然的由於面對工資清單的膨脹而主張提高它們（即是，提高使計件工人能夠獲得基本工資所需要的出產標準）。例如，我們發現重工業的機關報「工業化」認為必需提醒工業的經理們，重工業人民委員會曾有一道命令要一九三五年春季所採用的新出產標準從那時起在十二個月內不要修改。（註二）明顯地，標準的任何突然改變會使新方法的先鋒們洩氣；至少，這會使他們更難於說服進取心較少的工作同僚們來學樣。有些頑一批的斯塔漢諾夫者們努力會遇到若干障礙，不是來自經理們的固有保守主義或對於效果脫節的恐懼，因而對於新方法表示懷疑，而是常常由於他們的工伴同僚們不願意歷史悠久的工作方法受到任何擾亂，或憑古老的偏見反對「工作加快」。甚至斯塔漢諾夫本人也曾面對着「一些工人們因他的新奇觀念而擲錢和奚落他。」計件工資率的任何突然降低都會給這種反對以藉口，而使那些認為斯塔漢諾夫者們的額外收入只是以現在的薪水包被縮小慢手或甚至平常工人為犧牲的怨謗成爲理直氣壯。不過，同樣明顯的是，新的工作方法一經被大眾化，工廠中大部分工人的工作速率因而根本上提高之後，要維持舊的生產標準一成不變是不可能的。無論如何，假如這種標準被維持住，當定量分配解除後需要着加强的努力來降低零售價格時，工業成本的整個結

〔註一〕參看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十四日第一次全蘇斯塔漢諾夫者大會的報告。

〔註二〕職工會中央委員會也曾於十月十七日宣布有些經理們已經嘗試修正出產標準，并說到標準應該在一年的期內穩定化。

構便會被弄得激烈地膨脹了。(註一)

因此這是一定的，新方法一經在工人們當中被廣泛地採納，而使較落後的工人有改進他們的出產的機會時，生產標準的向上修正便必然發生。在一九三六年的過程中，這事情在大多數工廠中都被做到了。到八月底，便被宣布在重工業方面有百分之七十至八十的計件工人能夠達到或超過新的出產標準；這是說，把合理化的工作方法同化到足夠的程度，使沒有因標準改變而遭受收入上的損失。因此沒有什麼理由足以證明這樣的說法，認為斯塔漢諾夫運動的一個顯著結果是創造一種勞工的貴族階級，他們的較高收入是以大多數非熟練工人為犧牲。有一小部分，至多構成勞動力的四分之一或三分之一，也許由於標準改變而遭受若干收入上的低減；而這種人有很多也許就是那些同一的人們，在定額分配解除以前是把他們收入的相當大比例化費在定額分配的食糧方面，因而反受定額分配的便宜價格的取消的影響。許多斯塔漢諾夫運動者們無疑地在這高水平上也感受到收入的降減，因為他們在成功後頭幾個月便有這高水平的收入；雖然跟他們的本來地位比較起來，他們根本上仍舊是有利的。

[註一]無疑地，斯塔漢諾夫運動的效果有一部分已成為資本積蓄。這問題有兩方面：首先，它使一個工廠增加了出產；其次，它使當前的既定投資量向前發展，因而歸根是更生產性的。關於後者的一個例子是輕工業人民委員長留比莫夫在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廿一日關於靴鞋業的報告：「鞋工業方面的斯塔漢諾夫運動將使我們能夠穩妥的工廠和目前在建造中的新工廠來完成五年計劃，而取消那種準備管第二次五年計劃建造兩個各值三千六百萬盧布的新工廠的念頭，因而節省了七千二百萬盧布。」此外，塔根洛格一個汽鍋工廠的生產曾被增加了四倍至五倍，因而使新工廠的建造成為不必需。成本上的純效果是每單位出產的交付費必然降低了。但是跟累進計件率制度下的單位工資值的增加比較起來，這種效果無疑是很小的。

(註一)同時，如我們所說過的，有一種強大的運動曾被發動起來，使這些慢手的或訓練不夠的工作人們能有機會達到新的標準。事實上，我們所發現的情形是，一切合作的企圖正和要保全待遇較好的少數份子的差分特權剛正相反。

採取一致的努力以增加熟練的和技術的工人數目到相當空前的度率，曾經是第一次五年計劃開始以後勞工政策的特徵之一。雄大的計劃被着手了，它們的規模之驚人，不單表現於專門的技術學校，那在一九三六年有近七十萬學生入學，三倍於一九二八年的數目，同時也表現於訓練合格工程師和專家的大學工程和技術學院。同時，這些又被輔助以工廠學校，由領班或本業中的機械師和工程人員給熟練工人們授與短期課程，而在課程終結時舉行一次合格考試。結果是，經過兩個五年的時期，熟練機械師的數目增加了四倍，工程師和工業科學家增加了七倍。

在第二次五年計劃的末尾，工資的地位被列成許多範疇，從重工業的八級到織造業的十五級，最

[註一]一九三六年曾經在莫斯科的卡加諾維支球承工場作過一次特別研究的喬治·菲得烈德曼發現在這織造廠中有些工人們，在斯塔漢諾夫運動降臨之前一個月的平均工資是三百盧布，到一九三六年春季便增高到七百至八百盧布；而在新的出產標準被提出之後，又復降低到五百盧布。不過他認為「自從斯塔漢諾夫運動之後，平均薪金總是提高了，而這不只是所謂真正斯塔漢諾夫運動者們的收穫。在「紅露」織造廠，他發現了一種較低的工資水平，中點約二百，而最高和最低的距離是三百至一百四十五。約有百分之十七是超過三百五十盧布的。這些數字包括了學徒和練習生的。一九三六年春季標準的向上修正約提高平均數的百分之三十。

關於報酬的最低度，已經通過從第二年起每年有六萬萬盧布，使最低工資範疇的工資提高到計時工人每月最低一百一十五盧布，計件工人一百一十盧布。

高的和最低的範疇之間的差別大約從一到三。這包括了在標準出產率上的各級收入。實際收入的散亂自然比這更大，因為許多計件工人的生產和收入都遠遠超出了標準率，而在另一方面，慢手工人必落後於它。當這事情被打算在內時，最高報酬級的平均收入滿可有五倍或六倍於最低級的。（註一）斯塔漢諾夫運動者們依例達到出產標準而品質大大超過常規標準者，除了他們本級的常規工資外，一般獲得百分之十或更多的獎金；而這就使他們的收入達到加倍有時甚至三倍或四倍於同等級的非斯塔漢諾夫運動工人的所得。在一九四〇年以前，常常碰到一個領班所得的工資少於熟練工人的平均數，因為斯塔漢諾夫者們佔了他的部門的一個大比例。因此，從一九四〇年六月一日起，領班們的比率被提高到一種程度，從每月最低限度的五百至五百五十盧布到最高限度的九百五十至一千一百盧布。自此以後，領班們并被分派以高生產的紅利，即當他們部門的生產超出計劃定額時，他們便分得一份紅利。

〔註一〕在一九四二年四月號的「政治經濟雜誌」裏，有一種關於一九二八至一九三四年蘇聯收入的統計分析，產生了一些很有趣味的結果。首先，這分析指出了一九三四年收入的「散佈」跟別些國家的工資收入很少分別。其次它指出了，雖然在一九二八和一九三四年之間較低和較高報酬的工人之間的收入「散佈」增加了，它却比一般所想像的少得多，而單從工資獲得者方面來說，「散佈」的增加是不足重視的。在評論工資收入的頻度分配時，柏格遜先生發現，「工資獲得者和薪水工作者分配的第九位依據一九二八年三月的收入是三、八一倍於第一位的。而單是工資獲得者分配的第九位依據同一時期的收入是二、六六倍於第一位的。關於一九三四年十月的相應分配，這兩位的比率各是四、一五；一和三、七四；一。不過他提醒注意說，這些比率「不單受影響於不同工人的相對收入的變化，並且受影響於不同收入水平上工人的數目」。這裏必須被記住，一九三四年是在斯塔漢諾夫運動之前的；自從一九三五年以後，收入的散亂無疑地會是較大的。

有專家資格的工程師和技術家是以特殊的比率來報酬的。自從斯大林在一九三一年的「六點演說」以後，這種比率也大大地增加了。同時，在住居和食用上也供給他們以優異的便利。在一九三五年，工程師和技術家的每月平均所得是四三六盧布，而公務員的平均所得是二三四盧布，非技術工人一八盧布，所有工資和薪水的獲得者的平均數是一九〇盧布。工程師和技術家的特殊利益中還有一種有趣的特權，就是當被組織在他們所隸屬的工業的專業職工會時，他們在這會（E. T. S.）裏形成了特殊的小組，有着相當大度的獨立性，而在全國規模上由屬於職工會中央委員會的一個特殊機構聯結起來。這種小組可以派代表參加任何關於工作條件的商議；他們在有關委員福利和借款的工會基金上有着特殊的待遇，而甚至這種 E. T. S. 小組有着全區的或全聯邦的特殊會議。一九三二年三月二十五日，政府曾訓令「國家計劃委員會」在以後兩年內，除了那些在新工業區的設備外，特別替工程師和技術家安排住居的便利，命令中詳細註明以三個或四個房間一宅為標準，外加廚房和浴室。（註一）不過，雖然技術和管理人員在報酬和境遇上比手藝工人和屬員享有較大的便利（但常常并不超過斯塔漢諾夫運動者的），這其間的差別依然遠不及英美的一般情形。國際勞工局的兩位報告員在一九三六年記載說，他們曾訪問了一些雇用數千工人的工廠的經理，這在美國會一年拿五〇,〇〇〇美元，而在蘇聯的每月最高報酬是二千盧布（比較當時的平均工資約九倍），他們并說，「雖然他們有別的特權，如使用汽車等等，他們的生活標準事實上是很謙遜的」，又「這些人民所提供的 workload

〔註一〕曾規定在莫斯科應有十個這種住宅區，每區包含三十宅；在列寧格勒五個，在哈爾科夫和斯大林格勒各二個。此外，包含一百宅的嚮住宅區要在其它二十七個城市建立起來，包含五十宅的住區在另外六十七個城市建立。

以及他們對於職務的獻身不是用金錢的報償來度量的。』更值得注意的是，這種技術知識界的範疇，如像近年來它被主要地訓練和培養的，是屬於一種新型的知識階層。從它的社會根源來說，到一九三三年它便已經充分改變了十年或十五年的範疇，而其中有百分之六十五是出身於舊日的農民和工人，或農工家庭的孩子。到三十年代的末尾，這比例必定達到百分之八十了。

在一九四〇年以前，在技術人員和熟練工人方面，勞工徵募大多是用廣告的方式進行，而一個工人或工程師常常可以自由解除在某一企業中的雇用而跟另一企業訂立新約（例外的事情將在下面述及）。流行的勞工跳廠率之高就是這事情所達到的程度的明證。各企業間對於勞工的競爭達到一種可觀的程度，假如不是藉提高他們的工資等級，便是藉改進他們的生活條件和別的優待，或藉各種方式的升格或訓練和升遷上的機會。此外，各工業之間的工資差分也達到可觀的程度，而以那些勞工的需要日益膨大的地方為最高。例如，在一九三〇年以前，重工業的某些部門（如煤，鐵和鋼）報酬是相對地低的。到一九三一年，經過職工會中央委員會跟最高經濟會議之間的協議，在採礦，鋼鐵和重化學品。後來并在鐵路方面，工資便比較其它方面的工資提高了。這事情的結果是，照一個蘇聯人的解釋，發生了『勞工流集向工業的領導部門，如冶金的，化學的，和煤的工業，亦即那些國民經濟的別的部門所依賴的部門，而那裏的工作環境是比在輕工業中遠較艱苦的。』到一九三七年，在一九二八年的相對工資級中佔第十三位的煤業，已昇高到第二位；重工程從第九位移到第五位，而從前是第八位的石油業，在一九三七年便名列首席。關於它的非熟練勞工，工業是大大地依靠於跟集體農場訂立的勞工供給協定，根據這種協定，後者同意在它們的成員當中替工業企業找出一定數目的工人，依照一定的工資率，而以至少六個或十二個月為期。在一九三八年，約有一百五十萬工人是用這種契約的



方式被雇用於俄羅斯共和國的工業中。每一共和國都有特殊的勞工徵募委員會，來監督和協助根據這種契約形式的勞工運動，在每區設有下級委員會，來登記勞工的需求和調查有效的供給。在一九二九和一九三九年之間，當聯邦的全人口增加了約一千五百萬時，工資和薪水收入者的數目增加了近似同樣的總數，從一千二百萬增加到二千七百五十萬。但是因爲在這同一時期農村人口減少了約一千二百萬，都市僱工的一個大量數必定是來自鄉村的移民。據哈巴德先生的估計，工資和薪水收入者（在工業，運輸等中）的增加數約有一千萬是出於這種來源，而其餘的五百萬是來自「都市人口的自然增加和工業中的婦女徵募。」（註一）在技術人員方面，那些從重工業人民委員會的特殊高級技術學校出身的，却有着特別的義務要接受被指定給他們的職位，這在別種情形中是不存在的。在畢業的時候，他們有義務接受人民委員會派給他們在某企業中的位置，而在那裏保持三年的時期（除非被正式允許調職）。

不過，勞工的跳廠和缺席，即使在三十年代的後期，仍然是嚴重的問題，不管曾努力用金錢的激勵和培養對於工作的新態度來對抗它們。這事情是一點也不足爲奇的，因爲這些年間從鄉村急促流注進工業中的新勞工是不慣於工廠工作，甚至都市生活的約束的。有些新的工廠（斯大林格勒牽引機廠在三十年代的初期便是一例）發現很難開始正常的生產，因爲它實際上變成了工人訓練所，每當它獲得少許的充足力量時，別的企業便從它那裏拉走新徵募的勞工。這種勞工跳廠在一九三〇年達到了它的最高峯，這以後便低落了，特別在一九三三年之後；不過甚至這樣，它仍然保持着驚人的高度

（註一）哈巴德先生承認「蘇聯公民有着他們將在那裏工作和他們將爲誰工作的選擇自由。」（均見所著「蘇聯的勞工和工業」）

(註一)。遲到一九三八年，我們還在報紙上發現一篇動人的通訊，在這裏面經理們，斯塔漢諾夫運動者們，以及工廠委員會的委員們一起指出一些例子，生產是怎樣由於少部分工人的懶惰和高度勞工跳廠而至脫節。一九三八年一道最高蘇維埃的命令的事由曾說到不準時到班的盛行，以及工人們每星期只有四天或五天出現於工廠，和每間隔一個時期便從一個工廠跳到別的工廠。這命令要經理們注意一種規矩，沒有正當原因的缺席便是解雇的理由，而這種缺席包含了二十分鐘以上的遲到，並且規定一月內有三次或兩月內有四次不正當的缺席，而經理們不強行解雇的，他們自己要在將來受到處分。它又規定將來有十一個月（代替了五個半月）在同一作業上服務的工人，才可以有兩個星期的帶薪假期；因為放肆的份子以前常常不顧規矩，從一個工廠跳到別一工廠，每處逗留五個半月，一年中獲得了兩次假期。同年十二月二十日又有一道含有類似目的的命令，規定兩種進一步的辦法：其一是設立一種工作簿，由經理部把一個工人離開他先前職務的理由記錄下來，而由工人呈交他新入工廠的經理部；其二是社會保險規矩的修正，使一個工人依照他在同一作業所守的時間長度而分別福利的等級。

在一九四〇年六月，富法國在康遜森林屈服之後四天，蘇聯工業便實際在一種戰爭的立足點上來進行勞工訓練了。首先，那愉快的每天七小時工作（是任何國家中最短的工作日）——在繁重職務和在文書工作上，曾經有六小時的）被取消了，而代替以八小時的正常工作日（註二）。此外，計時率，出

〔註一〕全部工業的跳廠「增加」率是，以受雇工人的平均數目的百分比來說，官方宣佈如下：一九二八年一〇〇、八；一九三〇年一七六、四；一九三二年一二七、四；一九三四年一〇〇、五；這以蘇俄低於一〇〇。這比率在採礦中最高，而在棉業中最低。

〔註二〕先前六小時的工作現在改為七小時，但公務人員則由六小時延長到八小時。

產標準和計件率也被修正過來，使每星期所得趨於一律。結果是，每天所增加的鐘點代表着全部工人對於蘇聯國防計劃的一種貢獻。七天一星期代替了六天一星期，而每第七天是休息日。職工會中央委員會接受這鐘點的加長時曾說到在迅速惡化的國際形勢中「蘇聯被進攻的危險」，以及「爲着和平的利益，必須進一步增強蘇聯國防的和經濟的力量，發展工業，生產更多的金屬，燃料，鐵路車輛，金屬的和木料的機器，卡車，飛機，坦克，大砲和火藥等等。」這文告還譴責「那少數分子（工人），約佔百分之三或四，年青而新進工業中來的，藉着由一個工廠跳到別一工廠來忽略他們的責任和使生產脫節。」（註一）和延長工作鐘點同時，還下來一道官方命令，跟我們的戰時「基本工作法令」大同小異，它申令一個工人如沒有得到經理部的准許便離職或犯經常缺席罪要交法庭處分。

十月二日，又有一道命令替青年工人們設立新型的職業學校，強迫青年分子進入這種學校。這命令的事由說，因爲「將來的蘇聯工業擴張需要一個新鮮勞工的不斷洪流到採礦和運輸，工業，工廠和工場中去」，「國家正面對着從城市和從集體農場的青年人民中有計劃地訓練新工人的任務，以便創造工業所需要的勞動後備軍，」三種型的後備軍被建立起來：十四至十五歲的男女兒童職業學校，

〔註一〕見一九四〇年六月二十六日的「工業」報。五天前該報的社論曾引證了一些缺席和不其勞工訓練的開子。在紅三角橡皮工廠中，九個壓榨工人有一天未經請假而缺席，致使每班的生產減少了六，〇〇〇對壓鞋。其中五個人是因上晚參加宴飲，致翌日不能工作。另外四個是開小差走了，讓在別的地方弄到一份較好的工作。當審訊這種事情時，許多經理們只着眼於遊蕩者的行爲，而很少提及上面所說到的當他們受雇時他們的工作簿上過去的紀錄。這社論指出了，有時高度的勞工跳廠是「由於管理員和黨部對於生產的正當組織或工人的文化和生活條件沒有給與充分的注意。」它的結論說「對遊蕩者的自由處置應該

是終止的時候了。」

兩年的課程，訓練金屬，化學，探礦和油工業方面的，以及運輸，郵務和電信方面的高級熟練工人；十六至十七歲青年人的鐵路和職業學校，每種六個月的課程，後者訓練一般熟練的和半熟練的礦工，建築工人和金屬工人等。學生在校時由國家供給費用；入學者由城市蘇維埃和鄉村的集體農場主席選送，青年總數從八十萬到一百萬人。在完成學程之後，學生們有義務接受在被派定給他們的國營事業中工作四年，而同時可以豁免任何兵役。這和高等學校及大學的公費生制相融合（不是那些達到一定標準的優良成績者），似乎帶有一種目的，使那些沒有達到大學獎學金標準的學生不進大學而改入職業學校。十月十九日，工業人民委員會更被授權把工人和技術人員從一種企業轉移到另一企業，「隨便安置」。這命令宣佈說「直到現在人民委員會還沒有權作這種轉移，而這對於國民經濟的發展會產生了妨害的效果」，而強調着需要「工程師，技術人員，工頭和類似人物在不同企業中的合理分配」。這命令率直地說到現在「如果有需要，工人們必須被從一種企業轉移到另一種企業。」不過，這種轉移「必須不使個人受到任何物質上的不良影響，它并規定供給被轉移者本人以及他的家庭的旅費，遷移他的屬物的費用，和定居費；他可以領到旅行期間以及此後六天的工資，和一張旅行證；而經理部必須不阻止被轉移人的妻子離開她們的現職。任何人拒絕奉行這種轉移命令的，要跟那些照六月二十六日的命令（註一）所說的「擅自離職」的人受到類似的處分。這是蘇聯抵抗希特勒進攻的一種準備工作。這證明了在蘇德戰爭實際開始以前一年，為戰爭努力的勞動力便已經動員起來了。

〔註一〕這命令不適用於第六範疇以下的工人，即非熟練工人。

## 第四章 戰時經濟動員

過低估價德國侵略對於蘇聯的工業能力以及它的經濟戰爭潛能的嚴重傷害，那是愚蠢的。特別是德軍佔領頓內次和頓河區所引起的損害，那裏是工業上和農業上同樣富庶的區域。到一九四一—四二年度冬季，德軍所佔領的還不到蘇聯全部領土的五分之一，但這裏是人口最密和經濟最發展的部分，包含着全人口的百分之三十，全部都市人口的百分之二二、五，和鐵路網的百分之三十七。在戰前，這地區擁有全國穀物的百分之三十，牲畜的百分之三十，和糖蘿蔔的百分之九十。假如把曾受德軍威脅着的北高加索，斯大林格勒和伏羅內茲區加進去，便有百分之四十五的小麥，和百分之四十一的裸麥出產在戰爭的地帶內。單從工業來說，佔領的最嚴重影響是在鐵礦的供給，以及鐵的和鋼的製造能力。隨着克里李洛格的喪失，它的鐵石出產有差不多三分之二去掉了；隨着頓內次盆地的喪失，去了它的煤產一半以上。烏克蘭擁有它的一九四〇年的銑鐵能力近百分之六十，它的鋼能力約百分之四十六。最近在伏爾加夫和薩波羅什建造的兩個主要鋁工廠已在戰區之內。機器工業似乎被安置得較好，拜攸夫博士曾估計一九四一—四二年度冬季「約有百分之二十至二十五的機器工業生產能力損失在佔領區」。不過，雖然多數機器工廠是在莫斯科和列寧格勒，並且繼續工作着，而許多最近建立的工場是在伏爾加或烏拉爾，可是有一個很大數額的重工程，特別是機器工具的生產，曾被置在已被德軍陷落的地區如哈爾科夫。盟國輸送給它的經濟援助，從工業供應以及飛機和坦克來說，無疑地是一種有

價值的供獻。可是我們必須面對一件事實，即從東歐的巨大博鬥所捲入的資源，和從侵略所加於我們這位盟邦的戰爭潛能的損害來說，這種供獻實在是很小的。（邱吉爾先生最近指出二千輛坦克的數字；但是人們會自然地發問：這數額比得上德國一個月的出產嗎？）

不過，爲使人們免於陷入沮喪和失敗主義的泥淖，也許應該指出這裏還有三分之二，如果不是四分之三的蘇聯機械生產能力保存着（註一），也許是它最近建立的軍備工廠的大部分，以及非鐵金屬出產（除了鋁之外）（註二）的一個很高比例。它們都是在伏爾加以東，大部分是在烏拉爾，西伯利亞和中亞細亞的新工業區。烏拉爾特別富於礦產；它的開發近年來已飛快發展着。鎳，鉻，銅，錳，油和高級鑽石在這裏有着巨量的存在；而這一地區還有『巨大的鑛礬土礦脈和煤礦脈密切地靠近着，這是很稀罕的結合，很容易開採，並且可以作露天的採掘。水的供應在這裏也很充足。』（註三）它有一些高級的鍊銅廠和一些初步的化學工業是取給於當地的原料。鐵鑛方面的損失在當前可以藉廢鐵的加強搜集和使用而部分地補償過來。在某種範圍內，這一缺口已經由烏拉爾開鑛計劃的擴大（例如在馬格尼托哥爾斯克）而補足了。在煤方面，在東部有着不少重要的新地區已經成爲近年來迅速發展的主題：如西伯利亞的庫士尼斯克盆地，在二九四〇年出產二千四百六十萬公噸；烏拉爾一千一百萬公噸；東部西伯利亞和美努辛斯克約一千萬公噸。遠東和哈薩克斯坦在一九四〇年出產一千一百萬公

〔註一〕拜考夫在一九四二年春季會說，『國內全部機械工業中有百分之七五—八〇是位於蘇聯未被侵入的地區。』

〔註二〕三分之二的鋁，鉍和鎳，以及差不多全部鎳，鋼和棉花是產於東部。

〔註三〕引自科馬洛夫教授在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十日『蘇聯戰時新聞』的文章。

噸，而莫斯科區近一千萬公噸。

鋁和樹膠的地位有點不妥，但也沒有理由認為鋁的情形對於飛機生產有嚴重的妨礙。蘇聯戰前的鋁出產大於英國的或日本的百分之六十，甚至大於法國的或意大利的出產；但是跟今天德國的出產比較起來，却少了好幾倍。（註一）它曾經而且依然是一種缺少貨品，而過去一年來（一九四二）是依靠於英國和美國的進口；在某種範圍內，飛機生產中的鋁曾用膠質代替。蘇聯出產的六五，〇〇〇噸中有五五，〇〇〇噸來自列甯格勒附近提克溫的工廠和南部的薩波羅什，而只有一〇，〇〇〇噸是來自烏拉爾卡爾斯克的新工廠。不過，烏拉爾的工廠在早些日子便曾被計劃要達到五五，〇〇〇噸的出產，而現在也許這樣做到了。鐵礬土主要是在提克溫開採的（那是一種低級鐵石）；而在這種鐵石方面蘇聯在一九三八年出的產差不多等於美國的，但是少於法國的，匈牙利的或英屬剛內亞的一半。可是高級鐵石的鐵礬土礦脈，遠勝於提克溫的，已經在烏拉爾東麓斯伐德洛夫斯克附近發現，而無疑地現在已經在開採中了。在巴士吉里亞和中亞細亞都曾預期有這種鐵脈；并曾設法從可拉半島的霞石提取礬。（註二）在樹膠方面，在伏爾加和烏拉爾之間的巴士吉里亞，以及在中亞細亞的西爾·達里亞都開始了種植；但從樹膠生產的來源上說，這還只有相對小的重要性，雖然它的利用現在已大大的擴展

〔註一〕據國聯的估計，蘇聯的「原鋁」在一九四〇年有五五，〇〇〇公噸。比較起來，德國和奧地利共有二四〇，〇〇〇公噸，美國一八七，〇〇〇公噸，加拿大一〇，〇〇〇公噸，法國五〇，〇〇〇公噸，意大利四〇，〇〇〇公噸，而英國和日本各有三五，〇〇〇公噸。此外，據估計蘇聯又從廢鐵生產「大鋁」一三，〇〇〇公噸（國聯統計年鑑），一九四〇，頁一四九。）

〔註二〕鋁生產中的另一個限制因子是電力；從鐵礬土轉變為礬土（鋁化礬）是需要大量的電力的。在遼方面，伏爾哈夫希森伯的動力站有着很大重要性，而這些地方的損失影響至大。

了。(註一)在人造樹膠方面，蘇聯是一個先驅者，并且早在一九三一年便創立了一種「布納」(Buna)的俄羅斯變種。這一俄羅斯變種名叫「Sovprene」，起初是由穀類和洋芋酒精變成，近來又採用乙炔、石油和煤油的副產物；同時它顯然可以從自然氣體和澱粉質最多的植物中獲得。戰前的出產估計是在五〇，〇〇〇和六〇，〇〇〇噸之間，而今天必定已經達到或甚至大大超過後一數字了。這可能超過美國在一九四二年出產的平均數(墾植的樹膠除外)，約等於越南或錫蘭的自然樹膠出產，但只有一九四〇年馬來亞或荷屬東印度的出產的十分之一。它也許等於德國的，甚至有點超過，因為據估在一九三九年德國的出產只有二五，〇〇〇噸。早在一九三七年，便已聲言蘇聯的需要有百分之七十五可由國內供給。三個最大的人造樹膠廠是在亞美尼亞，佛羅內茲，和烏拉爾的馬格尼托哥爾斯克。

在石油方面，高加索供給的切斷無疑地會是極嚴重的打擊，尤其是因為蘇聯的農產大大地依賴於牽引機。(從蘇聯全國來講，在戰前約有一半的耕犁是用牽引機)。在一九四〇年，高加索區的油產佔全國產量三千四百萬公噸的三千萬公噸。(巴庫佔二十五萬公噸弱，格羅斯尼區約三百萬公噸，邁可普區高級油三百萬公噸弱)。同時，我們必須記着，那所謂第二巴庫，烏拉爾的一個豐富的新油區，在緊接戰前年間正被以非常的速度發展着；而一九四二年的計劃是要出產七百五十萬噸。這，連同在中亞細亞和遠東的油田的較小出產，便超過了德國和羅馬尼亞(註二)一起在戰事爆發時的出產。

〔註一〕愛德爾曼先生甚至說，「在一九四〇年有五〇，〇〇〇噸自然樹膠和「凝液」(馬來樹膠)是從這一來源出產的。」

〔註二〕一九三九年羅馬尼亞的出產是六百二十萬噸。



新區域有三個中心：裏海岸哈薩克斯坦的愛姆巴油田，伏爾加流域古比雪夫附近，和巴士吉里加的烏發城附近。這一區域的附屬油田是在更北的貝爾姆附近。主要的鍊油廠是在愛姆巴，奧爾斯克和烏發。此外，并曾計劃在一九四二年開掘一千四百萬噸以上的泥板岩。

聚集在烏拉爾和西伯利亞新工業區的金屬富藏有多少，我們還不知道；不過它們絕不是值得忽略的，而從一個短期的觀點來說，在對新建的和撤退的軍火和飛機工廠的供應上是有着相當重要性的。那「工業跳背戲」（按指工業撤退——譯）的故事已成爲一種史詩：關於在那些受侵略威脅區域的主要工廠怎樣帶同它們的人員和裝備向東撤退數百里，有時是數千里，而在新的地點重新建立和重新開始。這些工廠有些不單旅行了一千多里，并且需要幾千車輛運送它們。例如，據說基輔和哈爾科夫有一半以上的人口是由這種方法有計劃地撤退的——單從這兩個城市撤退的約有八十萬至一百萬人，熱練工業工人連同他們的家庭。不過，在農村人口方面，從淪陷區撤退的便只有遠爲較小的比例。撤退工廠在它們的新地點的處境并不容易。建築材料是稀少的，燃料和原料常常也是一樣。木材常被用來代替架構的鋼。磚和土敏土特別缺乏，因爲這些從前多是在被佔領區生產的。當地的燃料供給需要開拓。住居的供應是不夠的，有時甚至根本沒有。撤退的工廠無可避免地要經過幾個月才能發揮全部效能。真正令人欣佩的是代以臨時措置的能力，以及它們的人員在面對困難時的創新和勇氣；心靈和意志比較脆弱的人在這種情形下是會被壓倒的。到一九四二年四月，它們大多數已能全部開工了。在有些當中，恢復生產的擱延是異常小的。從第聶伯羅彼得羅夫斯克撤退的伏羅希洛夫工廠九月中到達烏拉爾，十月十日便恢復出產，而在十二月已超過它舊日的出產。在五月，我們曾聽到坦克生產正在尖銳上昇。有一個要撤退到烏拉爾的最大工廠，即列甯格勒的基洛夫工廠，宣佈比四月增加了K·V重

坦克百分之十七，而引擎的出產增加了百分之四十三。四月是一些撤退的坦克和引擎工廠恢復生產的頭一個月，而五月便看見它們大部分比以前在原來地點生產着較多的坦克了。坦克工業人民委員部代理部長沃萊格里亞德宣佈說，「蘇聯的坦克出產已經驚人地增加，而目前的坦克工業已經比戰事初起時強大數倍了。」在一個新的工廠中，一個佔面積一四，〇〇〇方碼的部門三十五天便建立起來，而另外一個佔面積一七，〇〇〇方碼的部門的建築只需二十七天。我們曾聽到一整個新的飛機廠在五個星期內便再集合起來；烏拉爾一個城市的國防委員會，沒有等候撤退的機器的到達，便利用工作餘暇的當地勞力在兩個星期內建立起兩個工廠區：這計劃在平時會被認為是六個月的工作的。常常地：

「機器基地的裝修，和室內設備的聚合，是與工廠房屋的建造同時進行的。在一處地方，我看見砌磚匠在把牆壁完成，同時氣管裝配匠在裝置煙爐，電匠在裝置電線，還有一羣人在裝置機器。」（註一）

可是，這種「工業跳背戲」的最動人處還不全在於這種匆忙速成的產物。它們的需要顯然是曾被預見到的，而遷移和適應的可能性已經在新工廠的佈置和建造上被準備好了。如像最近一個作者所說：

「蘇聯是在某種基本原則上組織它的工業撤退，那是跟它的續密計劃相胎合的……像在法國那樣，當敵人迫近工業城市時才倉皇棄守，在蘇聯是沒有的……蘇聯工人帶着他的機器撤退，就像一個兵士帶着他的槍撤退一樣。」（註二）

〔註一〕見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莫斯科新聞」菲立波夫的通訊。

〔註二〕見愛德爾曼著：「蘇聯會怎樣準備」頁六〇。

比較重要的工廠所佔的新地點顯然曾被事先慎重地計劃好的，要顧及運輸的便利及原料供給的有效。機器是造成容易拆開的，以便於卸除，和計算着易於聚合。我們曾聽說「伏羅希洛夫軍火工廠的工程師們不需要從固結的牀盤中掘出他們的鑽孔機器。因為這些機器是用很容易除去的两頭釘輕輕地釘住的」。常常地，新的地點早就準備好了。在有些情形中，雖然不全是這樣，房屋已經建立好來迎接撤退的裝備。

「像這樣的成就必須先有一種極高水平的效率設計，調協和訓練，以及社會的和政治的風紀。這結果是，蘇聯的軍火生產不單沒有因德軍對於它的重要工業中心的打擊而低落，並且實際上能夠事先加以安置。（一九四二）七月十九日真理報的社論曾宣佈說：「在戰爭第二年的開頭，我們的工業已能夠供給比戰前更大量的武器和火藥，不管戰爭所帶來的困難。」（註一）

在烏拉爾以東一千里的庫士巴斯，從前是這個國家的第二個軍火大中心，已被配給新的工廠和人員，而躍居第一位，並且是鍊鋼廠，摩托和牽引機工廠，飛機工廠，樹膠和銅生產的中心。它現在使用鄰近供給的錳，代替了從前對喬治亞和烏克蘭依賴。從前靠鐵路遠從烏拉爾運來的鑽石，有百分之八十可以省去了，因為鐵的開採已經在諾伏西北爾斯克和達希塔哥爾斯克附近的哥爾奈亞，蘇里亞被發展了。不過，烏拉爾與西伯利亞的中心之間也還有許多重要的聯繫。烏拉爾的車里亞賓斯克牽引機工廠，全世界屈指可數的，現在是從西伯利亞運來它的鋼；在另一方面，斯伐爾德洛夫斯克機械工廠，現在主要地從事於大砲的生產，差不多完全倚靠於烏拉爾的金屬。當庫士巴斯的工業增加着吸收它自己的礦產時，烏拉爾在它的工業擴張中煤的短少是由卡拉甘達的豐富白煤區來補給，沿着新建的

從卡拉甘達到馬格尼托哥爾斯克的鐵路運來。科學家們的特別遠征勘踏隊（共有四十隊）已經由科學院派遣到烏拉爾，西伯利亞，遠東和中亞細亞，並且已經在巴希灣里亞發現豐富的鐵礬土和錳的礦脈，在烏拉爾發現銀，鉛，硫化銅和鎢，在南部烏茲別克的伐爾甘那流域發現新的油田。

從某方面說來，比新地區的成就更足驚人的是，那許多差不多在戰區之內的工廠的繼續生產。被圍的列甯格勒的軍火工廠的繼續生產，並且在某種限度還容許輸出軍火給別的戰綫，這在外面世界看來必定是一種奇蹟了。如像「經濟學者」最近關於列甯格勒，莫斯科以及南部的軍火工業所說的：

「所有這三個中心的一件動人事務是，武器差不多是在它們被使用的戰場大規模地生產着。工廠和戰鬥前哨的距離有時較短於按照正統規定一個戰鬥師團跟它的火藥庫的距離。」

覺悟到時間因子在現代戰爭中的決定性，蘇聯工業曾使它的法碼有利於短期效果。自然，這不是說長期的考慮普遍地被犧牲於短期的利益。不過，對於那些可以迅速產生果實的努力，它顯然比之任何別的交通國（德國也是不例外）給與遠為較大的優先權。額外時間的工作從戰事開始一直被保持着，它的程度甚至使我們在敦刻爾克以後的奮發也感覺遜色。如像亞歷山大，威爾次所寫的：「蘇聯的工人們，年老的或年青的，「少共」的男女孩子們，都感覺到他們的任務是，在勝利與死亡和衰落之間沒有第三條路；如果必要，他們可以為着一項特殊的軍用定貨而差不多沒有休息地連續工作五天五夜。」在正常時候被認為不經濟的燃料和材料供給源泉，已經因為它們比較接近工廠所在地而被開發了；這樣可以減輕從遠處運來所加於鐵路系統的負擔，而鐵路是要儘先為軍事運輸和最後製成品的配送而服務的。那口號是：「當地能生產的東西，便不要從遠處運來」；而真理報也曾反覆申言：「我們必須要做的事情是，建造無數小工廠而不再依賴從遠處運來的建造材料。當地的材料必須盡可能

地加以利用，以代替供應短少的材料，「在許多情形中，曾經發動利用小規模的地方工廠和甚至手工作坊（在一種合作社的基礎上經營的）作爲一個主要的集合工廠的衛星，從事補助物的供應。例如莫斯科的斯大林摩托工廠，以前要兼二百一十種不同企業供給零件。據說現在已經設法使這些東西大部分在首都附近製造了。在建築方面，如我們說過的，木料已經大大地代替了鋼；而「工業上金屬的定最分配已經推行到這樣一種嚴格程度，在任何交戰國中都沒有可以比較的」（註一）機器的替換已經減少到最小限制：例如莫洛託夫石腦油托拉斯曾報告說，在一九四一年下半年，它的金屬裝備的正常替換已經減少百分之六十五，而一九四二年還要更加減少。莫斯科電燈工廠發現它可以在東部裝備一個同等的工廠，用莫斯科工廠的主要器材供應它，而把附近別些工廠的過剩機器來代替自己的。此外，在合理化上也有着一些動人的成就，特別是在軍器和火藥工業方面。擴大的標準化，便利的集體生產方法，以及各部分的可以調換性，顯然已經在烏拉爾的機械工具工業上推行了，這一工業對於裝備這區域的以及更東的坦克工廠和飛機工廠是極主要的。庫士尼斯基的冶金工廠已經開始使坦克鋼版的生產不需要馬登斯送風爐的極度轉化；而一種新的半自動切版機的發明據說已大大地改進了裝中鋼的品質和生產率。到一九四一年，伏爾加的某些飛機工廠已完成某種變革，可以使它們的出產率加倍或甚至三倍。斯大林格勒牽引機工廠宣布說，它已經把建造一輛坦克所需要的時間比從前認爲標準時間縮短了二十六小時。軍火人民委員長烏斯提諾夫最近曾有一驚人的報導，說在一九四二年五月「我國的大砲工廠造出了像上年六個月那樣多的大砲」。他把這歸功於「大砲工廠的通盤改組」，使「設計圖樣和生產方法簡單化」，那結果同時是「火力的增加」和「各環武器的生產的迅速進步」。作爲

〔註一〕見「經濟學者」一九四二年四月十一日。

例子，他引述『那最前進的大砲工廠，第二兵工廠』（它曾從政府獲得一個集體勳章），曾努力使生產自動化和創造特殊複雜的機械工具，而在極短的期間便已『真正變形了』。

這種擴大合理化，一個斯塔漢諾夫運動的新浪潮，初時被叫做『百分之二百運動』。它開始於一九四一年夏秋之交，當時有些工人們以加倍他們的平時出產額爲己任，并號召別的人同樣做。伏羅內茲一個工廠的斯塔漢諾夫工人謝萊特斯基說：

『我有兩個兄弟在前線。我們仍然是在一起的。他們拿他們的來福槍而我拿我的斯塔漢諾夫工作。我的生產指數是一天之內做三，四和五天的常規工作。在我旁邊工作的伊凡諾夫和亞列舍夫只完成他們的平常額數。我指導他們而成功使他們能夠加倍他們的出產計劃。』（見一九四一年十月二十三日『蘇聯戰事新聞』）

當一個坦克工廠的旋力精削機械有一部分閒置着，而研磨廠却因缺少機器而停滯時，一種裝置便被發明和設計出來使能夠把旋力精削機轉變爲研磨機。在這同一工廠，加速出產和節省金屬的方法被找出來了，那是用坦克輪距的鑄型來代替前所使用的鍛刻。在莫斯科的卡干諾維支球承工廠，工人們在戰爭頭兩個半月便接受了一千標準的建議，而經理部也承認六百是馬上可以辦到的。到一九四二年春季，甚至『百分之二百者』也落伍了；而真理報便宣佈了『百分之十者』的來臨：

『一個新的生產紀錄被烏拉爾的一位旋力精削機的工作者完成了。有一天，斯塔漢諾夫者狄米特里·波瑟夫完成了他的額數的十五倍，因而開始以每班十倍於原額爲常規。波瑟夫馬上被一羣敵手跟上了……而單在這一烏拉爾工廠便有三〇二個斯塔漢諾夫者有同樣的紀錄。』

關於這些非凡的成就怎樣被獲得的詳情，不是在這裏所說的事。不過『莫斯科新聞』的一位通訊

員，曾訪問過另一烏拉爾的機械工廠的，曾由一位波瑟夫的仿效者對他自己的成就作如下的說明：

『我的工作分成三個階段。以前我便曾起過一些有關簡單化的念頭，並和我們的工程師們作過幾次談話……不久之前我們接受了一批軍用的緊急定貨……被採用的方法是首先全然取消了三個階段中的一個。然後經過改變車牀的結構之後，我便能同時管理十八個部分而代替了一個。我們還改善了第三個階段。那結果是我開始生產十八倍於原定產額。』

這位通訊員加上說：

『我得知百分之一千者成就他們的出產的主要方法之一是發明新的盤車和裝置，使他們能夠同時管理許多部分……他們大多數是在二十五和三十歲之間，曾受過中等教育的。』（「莫斯科新聞」，一九四一年九月十九日）

勞工部負責人討論說，這些革新者是有着特殊重要性的，因為『他們通常是出現於那緊張的地點，那裏沒有充足的高度熟練勞工和裝備可用。』（「莫斯科新聞」，一九四二年四月十日，真理報在發表波瑟夫以及他同的伴的成就時，進一步指出『擺在我們面前的急迫日常任務，』是這些較前進的工人們要訓練『那些在生命中頭一次參加工業的年青人民和婦女，造成一批新的後備軍』，使他們能夠出產『至少一份定額』，那是他們目前常常還沒有做到的。這種在工廠本身幫助和訓練非熟練勞工的需要，在一九四二年夏季的過程中曾被反復申述，因為當時由於新的非熟練勞工的流入，熟練工人的相對短少已經尖銳化了。例如一個工廠經理打電報給迫擊砲製造人民委員會說：『六十個工人進來，大部分是家庭主婦。假如沒有熟練幹部，我不再容許工人進來了』。代替了等待熟練工人從外面派進來，真理報勸他應該在他自己的工廠加以訓練——『在你自己的工場，藉你自己的工程師，突擊手和

有經驗的老工人」；并舉出一些實例，如別些工廠的前進工人已經成爲新手工們的「監護人」，幫助他們獲得技巧，如一個烏拉爾機器工廠的旋盤工「在最近數月內便把他的工作教熟了三百個新來的男女工人」。它加上說，「對於新手工們的監護應該繼續到他們學會了獨立地担負起他們的工作爲止。」（註一）後來又舉出一個彈藥筒工廠爲例，那裏的工人約有百分之八十是由本廠的工程師，突擊手和斯塔漢諾夫運動者訓練出來的。

跟戰爭工業的能力同樣重要的是糧食供應的有效性。在希特勒進攻蘇聯的頭一個月內，定糧分配券便被發給莫斯科以及其它主要城市的人口，「爲着使人民在戰時對主要的糧食和工業貨品獲得不斷的供給和建立適當的組織，和爲着避免購糧的擁擠。」這種定量分配券包括了麵包，麥粉，穀類，糖，脂肪，肉類和魚。手工藝工人比文書和知識工作者所得到的定量較高（前者每天購得麵包二十七盎司，後者二十一盎司），工作忙的人又比工作閒的人多。十二歲以下的孩子在穀類（麵包以外的）和糖方面有額外的分配。牛乳和乳製品，洋芋和蔬菜這一次沒有被列入；而集體農民們在都市的「集農市場」出售的供應品也可以自由購買。

關於穀類方面，即使把德軍佔領頓河區和北高加索的影響打算在內，未佔領區的有效供應似乎還可以保持每人的消費量接近於戰前水平的三分之二。戰事爆發時可供國內消費的穀物比一九一四年增

〔註一〕在戰事爆發時，蘇聯工業的勞動軍中婦女工人佔百分之四十二的高比例（比較起來，英國在上次戰爭結束時是百分之三十六，在這次戰爭開始時是百分之三十）。今天這數字必定大大地增加了。例如據最近宣佈，甚至在烏拉爾的冶金工業中婦女的比例也佔全體的百分之四十五了。最近曾報告有一個婦女在送風爐工廠當鍛工領班——這恐怕是全世界第一個鍛工女領班了。



加了百分之五十，而人口的增加是百分之二十五。今天在蘇聯東部的五穀收穫約等於一九一四年的一倍。在一九四二年，莫斯科的麵包定量分配保持着工人們每天七百至八百公分（約二十七盎司），非工人的人民和小孩四百公分；甚至後者也比德國手藝工人的定量分配高。

關於某些別的主要食糧，情形比較嚴重。甜蘿蔔的生產，如我所說過的，曾大大地受到德軍佔領的影響。爲補救這一缺陷，曾努力在中亞細亞和在沙拉托夫省鼓勵甜蘿蔔的生產：例如，烏茲別克共和國已報告它的甜蘿蔔區增大了百分之三百。同時，比較重要的製煉廠的裝備已經及時從烏克蘭撤退，而在新甜蘿蔔區建立起來；這兩年又遇到豐收。肉類的情形有點模糊，因爲不知道被佔領區的牲畜有多大比例能撤出來和多大比例被屠宰了或留下來。在短期內，肉類供給可以藉牧牛的屠宰來維持。一九四一年畜類飼養的數字的低落指出了，在大角牛，豬和母牛方面，約低落了百分之十。綿羊和山羊低落了百分之十五。不過不清楚上述數字已否把因德軍佔領的全部損失打算在內。依照一九三八年的國勢調查，約有三分之一的馬，四分一至三分一的大角牛，一半的豬，和十分一至五分一的羊是在被德軍佔領的區域。這些當中一個大的比例必定已經撤退到東部了，至少那些屬於集體農場的（不是那些屬於集體農民的私人住所的）；因爲我們發現牲畜司的主任曾寫過關於——

「在納粹佔領區的集體農場和國家農場大部分牲畜都及時地和有組織地向內地遷徙。隨着紅軍的向東移動，成千成萬的集體農民們……趕着畜羣在寒冷和風雪中走過千萬米突，爲拯救牠們而忍受種種艱難。」

不過他也承認「曾有某種數量的損失」，并引述莫斯科區一個較小的縣份有一萬三千頭牛落入納粹手裏。在一九四一年，吉爾吉斯大草原和土耳其明尼斯坦在牲畜方面有了百分之二十至二十八的增加；

(註一)但是同時西伯利亞和阿爾泰區則顯然低落了。不過，政府方面曾計劃使集體農場的牲畜頭數在一九四二年一月一日和一九四三年一月一日間增加百分之二十五。一九四二年春季有一道命令禁止宰殺或出售一歲以內的牲畜，而成長牲畜的宰殺也須經過當地農業局的准許。值得注意的是，牲畜飼養也被當作軍事服務的工作之一。

對於個別工廠的供應，曾有一種特別運動要復活三十年代早期以當地爲本的自行供應制，特別是鼓勵復活各工廠的「工人供應部」(那是在工廠委員會和地域職工聯合委員會的共同控制之下的)，以經營他們自己的養豬場，養雞場，菜園，以及可能的調製廠。這種供應部的目的是要「給工業組織的工人和職員以及他們的家庭生產和供應糧食」。供應地方化的原則在這裏再被採用來解鬆運輸上和分配上的過度緊張。養豬場特別被強調，因爲它們開支小而收穫大，同時可以利用飯館和酒館的廢物。在一九四二年三月，沙拉托夫的列雷工廠曾寫信給真理報，希望別的工廠在這方面仿效它的例子。在一個附屬於這工廠的農場中，他們生產着足夠的蔬菜，甜蘿蔔，西瓜和南瓜，「供應工廠的餐廳，幼稚園和托兒所的全體需要」。還不足於這，他們更給工廠職員的家庭供應蔬菜。此外，有四百多個工人曾請求分地。「工人們的分地以及附屬於工廠的農場不是一種創舉，真理報評論說。「不過我們需要有更多的它們。許多公務員已經習慣於依賴中央分配而忽略當地資源了」。據一九四二年春季的估計，總共約有三百萬工業工人的家庭經營着菜園分地。在這以前六個月，真理報以及其它報紙曾發動「輔助農場，一種增加糧食的不竭源泉」運動；并舉出高爾基城的公共膳食托拉斯(有點像英國的食堂)爲例，這些托拉斯曾在七個月內從它們的輔助農場獲得八千多噸肉類，還有哈薩克斯

〔註一〕見一九四二年四月七日「莫斯科新聞」威連第也夫的報告。

担的一個類似團體，「它有它自己的飼豬和養鷄場，市場菜圃和葡萄園」，而「以豐富的蔬菜和水果供給當地的人口」。此外，我們還曾聽到塔什干工廠附設有一個糧食合作社，經營着水果，蔬菜，通心麵等的烹製。

這一使工廠獲得糧食供應以及其它利便的任務，連同工廠中的訓練和合理化的任務，是戰時各職工會的特殊工作。一九四二年五月二十七日，職工會中央委員會曾給所有職工會支部發出「十項行動方針」。這些包含「組織熟練工人對非熟練工人的『監護』」，「從職業學校出來的新熟練工人的適當分配」，以及獎勵和發獎斯塔漢諾夫者們的成就。更進一步是強調生產經驗的流傳。「從工廠到工廠和從工場到工場」。最後是，各職工會要加強控制各種企業內的飯堂和酒肆，並保證對它們的有效供應。幾個月之前，真理報已經給各職工會提出三種主要任務：「對於那些在合理化上有所發明或建議的工人們給以每一可能的支持和援助」；「使工業中的新手們熟習「於有組織和有紀律的工作」並教給他們「高速度的生產方法以及尊重國家的財產，機器，工具和原料」；「關心勞動人民的需要，組織糧食分配和照應職工們一般需求，使工人食堂，點心店和酒肆充實起來」。明顯地，蘇聯職工會的成就有許多足以鼓勵英國的同行們來學習的，無論蘇聯的職工會或蘇聯的報紙都毫不遲疑地對於他們自己的短處作公開批評，或對於那些證明自身並不適合於當前任務的負責人物加以公開的攻擊和撤換。在這一方面，各職工會，各工廠管家以及生產委員會的委員們也可以從注意蘇聯的實踐而得到功效。至少至少，最近真理報社論中的一句格言，我們應該大家好好地把它變成爲我們自己的：

「在這次戰爭中沒有什麼平時的工作。在前線與後方之間沒有什

## 麼可分的界線』

在 這 個 島 嶼 ( 按 指 英 倫 三 島 ) 的 許 多 人 看 來 ， 由 於 一 條 窄 狹 的 水 道 把 它 和 受 難 的 歐 洲 大 陸 分 開 ，  
過 去 若 干 月 來 蘇 聯 人 民 的 犧 牲 和 成 就 似 乎 是 超 出 了 人 類 所 能 忍 受 的 限 度 。 而 對 於 有 許 多 遠 居 大 西 洋 彼  
岸 的 人 們 ， 他 們 正 像 淪 陷 區 的 可 怖 的 慘 境 一 樣 不 易 瞭 解 ， 那 種 情 形 是 自 從 「 三 十 年 戰 爭 」 ， 「 百 年 戰  
爭 」 ， 或 甚 至 汶 德 族 ( 昔 居 於 德 國 北 部 和 東 部 的 斯 拉 夫 人 民 —— 譯 註 ) 的 被 滅 絕 以 來 很 難 找 到 比 擬  
的 。 但 是 對 於 使 自 己 在 這 些 犧 牲 中 剛 強 起 來 ， 沒 有 被 痛 苦 所 壓 倒 ， 而 以 必 勝 的 戰 鬥 達 到 罕 有 的 人 類 成  
就 的 峯 巔 的 這 種 精 神 ， 我 們 不 只 應 該 頌 揚 而 已 。 從 它 的 英 勇 紀 錄 中 ， 我 們 能 夠 學 得 一 種 功 課 ： 爭 先 競  
美 的 功 課 。 我 們 必 須 因 爲 能 夠 跟 這 樣 一 種 人 民 締 結 戰 時 和 戰 後 二 十 年 同 盟 而 感 覺 榮 耀 ； 他 們 在 昨 天 還  
被 嘲 笑 和 輕 蔑 ， 而 今 天 已 經 向 世 界 確 切 證 明 它 的 不 可 超 勝 的 社 會 的 統 一 ， 政 治 道 德 和 經 濟 團 結 了 。 足  
爲 我 們 羞 恥 的 是 ， 我 們 當 中 還 有 一 些 人 ， 哺 育 着 他 們 的 政 治 偏 見 和 昨 天 的 無 知 ， 藐 視 或 甚 至 污 蔑 這 些  
成 就 。 蘇 聯 在 過 去 是 被 透 過 黑 色 眼 鏡 ， 并 且 常 常 是 歪 曲 的 鏡 子 來 看 的 國 家 。 根 據 於 較 清 楚 和 較 完 密 的  
察 看 細 情 的 了 解 ， 對 於 過 去 的 遺 憾 或 可 有 所 彌 補 。 在 這 方 面 ， 這 幾 章 書 曾 企 圖 作 些 微 貢 獻 。 可 是 ， 在  
這 每 一 句 鐘 似 乎 都 含 有 着 決 定 意 義 的 日 子 裏 ， 當 我 提 起 筆 來 時 ， 我 只 有 萬 分 痛 苦 地 醒 覺 到 了 解 還 是 不  
夠 的 。

( 完 )

## 附錄 蘇聯資本主義化問題論戰

『如給蘇聯平空加上新資本主義的頭銜，并不能增加中蘇友誼。新資本主義與三民主義離遠了些，而且會引起新的疑懼：蘇聯會不會復活帝國主義？這是一種神經質的疑慮，我們應該避免的。』——邵力子。（據大公報記錄蘇聯抗戰一週年紀念大會的演講）

### 一、共產主義教條的基本修正

列斯納著 宋則行譯

過去在蘇聯學校，報紙，講演與無線電中講授的馬克斯主義的經濟教條，現在正進行着一個迅疾的轉變。馬克思的無產階級被剝削的理論在全部修正，資本主義現被稱爲一個「進步的」而不再是一個「落後的」制度了。

這一修正的學說，將向所有蘇聯的公民講授；這對於蘇聯社會主義經濟與英美資本主義經濟間的合作，將掃去許多意識的障礙。

這項學說的修正，實代表蘇聯官方經濟哲學的一種革命，較之俄國愛國主義的復活，與民族英雄崇拜的恢復，尤爲深遠。這種修正已使蘇聯經濟中的資本累積，利潤經營，工資差異，市場價格與租稅等有了合法的地位，並且甚至承認在蘇聯亦有經濟定律的作用了。

蘇聯已坦白的承認，這個新學說與其說是馬克思主義或列寧主義的學說，不如說是史達林的學說。這有兩層目的；一在禁止過去攻擊資本主義的咒咀，這會造成蘇聯與資本主義的國家間的摩擦。二在設法使馬克思主義的信仰能適應與其相矛盾的實際經濟實施；這種實施原是在蘇聯經濟發展過程中經過不斷的試驗與錯誤而產生的。

此項新學說及對過去蘇聯經濟學教條的非難，發表於最近一期「蘇聯經濟雜誌」內一篇二十三頁的論著中。這篇論著代表上項雜誌編者們的意見，他們都是有領導地位的經濟學家，包括里珂悌夫，米丁，費道塞可夫，克羅次可夫，俄貝里，坡頓金，幽定，法斐洛夫，托爾欽諾夫及庫甘涅夫諸氏。這編論著有一摘要，載在最近一期名叫「科學與社會」的馬克思主義派的英文季刊中。

從美國經濟思想的觀點上看，所有這些修正沒有一個能與蘇聯的基本教條所謂實際經濟措施應為人民福利服役的原則相調和的。

他們所指陳的過去蘇聯經濟權威的錯誤，可首從他們經濟學所重下的定義中見其梗概。這重下的定義，認為經濟學是「解釋人類社會各種發展階段中支配重要消費物品（無論個人消費用的或生產過程中）用的生產與分配之定律的科學」。

該雜誌的編者在解釋他們所非難的理論時，曾謂在講堂和教科書裏講授的經濟學，常有幼稚錯誤的思想表露，以為「在社會主義下無經濟定律作用的餘地」。這種思想，他們攻擊為「非馬克思主義的」和「非科學的」。

由此出發，他們並進而攻擊自恩格斯所著「家庭私有財產與國家之起源」那部社會主義古典著作中引釋而來的一種思想。恩格斯是馬克思的合作者，在蘇聯與馬克思同被尊為蘇聯官方社會哲學創立

者之一。

這個被攻擊的思想就是說：在前文明時代的社會結構，不但受物質生產的條件所決定，亦爲「家庭之形式」所決定。這個觀念原已被現代人類學的研究所擠斥，這次蘇聯的修正學說也未提及家庭的作用。

他們所攻擊的另一個錯誤，是過去對於原始共產主義帶有浪漫色彩的過分理想化。他們認爲這顯然與歷史事實相矛盾。新學說則着重「原始共產主義在歷史上的限制性；它所代表的是生產力發展水準的極端低下，所用的工具都具原始性，而且是一種最可憐的人民生活方式。」

這一修正學說並謂在某一階段；原始共產主義勢必成爲社會進步的障礙，而須讓位於新的生產方法，以使生產力獲得更多的發展餘地。

新學說掃除了許多矛盾的觀點；這些觀點在過去曾阻礙了蘇聯社會主義經濟與其民主盟國的工業資本主義經濟之間的合作工作，後者在蘇聯工農大眾前原被稱爲卑鄙的剝削制度，但現在這制度已變成「社會進步過程中的必要階段」了。

這些蘇聯的經濟學者警告一般經濟學的教授們說。從馬克思「資本論」的「嚴正邏輯」出發來分析資本主義下的商品生產而開始經濟學的研究，是一種有害的拘迂，是違反教學需要的。可是就從這項資本主義商品生產的分析中，馬克斯才說勞工被榨去了剩餘價值，也就是說資本剝削了勞工。

他們指出商品生產，交易與貨幣，早在資本主義興起前就已存在。這幾個概念應該看作不僅與資本主義有關，並與資本主義以前的各階段有關。而資本主義下的商品生產，便是幾千年經濟演化中的一個有進步性的發揚階段。

這個學說與蘇聯過去傳統說法最大的差離，在價值定律的恢復。這些蘇聯的經濟學家坦率的承認，過去在蘇聯的學說和教科書中認為社會主義經濟學中無價值定律的地位，這一不健全的觀念已根深蒂固。他們宣稱這一價值定律在社會主義下不發生作用的觀念，在本質上是與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相違背的；也就是說與在實踐中的蘇維埃經濟學相違背的。並進而謂倘若認為馬克思與格斯早已預見並能指出價值定律為社會主義利益而運行的具體實際途徑，那未免太率真，太拘迂了。

計件工資原是正統社會主義者的主要攻擊目標；現在這些經濟學者用恢復價值定律的方法，證明其為合理，並認為工資的差異與工農所得的差異，乃基於社會主義中每一公民的勞動品質不一致的緣故。

同樣市場競爭與市場價格亦認為合理了。他們以為若要控制所有的貿易再能完全決定市場價格，則蘇維埃政府必須有大量商品可供支配，並有各種貨物大量的存儲方可。

在資本主義下，為利潤而競爭，如無獨占，自將驅除效率較低的生產者，而予效率較高者以報酬。而今這些經濟學家可說為這制度提出了一個蘇維埃版的複本，認為這在經濟算盤上是極關重要的；認為計畫的完成，必需有一個以貨幣表示的確定的生產成本。

他們又說剩餘勞動在任何社會制度下必須經常存在。並指出為了維持武力，學校及其他公共服務，為了籌措社會安全制度的經費（用租稅方法徵取），社會主義的累積是必需的，也就是說資本累積是必需的。

在蘇維埃學校裏，依然頌揚着社會主義，指譏着資本主義會發生經濟恐慌的缺點。但是在蘇維埃，社會主義已不再被稱為惟一的進步制度了。用里昂惕夫和他同道者的話說，這一新學說就是：



「蘇維埃制度是最進步最前進的制度。」

(本文譯自四月二日紐約時報)(大公報)

## 二、蘇聯的新「資本主義」

紐約時報本年四月三日社論 宋則行譯

蘇聯若干具有領導地位的經濟學者，現在發動了一個蘇聯官方經濟哲學的激變，以求共產主義的教條能適應國家的實際需要，蓋其國家的生存，實有賴於大量的生產。今後這項思想的轉變，勢將經由層層控制與密切連綴的蘇維埃教育宣傳制度，而闡釋為惟一正確的學說。這學說指出了過去的錯誤，修正了若干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的基本教條；而對於過去認為馬克思的「科學」可以預見任何事物，可以開示惟一得救之路的這一神聖不可侵犯的假定，亦敢於宣稱它的率真和拘迂了。他們很坦白的承認這新學說與其說是馬克斯列寧的，不如說是史達林的產品。但這事件與過去在蘇聯及全世界共產黨支部內所發生的許多令人眩迷的事，在性質上却相一致。

這可同樣說明：何以在史達林自己的會議室內，帝俄時代的名將如蘇伏洛夫，庫圖索夫，納扶斯基的照片代替了馬克思，恩格斯的照片；何以馬克思逝世六十一週紀念在美國的共產黨報上尚以很大的篇幅登載，而在蘇聯報紙卻一字不提的過去了；何以美國的共產主義者突然與資本主義結合了；何以義大利的共產黨願意與義大利國王合流了——理由是：只要那一件事能適合他們的利益就行。

這個新學說經蘇聯最近各方申論的補充，在實際上已放棄了馬克思主義「科學」的三項基本的教條（尤以後來幾個創導者所通俗化的教條為然）：第一，以國際為範圍，主張擯斥愛國觀念，主張無階級專政並傳播革命種籽的階級鬥爭理論，現在已為這次戰爭的砲火所豁化了。階級鬥爭已被為家

爲國的民族鬥爭所代替，這使俄國的民族主義與帝國的歷史傳統和野心復活了。第二，唯物史觀以其最通俗的說法，曾引起俄國無神論者的反宗教的運動，但現在爲宗教與愛國主義的恢復所代替了。第三，剩餘價值理論，過去曾認爲在商品價格中，超過生產此項商品所費的勞動價值以上的任何事物，尤以地租，利息與利潤，實代表罪惡的資本家從剝削勞工中勒索前得的部份，然而現在這理論同樣的被放棄了。

因此，這新學說主張經濟定律即使在蘇聯仍有它的作用：以爲被馬克思主義理想化了的「原始共產主義」，不過代表一種極端低下的生產力發展階段；並且主張剩餘勞動，資本累積，利潤經營，與競爭市場價格，對一進步經濟制度的正當運行至關重要。然而這些正是資本主義的觀念和技術，而尤使我們這時代的人迷惑的：當資本主義國家對於勞工的流行思想已向按照「需要」支付工資的社會主義原則轉變時，而「社會主義祖國」卻反轉向以生產力爲基礎的資本主義的支付工資原則了。在美國戰時勞工局和其他官方機關，除了極少數的例外，已不願接受「激發工作性」的或按「生產結果」支付工資的制度；大部份的美國工會也繼續的反對計件工資。因此在美國凡同一行業或同一大類別的一切工人，不問工作品質，必須付以同一工資的原則，已逐漸爲人主張及採納應用；而這蘇維埃的新學說，卻反明顯的承認激發工作性的工資與計件工資制度；並宣稱其他工資之差異，實基於社會主義社會中人民的勞力在品質上不一致的效應而行的。

所以，結果在若干重要生產措施和技術上，現代的蘇聯甚至比美國更「資本主義化」。但因新資本與主要生產工具仍爲國家所有，並仍由國家經營，其制度自然不是美國那種私人資本主義，而是「國家資本主義」。固然這新學說認爲這種「國家資本主義」較之私人資本主義更爲進步；然而這新學

說在邏輯上勢必承認任何一種資本主義都是一「進步的」制度，勢必會掃除社會主義俄國與資本主義英美間合作的許多舊有教條上的障礙。從這觀點上看，爲了勝利和將來的和平，這新學說似乎是值得歡迎的；甚至可能迫得民主國家爲了利將來俄國的競爭相讓頭而發奮自勵。然而將政治經濟權力集中於少數人手中，所予俄國人民個人自由的影響，亦足發傷一些主張在現代民主國家應有同樣集權者的人們。

(五月十八日大公報)

### 三、亨利·明斯致「紐約時報」編者的信

以 沛譯

紐約時報編者：

我從蘇聯「馬克思主義旗幟下」雜誌上摘譯了一篇文章，登在「科學與社會」季刊春季號上，W列斯納根據我的譯文，寫了一篇文章，題名爲「蘇聯的政治經濟學」，登在四月二日紐約時報上，而紐約時報以顯著的社論地位，刊載了很多評論。標題的人在列斯納的文章上面又加了「共產主義教條的基本修正」這樣一個題目。而列斯納和標題的人都給人以這樣的印象：「共產主義的教條已經有了基本上的修正了，修正了的原則，將掃除社會主義的蘇聯經濟和資本主義的英美經濟之間的合作的意識形態上的障礙」。

有些無線電評論家以及好學而消息靈通的人信任着紐約時報的消息準確的聲譽，表示了希望，說蘇聯經濟政策的這樣變化，或者會使經濟合作成爲可能。對於這樣的合作，我具有同樣的希望；我所以翻譯了上述的文章，也就是爲了使美國讀者明瞭目前的蘇聯經濟學說，增進這合作。

但是合作是不可能建立在曲解事實的基礎之上的；認爲意識形態和經濟上存在着的差別並不存在，那是毫無補益的。把同盟國之間合作的希望寄託在這樣的曲解上面的人，並不能建立永久的機構。

把列斯納先生的文章和『科學與社會』季刊上的譯文對照一下，就可以發現許多不正確的，曲解的，甚至竄改文意的地方。而且不光是細節上不正確，全面看來也是誤解了原文的。紐約時報的編輯們和社評作者從列斯納先生那里獲了印象，認爲『剩餘價值的理論已經放棄了』，『由競爭而產生的市場價格，對於進步的經濟的正常工作是必要的。』只要讀一讀俄文原文或我的譯文，就知道那恰恰是相反的。

例如：『在資本主義之下，價值法則就是市場的混亂的法則，不可避免地 and 生產力的毀壞，和危機，和生產的無政府狀態連結在一起。在社會主義之下，價值法則就是蘇維埃政府在經濟計劃的過程有意識地運用的法則，絕無危機。』（科學與社會季刊一九四四年春季號第一二四頁）。

不論這一節或其他各節內，都沒有暗示過剩餘價值的理論已經被放棄。正相反，這篇文章的另外一處說，『事實上，剩餘勞動（超過工人個人的直接需要的勞動）在任何社會制度之下都一定永遠存在。社會主義在蘇聯消滅了人剝削人的制度；它消滅了剩餘勞動和剩餘生產品和剩餘價值專供寄生的剝削階級私用的現象。而同時，社會主義社會面對着大規模的任務，要解決這些任務，如果不使用蘇聯每個工人，農民和知識份子的剩餘勞動，是無法想像的。』

『甚至在社會主義之下，社會勞動的生產品的一部份也必須有系統地作爲累積。這是擴充生產的基本條件，而生產擴充的必要性，是由於工人大衆的需要繼續在增漲，也由於人口的自然增加。不僅

如此，剩餘勞動某一部份須用來滿足整個社會的經常需要……這樣，在社會主義之下，剩餘勞動是由整個社會使用的，用來滿足社會之一切需要和要求。」（第一二五頁）

因此，紐約時報社評說「資本主義制度，更適當地說，戰爭制度，是恢復了。」這話是不正確的。你們四月三日社評的題目把蘇聯的經濟描寫成「蘇聯的新『資本主義』」，也不正確。

很顯然，那篇文章里並沒有說蘇聯放棄了馬克思主義思想。蘇聯作者批評了運用恩格斯的「家庭、私有財產和國家的起源」的人，說「在原始共產主義方面，並沒有任何理由離開馬克思和恩格斯所提出的一元論的歷史觀點，而代之以二元論。」（第一一五頁）不僅如此，作者的資本主義的歷史性的討論，絲毫沒有和馬克思主義立場不符合的地方。

H·明斯 一九四四年四月五日紐約。

（五月二十五日新華日報）

#### 四、駁所謂「共產主義教條的基本修正」

戈實權

在本月十八日的『大公報』上曾刊載了兩篇從『紐約時報』上譯出來的文字：一篇是列斯納所寫的『共產主義教條的基本修正』，一篇就是該報四月三日社評『蘇聯的新『資本主義』』；繼而在二十一日日的『大公報』上，又刊載了公孫震的『認識蘇聯』一文，其中再度發揮了前兩文中的一些曲解的意見。這幾篇文章自稱是以蘇聯的幾個經濟學家最近發表的一篇論文為根據，而斷言蘇聯學者已『攻擊』了和『修正』了馬列主義關於經濟理論的基本學說；並且說蘇聯現在所實行的並不是社會主義，而是什麼『新資本主義』的制度，是資本主義在蘇聯的復活。其實我們只要仔細研究一下蘇聯雜誌

中所刊載的那篇關於經濟問題的二十三頁的論著，就曉得全不是這一回事；這不過是『紐約時報』和列斯納等人，用斷章取義的方法來曲解蘇聯經濟的真相而已。

這就使我想起威克斯鐵在『莫斯科十年記』一書中所作的一個最有趣味的比喻：他說一些卑淺的外國觀察家，在蘇聯只看見了一些木頭，就把它們當作是森林，而他們最大的志願，就是從蘇聯折些斷枝零梗，並且還告訴大家：『這就是蘇聯的真相！』至於他們是從那一棵樹上折下來的枝葉，那就只有天曉得！至於這些『植物學家們』又怎樣去改造那棵樹，那就更不可思議了！我們的列斯納先生就正好是這樣的情形，他從美國的『科學與社會』雜誌的一篇譯文中，斷章取義的摘出一些斷枝零梗，移植到『紐約時報』的園地裏去，裝成一座完全是歪曲的盆景；而這個完全歪曲了的盆景，竟又被移植到中國來了。

現在作者所寫的這篇文章，只是根據蘇聯雜誌中的那篇二十三頁的論著，來就列斯納等人曲解的文字作一個批評，至於其他的一些關於認識蘇聯的問題，只有留到其他的專文裏容覆。

第一個問題：蘇聯那篇關於經濟問題的長文，究竟發表在什麼雜誌上？是誰寫的？並且是爲什麼寫的？

在列斯納的那篇曲解的文字中這樣寫道：『此項新學說及對蘇聯過去經濟學教條的非難，發表於最近一期『蘇聯經濟雜誌』內一篇二十三頁的論著中。這篇論著代表上項雜誌編者們的意見，他們都是蘇聯具有領導地位的經濟學家，包括里昂梯夫、米丁、費道塞也夫、克羅次可夫、俄貝里、坡頓金、圖定，法斐洛夫、托爾欽諾夫及庫爾涅夫諸氏』。公孫震的文章中也有這樣的話：『最近蘇聯經濟學報發表一篇列恩鐵夫、密廷、費多斜夫等諸著名經濟學家的聯名宣言，批評馬克思經濟理論中的

若干錯誤」。

其實這一篇文字，並不是發表在『最近一期』的什麼『蘇聯經濟雜誌』上，更不是里昂梯夫等『著名經濟學家的聯名宣言』。第一先要弄清的，就是在蘇聯研究經濟問題的雜誌中並沒有什麼『蘇聯經濟雜誌』或『學報』，至於此地所提的這篇文章，是發表在去年七八期合刊的『馬克思主義旗幟下』（五六頁——七八頁），題名是『關於講授政治經濟學的幾個問題』，全文倒的確是二十三頁。第二點要弄清的，就是里昂梯夫等十個人，是『馬克思主義旗幟下』雜誌的編輯委員，其中只有里昂梯夫一人是經濟學家，即『政治經濟學教程』一書的著者。其他幾個人，如米丁、幽定、費道塞也夫、克羅次可夫、都是著名的哲學家，坡頓金（一譯：波丹金）是外交史家，奧貝里是生理學家，法斐洛夫是物理學家，托爾欽諾夫是軍事學家，而現在列斯納等人都把他們混為一談了。第三，這篇文章既不是什麼『聯名宣言』，也不是對於馬列主義經濟學說的什麼『攻擊』和『全部修正』，更不是蘇聯將要實行『紐約時報』所謂的『新資本主義』的先聲。『馬克思主義旗幟下』雜誌發表這篇文章的原由和意義，在全文的後幾節中，已經講得很清楚，現在不妨譯在此地：

在我們過去的『政治經濟學的課程以及當時用的教科書和提綱中，都有着嚴重的缺點。這些缺點，已由我們黨中央委員會在一個決定中及時地指出，而得出了這樣一個結論，就是大學把政治經濟學，從一種研究真正的現實的活的經驗的一般的歷史科學，變成了一大堆反科學的抽象觀念與刻板的公式的結合。……

「蘇聯共產黨歷史」這部馬列主義學說的基本知識的百科全書的出版，武裝了所有科學工作者的隊伍（其中也包括經濟學者），給了他們一個重新改造整個工作的模範和榜樣。按照我們黨

中央委員會的指令，現正在編著一部「政治經濟學簡明教程」。在這個工作的過程中，黨中央提出了許多關於政治經濟學最基本問題的許多最重要的和原則上的決定與指示。

這兩段文字難道不夠明顯嗎？但列斯納先生把它曲解成另一種東西了。在這篇文章中，還有一段文字，恰好用來答復這些曲解家，也不妨引在此地：

「大家都知道，各種不同的社會主義的敵人——資產階級的經濟學家和危害者，來自法西斯主義間諜機關的托派布哈林派陣營的資本主義的復興者——他們企圖在社會主義經濟裏散布資本主義經濟的法則。在他們這種有害的，反革命的目的中，他們用毀謗的口吻歪曲我們國家中的社會主義關係的特質，偽造這些關係，並且把它們染上資本主義關係的顏色」。

第二個問題：政治經濟學研究的對象是什麼？

列斯納先生這樣寫道：「他們所指陳的過去蘇聯經濟權威的錯誤，可首先從他們對經濟學所重下的定義中見其梗概。這重下的定義，認為經濟學是「解釋人類社會各種發展階段中支配主要消費物品（無論個人消費用的或生產過程中用的）的生產與分配之定律的科學」。其實列斯納又在斷章取義，只摘錄了這個定義的尾巴，而把它的最重要的一句丟掉了，並且這個經濟學的定義，並不是嶄新的，「重下的」，它實際上是根據馬、恩、列等人關於經濟學的界說，將經濟研究的對象弄得更加明確。

關於經濟學研究的對象問題，在我們前面所提的那篇經濟學論著中是這樣說的。就是蘇聯的教授們在過去講授經濟學時，不能給聽眾一個關於經濟學的「明顯、完整而確切的定義」，結果不是想在這個定義中包括萬象，就是只根據馬列主義的個別的論述而得出一個不正確的界說，因此這篇文章就重新列舉出馬、恩、列等人關於經濟學的界說，來解決這個問題。這篇文章首先指出，馬克思主義的



創始者在奠定科學的新途徑時，他們常按照他們研究問題時的實際情況，從這一方面或是另一方面來下一個經濟學的定義。因此，我在馬列主義的著作中，就不能求得一個「固定的完成的普遍的適用的定義」，恩格斯在「資本論」第三卷的序言中說，大家一般都誤解了馬克思。「以為馬克思要加說明的地方，是馬克思要加定義的地方，好像在馬克思的著作中，我們應尋求固定的完成的普通適用的定義一樣。實則，當事物及其相互關係不被視為固定的，而被視為變動的時，它們在人腦中的反映，概念，也同樣須受變化和轉形的。它們不能被封入硬結的定義中，却可在歷史或理論形成的過程中被展開」。這段文字最後的幾句話值得我們注意，這告訴我們：不要把馬列主義變成僵死的教條。

舉如馬克思遠在「政治經濟學批判」的導言中，就說政治經濟學的出發點，是「生產一般」，是「社會的個人們的生產」。我們大家都知道，生產可分成兩方面：技術的和社會的，前者是自然和技術科學所研究的目標，而後者就是經濟學所要研究的目標，換句話說，經濟學是研究在社會生產中與人之間的社會關係的。因此列甯說過：「政治經濟學所研究的，並不是『生產』，而是人對於生產的社會關係，而是生產的社會機構」。生產的社會機構，除生產本身外，還包括分配，交換和需要等問題，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的導言中也說過，「生產、分配、交換、消費，……是構成一個整體的各個成份」，但在這裏面生產是起主導作用的，因為沒有生產，就無從談分配，交換和消費了。

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也有這樣的話：「政治經濟學，在其廣義上講來，是一種研究統治着人類社會物質生活品之生產與交換的法則的科學」，但是政治經濟學對於各個國家和各個歷史時代，不都能是一樣的」。因此他更進而又說，「政治經濟學是研究各種不同的人類社會的生產、交換，以及與生產、交換相適應的生產品分配之條件與形式的科學」。列甯也說過：「政治經濟學是研究在發展

中的生產及分配的社會關係的科學」。因此，蘇聯現在就根據馬、恩、列等人上述的意見，製定出一個較為完整的政治經濟學的定義，這個定義的全文是：

「政治經濟學是研究人類社會生產的關係，也就是經濟的關係之發展的科學。它解釋在人類社會各個不同的發展階段中，統治着必要消費品（無論是個人的或生產的需要的）的生產與分配的法則」（前面一句是給列斯納抹煞了的。）

從這個定義中，我們並看不出什麼「全部修正了」馬列主義的學說，反而是使得馬、恩、列等人的學說更加具體化和向前發展了。

第三個問題：是不是蘇聯「攻擊」了恩格斯的關於原始共產主義社會的學說？

列斯納先生說：「恩格斯是馬克思的合作者，在蘇聯與馬克思同被尊為蘇聯官方社會哲學創立者之一」，而蘇聯現在竟「攻擊」了他的經典著作「家庭、私有財產與國家之起源」一書中的思想了，這段文字說：在前文明時代的社會結構裏，不但受物質生產條件所決定，亦為「家庭之形式」所決定，並且「修正」的學說中也未提到家庭作用。另外蘇聯所「攻擊」的一個錯誤，就是過去對原始共產主義帶有浪漫色彩的過分理想化。是不是蘇聯「攻擊」了恩格斯呢？關於原始共產主義制度的問題又是如何講的呢！且再看那篇原文吧。

這篇文章說，蘇聯過去在講到原始共產社會制度時，犯了兩個錯誤：第一是違反了歷史唯物論的原則，按照這個原則應該說：一定的社會關係的形式，是由生產力的特點所決定，第二是違反了歷史的現實性，把原始共產制度理想化或觀念化了。前一個錯誤是由恩格斯在「家庭、私有財產及國家之起源」一書序文中的一段話所引起的。這篇文章的執筆者指出恩格斯在這序言中所說的話是錯誤的，

但也只是在這一個地方恩格斯說錯了，這只要看這篇論文的話就可以明白：「上面所舉的恩格斯的這一個錯誤的意見，和馬克思及恩格斯本人許多非常明顯的指示是相矛盾的，這些指示說：生產關係的基礎，只是生產力的發展。並且這個錯誤的意見，絲毫都沒有爲恩格斯這本著作中所包含的對於原始社會發展的具體分析來加以證實過」。由此可見蘇聯學者們並沒有把社會主義科學的創始人的每一句話，都當做聖經，當做不可變易的「教條」；但同時指出某一句話的錯誤並不是推翻或「修正」整個理論體系，那是不待說的。

至於關於將原始共產社會理想化了的問題，這篇文章說：這種理想化，使得大家會違背了人類社會發展之進步的性質的原則，以爲從原始社會發展到階級的社會，不是社會進步的一個必然的階段，而視爲是「陷入罪惡和被逐出天堂樂園」了。更進而「就造成了一個最錯誤的看法，以爲共產主義就是回返到原始時代的人們生活的社會中去。很明顯地，這種類似的看法，是違反了馬列主義學說的基礎和整個精神的」。這篇文章進而分析了原始共產社會的發展，在某個階段，它就成爲向前發展和社會進步的阻礙，因此它不得不讓位給新的生產方式的社會，這是歷史發展的根本原則。同時這篇文章着重指出原始共產社會和現代的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的社會，從生產以及各種不同的方面看，「都有着天壤之別」。這些本來是馬克斯的唯物史觀的根本觀點，蘇聯學者所反對的只是對於這種根本觀點的歪曲意見而已。

第四個問題：蘇聯學者是否已推翻或「修正」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分析資本主義經濟的學說？

列斯納先生的文中說：「馬克思的無產階級被剝削的理論在全部修正，資本主義被稱爲一個」進

步的」而不再是一個「落後的」制度了」。並且又說：「蘇聯的經濟學者警告一般教授們：從馬克思「資本論」的「嚴正邏輯」出發分析資本主義下的商品生產而開始經濟學的研究，是一種有害的拘泥，是違反教學需要的。可是就從這項資本主義商品分析中，馬克思才說勞工被推去了剩餘價值，也就是說資本剝削了勞工。」這是說：蘇聯現在已否定了馬克思的經濟學說，連「資本論」也被推翻了，反而承認了資本主義是個進步的制度。其實列斯納的文章，又是歪曲了原文的真相。

關於資本主義的問題，是在那篇經濟論著中講歷史原則的一部分提到的，此地既沒有「全部修正了」馬克思的經濟學說，只不過是從歷史原則的觀點，指出研究資本主義的正確方法及其研究的重要性而已。這篇文章中說，蘇聯過去講授經濟學，在研究原始共產社會，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時，是遵守着歷史的原則的，及至進而研究資本主義時，往往破壞了這個原則。教科書中講資本主義的一部分，都是根據馬克思的「資本論」的結構而寫成的一個空洞的骨架，大家忘了馬克思寫「資本論」時，並不是把它當作一部教科書和研究政治經濟學的參攷書寫成的，因此機械地抄襲「資本論」，就會造成一些害處。很顯然的，蘇聯學者在這更並不是認為「資本論」內容是應該放棄的，而是指出，不要死抱住「資本論」中的敘述方法，應該用更適當的方法來發揮其內容，所以他們認為：在講授經濟學時，應該遵守歷史的原則，舉如研究資本主義時，不僅要知道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基本特點，還要知道這個制度產生的原因；換句話說，先要知道資本主義準備時期的歷史過程，然後才能進而研究這個制度的基本特點，馬克思的「資本論」是從分析商品開始的，因為商品是揭發剩餘價值的必要的步驟，馬克思之所以這樣做，他的目的是想重新來建立經濟科學，但我們在初學經濟學時，就不能死守着這個不變的原則。舉如商品生產、交換和貨幣等，都是在資本主義生產發生之前就有的，因此按

照歷史的原則，就得從這些邏輯講起，並且在講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的經濟時，就已經要提到這些問題了，到了資本主義社會時，這些問題更佔有重要的地位。

進而這篇文章中又提到，在蘇聯人民進行偉大愛國戰爭來反對德國法西斯主義的今日，研究資本主義的獨占階段——帝國主義的問題，更具有特別的意義，否則就不能了解這次戰爭和德國帝國主義者的特質。在此地，不僅要指出資本主義獨占階段的特點，它作為社會主義革命的前夜的歷史地位，同時還要研究列寧和斯大林對這個問題所發展的學說，如經濟和政治發展的不平衡律及根據這個法則所演繹出來的一國建設社會主義的問題，這都是根據馬克思在「資本論」中關於資本主義分析的直接繼續和發展。

從上面的敘述中，我們就不難知道蘇聯學者並沒有推翻了「資本論」，也沒有「全部修正」了馬克思的經濟學說，我們只是從這裏獲得了如何才能深刻地掌握馬克思的經濟學說的實質的方法罷了。

第五個問題：在蘇聯是不是存在着「經濟定律」呢？

在蘇聯是不是存在着「經濟定律」（或法則）？在蘇聯是存在着「經濟定律」的，但我們有一點要弄清楚，就是這些定律和資本主義國家中所用的名稱相似，但它們的內容是不同的。

在我們前面所提的那篇長文中，在講完了研究資本主義的問題之後，就進而講到研究社會主義的問題。我們大家都知道，蘇聯經過了三個五年計劃的偉大建設，已逐漸由社會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的時期，一切剝削的階級已被消滅，將人剝削人的社會劃分為剝削與被剝削者的各種因素已經剷除，社會主義所有制與合作集體農場的社會所有制已在蘇聯勝利，並且共產主義的第一階段——社會主義，已在蘇聯基本建設起來了（請參閱莫洛托夫關於第三次五年計劃的報告）。在蘇德戰爭的今日，蘇聯

的社會主義經濟更經歷了戰爭的一切放驗，得到空前未有的大發展和發揮了無限的威力。

蘇聯的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有這樣大的成功，這並不是偶然的，並且它是有着社會主義的經濟定律或法則的。在蘇聯過去的經濟學的教科書中，存在着一個缺點，以為資本主義一消滅之後，在社會主義的國家經濟裏是沒有任何經濟法則，並且也不可能有的。其實這是違背馬克思主義的觀點。「要知道，沒有法則的地方，就不能有合法的發展，就談不上科學」，「任何一個社會，不管牠的形式怎樣，都是按照根據於客觀必要的一定的法則而發展的」，資本主義社會有資本主義的經濟法則，社會主義社會有社會主義的經濟法則，不同之處，就在於前者是種自然的經濟法則，是無政府的狀態的；而後者是「從社會主義社會物質生活的各種現實條件所產生出來的，是從它的發展的內在與外在的情況所產生出來的。但是這些定律的存在，並不是自然的，自流的，而是自覺的，由蘇維埃國家在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中自覺地應用和運用的」。我們只要舉出蘇聯的計劃經濟，蘇聯全國工業化和蘇聯農業集體化的原則，社會主義的領導原則：各盡所能，各取所需，——這就是蘇聯經濟發展的最主要的經濟定律（或法則）。

第六個問題：在蘇聯有沒有「價值定律」，價格和利潤等問題？

使列斯納先生們驚奇的是在蘇聯的「新的理論」中居然也承認有價值，利潤等問題，「並且甚至承認在蘇聯亦有經濟定律的作用了」。但是價值，利潤等問題，在社會主義經濟中本來是存在的，不過要注意的是，它們在實質上已不同於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的了。

先從價值定律來講起。在我們所提及的那篇關於經濟問題的論著中，有七頁之多的地位是專討論這個問題的。它先指出在蘇聯的教科書中有許多不正確的看法，以為從社會主義革命的第一天起，一

切經濟定律都失掉作用了，其實問題不是這樣簡單，就拿價值的定律來講，大家以為在社會主義中不存在價值的定律，並且說在社會主義制度之下價值定律不起任何作用，這就完全違反了馬列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全部精神，並且和社會主義建設的全部經驗是違反的。在社會主義的社會中，是國家來管理價值的定律，爲了社會主義的利益，爲了有計劃地管理國民經濟而自覺地來運用它的機械（如貨幣、商業、物價等等）。同樣地，我們在馬克思的「哥達綱領批評」和「資本論」第三卷中，都可以找到論資本主義消滅之後在新社會中的價值問題。

在社會主義的社會中，社會生活的領導原則，就是各盡所能，各取所值。很明顯地，在此地就可以看出，價值的定律不但沒有被取消，反而存在着，並且是在另一種和資本主義不同的關係下繼續發生作用。要計算每一個人的工作，就得拿工作日，工作時來計算，這就是計算工作價值的一個尺度。更進而說，社會主義勞動的生產品是具有價值的，爲了交換一些生產品，爲了表現它的價值，就必須有商業，銀行，貨幣，信用等機構。每一個工作者，按照自己工作的價值取得一定數目的貨幣，即可拿這些貨幣再去購買貨物，物價問題也就隨之產生，物價同樣地也是按價值和生產的數量來決定的。

從此我們就知道，價值問題在社會主義經濟之下，不但沒有取消，而是以另一種實質出現。它和資本主義價值問題不同的地方，就是「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價值律是市場上的一種自然律，它不可避免地受生產力的破壞，經濟恐慌和生產的無政府狀態的影響的，但在社會主義社會中，它是由蘇維埃政府在國民經濟計劃發展的條件下而自覺地運用的」。

講到利潤問題，蘇聯一切企業都是屬於唯一的主人——蘇維埃國家的，它是全人民的財富，它同

樣也產生出豐富的利潤。但既然企業的主人已不是個別的資本家，而是全體人民，因此利潤的性質與作用也和在本主義社會中完全不同了。這可以聯系到下一個問題來講。

#### 第七個問題：蘇聯有「剩餘勞動」嗎？

在蘇聯過去講授經濟學時，還有一個錯誤，以為在社會主義條件之下沒有剩餘勞動，其實這是不正確的。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中早就說過：「爲了要造成社會的準備基金與蓄積基金，這種勞動是必要的」。事實上，剩餘勞動（超過工人個人的直接需要的勞動），在任何社會中都是存在着，但在人剝削人的現象被消滅掉的社會裏，剩餘勞動已不是被剝削的對象，而成爲充實人民福祉的一個源泉。同時由於工人大衆的需要增長，人口的數量自然地在增加，更爲了解決擺在社會主義前面的龐大任務，擴大生產已成爲必要，累積剩餘勞動也就成爲必然的事，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三卷中，曾指出一個國家在過渡到社會主義制度之後，是必須保有剩餘勞動和剩餘生產品的，在「哥達綱領批評」中，更詳細地指出這些剩餘勞動的用途。

在資本主義國家裏，剩餘勞動變成寄生的剝削階級的利潤，而在社會主義社會裏，它是屬於人民的。這些剩餘價值就用到擴大生產，用於鞏固國防，用於文化教育，用於人民的保健事業，用於醫藥衛生及養老等，因此，剩餘勞動的累積更是必要的。這也正如列寧所說的，在社會主義的社會裏，「剩餘生產物並不是歸於私有產者的階級的，而是歸於全體勞動者，並且也只是歸於他們的」。在此地，正存在着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經濟的不同的地方。

最後一個問題，第八個問題：蘇聯現在所實行的是不是「新資本主義」或「國家資本主義」？在「紐約時報」的社評中說：「現代的蘇聯甚至比美國更「資本主義化」。但因新資本與主要生



產工具仍爲國家所有，並仍由國家經營，其制度自然不是美國那種的私人資本主義，而是「國家資本主義」。」實際上是不是這樣的情形呢？這只要了解蘇聯的經濟制度的本質和蘇聯國家的性質，就知道是怎麼一回事了。

在蘇聯的經濟制度下，是已根本消滅了人剝削人的現象的，一切的產業和利得，全部是屬於廣大人民的；所以，蘇聯的國家已不是代表一個階級來壓制別的階級，而是真正屬於全體人民，一切企業就都由這個國家來經營。並且「某些反表的觀察，舉如好些外國的新聞記者和經濟學家，他們企圖把這一切分別（指社會主義國家與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作用的問題——權註），都歸之於只是量的不同，他們說蘇維埃政府比其他現代國家「更多地干涉了」經濟生活。可是事實上，問題應該是在於根本的質的不同，是在於社會主義之下的國家在原則上具有另一種作用」。我們大家知道，在資本主義的國家內，一切的經濟都是建立在私有財產的基礎之上的，特別是資本家擁有生產工具。在那種情形下，國家可以干涉他們，但這種干涉與而加深了一種嚴重的後果，不是把經濟權力集中到少數的資本家去，就是使得其他經濟集團失敗破產。『但是在社會主義的條件之下，國家的經濟作用，意義和機能，在根本上有着原則上的不同。所有的生產工具都在全社會的手中，是社會主義的財產，而這些生產工具是全人民的財富，換句話說，是屬於蘇維埃國家的。因此，社會主義國家所完成的許多機能和任務，在本質上是和任何國家不同的。』蘇維埃國家是一個最偉大的經濟力量，特別在這次蘇德戰爭中，蘇聯能將龐大的工業建設，在戰爭的條件下從西方遷移到東方，這種情形是其他國家不容易做到的。從此也可以看出，蘇維埃制度，是怎樣一種「最進步，最前進的制度」了。

『紐約時報』的社評硬要說蘇聯的社會主義的經濟，是種「新資本主義」，是種「國家資本主義

，在蘇聯的那篇經濟論文中，正有着一段批評這種錯誤觀點的話：現可引在此地：

「……資產階級的經濟學者……他們企圖在社會主義經濟裏散佈資本主義經濟的法則……他們把它們（指社會主義的經濟關係——權評）染上資本主義關係的顏色。」

「我們只要指出他們說我們社會主義的企業、商業、貨幣、銀行等等，都好像具有『國家資本主義』性質的一些醜惡的理論就夠了。各種不同的資產階級的資本主義復興運動者，他們撒佈了不相信社會主義會勝利的毒藥，傳播一種可憐的思想，說從前統治着資本主義經濟的不變的法則，在蘇維埃政權之下還繼續有作用，任何一種破壞這些法則的企圖，只會造成經濟上的動搖。這種敵視的看法，已遭到我們黨的迎頭痛擊，並且已被社會主義建設的豐富實踐，社會主義的最偉大和具有全世界歷史意義的勝利所粉碎了。」

從上面這八個問題中，我們已知道列斯納等人是怎樣斷章取義地在曲解事實的真象，從亨利·明斯的信中我們也可以看出，就是把列斯納先生的文章和『科學與社會』中的譯文比較一下，已發現了許多不正確，曲解和斷章取義的地方了。從此就更知道列斯納先生們所創造的馬克思主義被『全部修正』和蘇聯實行『新資本主義』的神話，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這就是所謂『共產主義教條的基本修正』！

從『馬克思主義旗幟下』的論文中，我們絲毫也不能看到什麼『共產主義教條的基本修正』，恰恰相反，我們所看到的是蘇聯學者們正在應用馬克思主義的根本原則來解釋說明社會主義社會的發展規律：這樣便使馬克思主義理論更向前推進了。（五月二十六日新華日報）。

## 五、認識蘇聯

公孫震

(一)

抗了七年的戰，並沒有改換了我們民族的政治意識。到今天，我們的頭腦還依舊停滯在「內向」類型，總不肯真正抬起頭來「外向」上下四方觀察。到今天，我們還是憤憤不認識我們的敵國，不認識我們的友邦，對整個外在的局面只憑着主觀的情見，一味對付，衝動！試問袞袞臺省諸公，那一個機關真正在那裏探討各國國情？爲什麼到今天我們還沒有一個類似英國皇家國際問題學會，美國外交政策學會之組織，把人才，把書籍資料集中起來，對國際情形開始作一番有系統有根據的切實研究？拿着你那「國民外交」式的茶會食廳對外賓送往迎來，是永遠遺發不了時代的需要的。需要不在交際應酬，乃在知己知彼！

大公報洞悉時病，日前發表了一篇社評喚呼大家「認識美國」。近來訪英團回國也頗給予了大家一些「認識英國」的文章，讓我在這裏加上第三聲的呼籲：「認識蘇聯」！

(二)

我們今天上上下下對蘇聯一切情形瞭目無所知，閉目不求知，真可說是二十世紀中一樁咄咄大怪事，這個不可諒恕的愚昧，將來必定要自食其果的！

你說，蘇聯一向是一個謎，不好懂。我說，正因爲她是謎，所以更須懂，贊成反對由你，這一個基本事實已經是鐵般確定了——在戰後的世界，蘇聯是不折不扣的首席陸權國家！蘇聯或許無須認識我們，我們却不得不認識蘇聯，如果英美爲了戰後和平建設需要認識蘇聯，我們有一萬五千里的國界

與蘇聯大野交鋒，如何而容得不認識蘇聯？

我不明白爲什麼社會上一般人對蘇聯諱莫如深，避之若浼？

蘇聯是我們盟邦之一，她雖然對日本還維持關係，她對我們抗戰初年的援助仍爲我們所永矢弗忘的。在戰後世界的若干組織裏，我們將要處處遇到蘇聯，在戰後亞洲的局面裏，蘇聯尤握有決定性的發言權。我們對這樣重要的友邦，如何而容得不認識？訪美訪英的善意使節，我們都遣發過了，爲什麼不來一個訪蘇團？留學生交換辦法，連印度土耳其都開始了，爲什麼不能派學生到蘇聯呢？因噎廢食等於自殺，何況噎不噎把握本在我？

蘇聯究竟往那去？整個蘇維埃的政治，經濟，文化的推移究竟是怎樣？她的國際政策的傾向究竟又如何？這些與我們國家可能息息相關，我們須要步步留心認識。

### (三)

據我所知，整個蘇聯社會，經過這次血戰的洗禮，正在醞釀着一種新動向。這種新動向，如果充分發展出來，對國內國際都有莫大的意義與影響的。有四點最堪注意：

(一) 國家思想的抬頭。——大家都曉得，當日史達林與托派爭執中心之一，就是所謂「社會主義化的國際性」問題。在堅執蘇聯可以單獨社會主義化，無須假手於國際無產階級革命之主張下，史達林已無形中把蘇聯的革命運動由階級基礎初步轉移到國家基礎上面。戰事未發以前，「社會主義的祖國」一名詞，已經充分流行。戰事發生以來，「階級鬥爭」的觀念，事實上，意識上，都消化於血浴肉搏的火燄中，而由「民族鬥爭」「保衛國家」各觀念所代起。馬克思，恩格斯所提倡之效忠階級的倫理觀既不合用於當前「護國」的現實需要，愛國倫理觀之宣揚，從而風起雲湧。「俄羅斯」三字

已取得了一種新意義，在全國人民的心靈中，產生一種不可言狀的吸力。「俄羅斯是我們的歡樂，我們的自由，我們的過去與將來，我們的心靈與靈魂！」「俄羅斯！大好山河！二千一百萬方公里的版圖，二萬萬的同胞！」鐵流浩去這種呼聲可以代表當前一切蘇聯作家的心坎與歌調。這次戰爭，最親切的意義，是「俄羅斯」對「德意志」的決鬥，是撲殺德意志強盜的保國戰。所謂主義對壘的意義，倒是次要的事實。最能簡潔象徵這種新情緒的：史達林書房已不掛着馬克思，恩格斯的相片，而代以古俄的尼甫斯基，古突曹夫各名將的肖像。新國歌的製採，第三國際的解散，馬克斯六十一年忌辰在蘇聯報上一字不提，等等事實，也都可說是國家思想取代階級哲學的表現。

(二) 傳統文化的復活。——這是與國家思想連帶而來的。十年前蘇聯領導者的一般看法，都認一九一七革命之年為真正歷史的開始。前乎此的帝俄一切不過一片黑暗與暴虐。近年來的傾向漸漸變更，對過去的文化傳統漸漸能夠採取欣賞態度。抗戰發生，他們對民族過去的悠長歷史更加親切眷戀與回思。上自反抗條頓騎士的戰爭，伊凡恐怖王彼得大帝的人格功績，下至歷代的俄國科學家，藝術家，文學家，莫不盡量揭發表揚。曹式庚，哥格爾，隨夫托葉夫斯基，托爾斯泰以及其他偽俄羅斯歌哭禱祝的不朽作家都在崇拜之列。最含意義的，或許是宗教信仰的再現，俄羅斯民族本來極富宗教情緒的，儘管在沙皇手裏，教會流於統治者壓迫個性的工具，但純潔宗教感覺在俄國人的心靈生活上，實產生着深刻的啓發能力的。自來俄國偉大的文藝美術創品，例都充滿了宗教精神。革命初期的剷除宗教運動與廢除家庭運動可說是根據馬克思，恩格斯唯物史觀而發動出來的兩樁對人類文化傳統最激烈最徹底的翻案。然而畢竟傳統力強。家庭制度轉瞬恢復，希臘正教亦逐漸抬頭。禮拜儀式已經不受排斥，任何一（軍官在內）均可自由參加。目前還有一批戰時新作家坦白謳歌平民那種虔畏上帝的虔

風敢情乃俄羅斯民族潛力之所在了。

(三)平民價值的發現。——說也奇怪，俄國革命原係解放平民而發動的。却是一次，二次，三次的五年計劃都在當軸者無限威權與無情邏輯下緊迫進行，人格的感覺，人的莊嚴與價值幾乎盡數消磨於龐大的機械程序中。卽就集體農場運動而言，不管在政策上如何必需，在執行中不知斷送了若干農民性命！十餘年來大家謳歌計劃經濟的成功，生產數量的激進，爭誇政府萬能，黨人領導得力，甚至勞工神聖，勞動英雄的鼓吹也都能無微不至，應有盡有。只是大家忘記了——忘記體驗到人民沉默中所消受的寧苦與犧牲，生命血汗的犧牲，人格價值的犧牲。十餘年，二十餘年來的俄國一般老百姓只顛倒在翻天覆地的大命運下，供奉無情大事件，無數大錯誤的驅遣鞭笞。戰事發生以來，更是千萬生靈喪命傾家。目睹這個浩劫，蘇聯一般領導人忽得到一種新感觸，感觸到俄國老百姓之可愛，感觸到他們在過去無情追求主義之實現中竟不免蔑視了老百姓的情感意志，而今且學家衛國，犧牲最大，功績最偉者，畢竟還是來自農村的無數士兵，生長農村的無數「穆式克」！蘇聯的知識界目前正深刻體驗着一種靈魂上的懺悔，覺得過去一切雖然都似乎不可免，若干計劃政策都顯然是時代的必需，然而他們並未曾盡他們所應盡之力求爲這些不言不語的老百姓避免許多無謂的慘運。他們對不起俄國人民！於是許多謳歌黨政，謳歌物質建設的著名作家都改變作風來謳歌平民的價值。他們所描寫的英雄，都是村童鄉媼，挺身衛國，做盡可哭可泣的事績，並不因爲任何政治主義之驅使，乃全出於數百年來民間固有道德與宗教觀念之遺澤遺風！一大批風行全國，風行隊伍裏的小說詩歌，兩年之間，竟脫淨了黨義式公式式的圈套，而單刀直達一種「純人文」的母題，在標榜民間固有的簡潔道德價值中，不少作品竟大膽地直接間接刺諷黨人行爲之不逮。

(四)經濟學說的修正。——自新經濟政策施行以後，蘇聯學者即開始對正統共產經濟學說作若干例外的解釋。最近蘇聯經濟學報發表一篇列昂鐵夫，密廷，費多斜夫等等著名經濟學家的聯名宣言，批評馬克思經濟理論中若干錯誤。該宣言自稱爲史達林派的想法以區別於馬克思或列寧的舊套。其重要主張包括：(甲)社會主義的經濟制度下，價值規律仍然存在；(乙)社會主義國的勞力品質，優秀仍有不齊。計件工資應當存在；(丙)生產成本爲執行計劃經濟之要素，簿記乃必需，市場價格亦不可免；(丁)剩餘價值爲任何社會制度所必有之現象。一則社會主義國亦需要資本累積，二則國防，教育，社會保險，以及其他公共服務事業，均爲消費性質，需要賦稅制度；(戊)認原始共產制度爲落後，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爲「進步」，不過最進步的制度仍爲蘇維埃制，這些新結論行將編入教育課程，授知全國人民。

(四)

究竟這些新觀點意義何在呢？蘇聯經濟制度是否有逐漸變質，成爲資本主義之可能？蘇聯黨治勢力是否有減輕的趨勢，知識界的思想是否有略近自由的徵兆？國家思想有否過分發展的危險？舊俄的傳統精神的復活，有否方面與範圍的限制？這些問題直接間接都與我們發生莫大的關係。精確的答覆，非有一批學者不斷作當地的觀察，多方的探討，是無由取得的。

如果應用比較文化史的眼光來看，我覺得整個的蘇聯思維本質，已開始由革命時代的狂瀾階段轉入一種「發現自己」的前夕。一九一七年的革命，在某方面的意義說來，乃是繼承彼得大帝強制「西歐化」的作風。如果彼得的用意在把初期封建的莫斯科社會翻手變爲十八世紀的西歐式的商業資本國，列寧的作用在把工業落後的帝俄，一躍轉爲西歐式最新經濟理想所憧憬的國家。兩次突變都是迫

於西歐文化的吸力，只嫌步驟太猛了，不免失了腳底的平衡。經過這番抗戰大成功之後，我相信蘇聯將產生一種空前的自覺心，自信心。蘇聯將發現她自己，將發現其爲「俄羅斯」。她多少要以逐漸加強的獨立精神，對她的內外在的各種方針，尋出一個「道地俄羅斯」的路徑。馬克思教條式的權威，要逐漸減退，但俄國人手創的蘇維埃的經濟政治制度却仍要繼續，雖然不斷須應機修改，私有資本制度與英美式的民主自由一時却看不出有何可能。

俄國的整個文化意境，比西歐最少要年輕二三十年。因此，她活力亦特別豐富。在經濟技術的外形看去，她雖已達到最「摩登」的格調，而在整個民族文化意向論來，我認爲在某種意義下，應比類於西歐開明王制的前夕。一個民族文化發展到這個階段，例將有兩種現象產生：內則燦爛文藝的煥發，外則國力活躍的展開。蘇聯前途，是不可測量的！

（五月二十一日大公報）

## 六、認識與幻想

梁純夫

前幾天讀到大公報譯載紐約時報的「蘇聯的新資本主義」等文，便有點口癢。今天有人從鄉下來問我要這一類的材料，并拿出公孫震先生的「認識蘇聯」（五月二十一日大公報星期論文）一文和我討論，還說有人準備寫一部書，從「新經濟政策」開始，檢討蘇聯的全部經濟制度呢。這樣看來，紐約時報的文章在我們中國已經發生了相當大的感染，而公孫震先生自然是第一個把這種感染公開出來的。我雖然不是公孫震先生所期望的「一批學者」之一，却有心想追隨公孫震先生之後，來對這問題「觀察」和「探討」一下。

我非常贊同公孫震先生的主張：在呼喚大家「認識美國」，「認識英國」之後，應加上第三聲的



呼籲：「認識蘇聯」！因為，「整個蘇維埃的政治，經濟，文化的推移究竟是怎樣？她的國際政策的傾向究竟又如何？這些與我們國家可能息息相關，我們須要步步留心認識」。不過，應該注意的是，如果把「幻想」或「心願」(Wishful thinking)當作「認識」，就會像公孫震先生所說的，「這個不可諒想的愚昧，將來必定要自食其果的。」

#### 一、關於「國家思想的抬頭」

我覺得，我們應把「愛國主義」(Patriotism)，或譯「愛國心」跟「國家主義」(Nationalism)分辨開來。愛倫堡在「論愛國主義」一文中說：

「受希特勒教化的德國人的世界憤憤不能叫做愛國主義。愛國主義意味着對於自己的人民的愛，對於自己的祖國的愛。一個真正的愛國者愛着整個世界。可是法西斯們的假愛國主義，却是建立在對別國的蔑視上。它把世界縮窄成一個小圈子，限於一種語言，只包含一種血統，只有一個類型。」

「當我們現在說「俄羅斯」，這不是表示分別一個民族和另一個民族。「俄羅斯」這個字不再是一個國家的名字，它是含蘊在我們靈魂深處的一種東西，把我們和歷史聯繫着。」

無疑地，蘇聯在這次對德戰爭中曾喊出「愛國主義」的口號，但這和一般意義的「國家主義」是不同的，它更不同於希特勒們的偏狹的「國家思想」。而公孫震先生的這一節文字可能給人一種印象，在蘇聯的「愛國主義」和德意志的「國家思想」之間，並沒有什麼分別。這我認為是第一件遺憾的事。一個真正虛心「認識蘇聯」的人會說：「共產主義的理想是，當人類進步到一種完全友愛的狀態，國家可以消失而不再需要。納粹的理想剛剛相反——國家是一切的最高目標。」(台維斯：「出使莫斯科記」)這是需要我們「步步留心」的。

## 二、關於「傳統文化的復活」

盡人皆知，蘇聯的建國理論是依據於所謂「歷史唯物論」的法則。這「歷史的」就是「發展的」意思。它是空想的社會主義和科學的社會主義的分界點。無論怎樣解釋，我們也不能認為這理論全然地否定了過去的文化傳統。因此，除非我們認為昨天的蘇聯會違背它的建國理論，我們不能說蘇聯今天的尊重文化傳統是一種突然的「復活」現象。事實上，好多年前我們伊曾聽得蘇聯學者們關於怎樣接受文化遺產和文學遺產問題的熱烈討論。我們常常聽到托爾斯泰和普希金等的著作，每種在蘇聯印行幾百萬冊以至幾千萬冊，並且用各種不同民族的文字印刷。「奧尼金」，「戰爭與和平」和「安娜卡列尼娜」等等，一向是蘇聯劇場最受歡迎的戲。柴爾夫斯基的樂曲，萊蒙托夫的詩，羅曼諾索夫的科學貢獻，彼得大帝政治功績，一向都被蘇聯人民讚頌着。好幾年前，莫斯科選舉行過各民族藝術表演的「十日節」，細心發掘着俄羅斯以外的蘇聯各民族的優良文化傳統。所有這些事情，都不是今天才開始的，第一個認識和推崇托爾斯泰的作品真正價值的人是列寧，這已經是衆所週知的了。

但是，我覺得我們應該把「接受文化遺產」跟「復古」分辨開來。而公孫震先生這一節的文字，似乎要使人相信蘇聯現在正澎湃着復古運動。這是我認為遺憾的第二件事。

## 三、關於「平民價值的發現」

我不知道公孫震先生所說的「平民價值」是什麼意思。但接着有一段說明的文字：「一次，二次，三次的五年計劃都是在當軸者無限威權與無情邏輯之下緊迫進行，人格的感覺，人的莊嚴與價值幾乎盡數消磨於龐大的機械程序中。」那麼，這大概是指一般所呪咀的「機械主義」或「唯物主義」了。

蘇聯在二次五年計劃的實踐中：是不是那樣機械主義，而把人的因素完全抹煞了呢？斯大林在一九三五年的一次演講中曾說：

「我們慣常說，「技術決定一切」……這一口號使我們終止了技術的缺乏……那是很好的。但它是不夠的。它是遠不夠的……沒有駕駛技術的人民，技術是死的。在能駕駛技術的人民管理下，技術可以並且應該完成奇蹟……已經是到時候應該了解到，在這世界所擁有的一切有價值的資本當中，最有價值和最有利的是人民。」

這段話說明了計劃經濟之所以為計劃經濟，它是有步驟的，不是一下子全來的。當技術缺乏時，它拚全力於發展技術；而在技術充足之後，它便訓練人來更熟練地駕駛技術。斯塔漢諾夫運動是在這後一要求下產生的。英國經濟學者莫禮士·多布在「戰時和平時的蘇聯經濟計劃」一書中，把整個斯塔漢諾夫運動看作「人格」駕駛「機械」的一個發展過程，這是他的「認識蘇聯」。而公孫震先生對於這些事實「瞠目無所知」，因而說了一大堆不着邊際的話，我認為是遺憾的第三件事。

#### 四、關於「經濟學說的修正」

公孫震先生在這一節文字裏舉出了（沒有攷慮地完全抄襲了紐約時報的說法）「修正」的五點，包括着許多經濟學上的重要問題，要在本文中逐一加以討論是不可能的。問題的中心是蘇聯是否走向某種「資本主義」的道路上去。我想下面所引莫禮士·多布的話，可以作一個概括的答覆。他在「戰時和平時的蘇聯經濟計劃」第一章開頭便說：

「人們有時會碰到這樣的言論，認為「利潤心」在蘇聯經濟制度中仍然扮演著顯要的角色；從這出發，似乎要說這一制度和本質上類同了。不過，作這種論調的人常常顯露出這是意味着金錢

的動機在生產工作上依然是顯著的一個。換句話說，他們是把利潤心和金錢的動機當作意義相同的詞兒使用。可是，把作爲「工作」報酬的工資或薪水，和作爲資本家「廠主」的收入之平常意義的利潤混爲一談，必然是故步自封的；並且，如像泰晤士報上最近一些通訊所暗示的，可以引出一大堆廢話來。」

多布的書是一九四二年在倫敦初版的。由此看來，外面世界對於蘇聯經濟制度的曲解，由來已久。而公孫震先生拾人口慧，便懷疑蘇聯經濟制度「逐漸變質，成爲資本主義之可能」，這是我認爲遺憾的第四件事。

最後，公孫震先生從這幾點出發，又得到了一個奇怪的結論：「俄國的整個文化意境，比西歐最少要年輕二三十年……我認爲在某種意義下，應比類於西歐開明王制的前夕……蘇聯前途是不可測量的。」  
「私有資本制度與英美式的民主自由，一時却看不出有任何可能。」  
這兩段話給人的印象，似乎是那不可測量的蘇聯前途，是向後看的。

這就不只是遺憾的事了。

我相信公孫震先生這次號召「認識蘇聯」，是出於「爲國家」的善意。但是在他自己的認識中，竟充滿了這麼許多遺憾，我不能不懇切地提醒他的良心的呼聲：「閉目不求知，真可說是二十世紀中一棒咄咄大怪事。」同時：我熱誠響應他的號召：「精確的答覆，非有一批學者作當地的觀察，多方

（五月三十一日新華日報）

## 蘇聯的革命是否已經完結？

Valtor Duranty  
張 同 譯

“THE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蘇聯革命是否已經完結，抑或和其它革命運動一樣，已經轉成溫和保守了呢？如果如此，它對蘇聯的未來以及它和世界其他各國的關係上又有什麼意義呢？

早在一九四一年春天，在蘇聯未受侵略之前，到莫斯科去的美國旅客們很難注意到任何他想像中共產主義的蘇維埃主義的外表表徵。他自然會注意到一般生活標準比美國低落得多——從汽車少，服裝高貴的人少；商店中陳設的貨物很少。但是如果他和一位俄國朋友，例如一個工廠中一部份的首領，一位醫生或一位職業人去吃飯，他會吃驚地發現進餐是在一個小別墅中一間舒服的房間裏，由一位廚司或女僕招呼，他的主人會談到買戲票，這正如他在紐約所為一樣，而且他還談到「我的汽車」。真的，客人也許會發現汽車「出差」去了，這並不是說他的俄國朋友沒權用它——他似乎可以無限制地用它。同樣地，美國客人在百貨商店中可以任意選擇貨物，一如在美國時那樣，那就是先選擇，接到一張單子，按此在出納處付款換取所要的貨物。在小店中他可以未經這種中間手續直接在櫃上付款。

在旅館中，旅客會發現一切和在國內相同——不過享受和方便上的水準較低。他可以在服務處叫早餐，在本子上簽個字叫一頓飯，給侍者一點小費，在旅館辦事處定旅行車票或戲票，必要時他還可以得到一個嚮導或一輛汽車。不然他可以喚一輛出租汽車或街車，就像在國內那樣付錢打發它們。在車站上，腳夫也許會拒絕小費說：規定是一毛錢一件，但是在大多場合下他歡迎取二毛錢外快的。臥車的車掌同樣歡迎這種收入。

總之、雖然旅客知道這些旅館、商店、出租汽車、街車，甚至國內的一切，完全是國有國營的，除了很少例外，所有男女們全是爲國家或地方統治的機關——如合作社或市政機構——服務的，但是他很難看到蘇維埃主義或共產主義明顯的表記。

這一切都證明了蘇聯已經脫離了早期所謂「軍事共產主義」了，那時人人得到同樣工資，租屋旅行一律公開，平民們得到紙券以之在特定店家中換取食物或用品。換言之，蘇聯在今日已經大規模採取資本主義的方法了。

一個工廠主持人和普通雇員之間的薪資相差很大。後者因額外工作得到額外報酬，或因超過預計工作成績得到外快。一年之後，全體雇員都分到紅利，有時紅利變成了新游泳池或工廠戲場等一般形式，但大多是以現款個別分發的。

如果這位旅客更進一步作種種研探，他會發現工商業和他國內一樣，是由中央銀行或它的地方支行投資的，有嚴明的賬本可查，而且商業及其它企業目的都在盡可能地賺錢。他可以看到報紙和其它地方有出錢刊登的廣告，在禮拜天，雖然開門的教堂很少，其中却擠滿了前去祈禱的人。

在政治思想上，在所謂蘇聯政策基本指針上，很少顯明的變更。在一九二五年時，托洛斯基和布爾雪維克頑固派們宣稱斯大林和他的部下們是在背叛馬克斯社會主義和世界革命的原則而祇局於國家觀念，斤斤以蘇聯本身之利益爲重。十年之後，托洛斯基和頑固派們銷聲匿跡，斯大林建立起他不可動搖的權威，散佈國家觀念已經成了一個新的，明顯的，有意的努力。正如斯大林預見那樣，說這種變更是因爲國外戰爭危機之日增而並不是有意要放棄國際主義教條，並沒有發生什麼大效果。

第一件可注意的事就是在一九三四或一九三五年時重採用革命前的一個名詞「Rodina」(意思

是「祖國」或「生地」)，這名詞被報張，無線電及演說家們採用來代替布爾雪維克的名詞「Socialisticheskoyot chstvo」(意思是「社會主義祖國」)。這是很重要的風向表記，立刻就顯明地普遍加強渲染愛國主義的美德，宣傳一切蘇聯公民都有爲他們的國家作戰的責任和特權。戲劇和電影中開始敬頌像彼得一世那樣的沙皇的成就，歌頌擊敗侵略者的名人如亞力山大，尼夫斯基等的功績。沙皇時代的名將如蘇伐洛夫及柯托蘇夫等的愛國功績，都成了頌揚的主題。

還有一件值得注意的事，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原是描述亞力山大一世如何擊敗拿破崙的作品，已經再版了數萬冊。作曲家也被動員起來了，廣播的愛國和軍事音樂響動空中。一九三六年，向來以嚴格的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的教育體系也起了空前的變化，當局宣佈俄國史不再自一九一七年大革命時開始，而當更追溯往古之事了。

「愛國運動」種因於一九三六年的新蘇維埃憲法。它的基本目的(完全成功的)是要消弭蘇聯境內俄羅斯人，以及其它在中亞以前是「附屬人種」，高加索人以及各區內在數世紀來被俄羅斯武力或殖民方法所征服或同化的人民之間的分歧。因此，種種設施在使他們感到自己屬於同一個大家屬中，有同樣的機會，權利和義務。該憲法同時廢棄昔日農民大眾與都市人民選舉上不平等的地方，目的也是走向同一個方向——使全國要趨於統一團結。

三年的戰爭，明顯地而且非常地加速並加強了蘇聯之走向國家主義和愛國之道的進度，更表明了它距原來的共產主義或馬克斯社會主義的原則遙遠了。像和天主教教會採取友誼條文，解散共產國際，克姆林方面公開宣稱如在最近蘇捷條約中規定的蘇聯將不在刻松綫以西歐洲各國方面作土地之擴充或干涉彼等內政等舉動，是和內部更重要的變化相配合而來的。

禁衛軍師旅的重整，軍官的肩章和海外蘇聯外交武官的金邊制服，英勇戰士們的寶貴星章和獎牌（其中有些以沙皇時代勇將之名名之），以及軍事紀律之加強，取消文官統于軍事行動，規定紅軍軍官必須服裝整齊，容貌修潔，而且不能在公共場所挾攜「不雅之包盒」。這些規定是書不勝書，而且可以用來作種種之說法的證明。但它們實際上什麼都沒有證明出來；出力多的得償多，對有自發，勇敢和技巧的人給予獎勵這種體系，已經澈底地取原始軍事共產時代百分之百的出多少力得多少報酬的平等觀念而代之了。

這看來真可以說蘇聯革命已經完結，或者說它和其它革命運動一樣，已經轉成溫和和保守了。有兩件事至少是一定了的。第一、布爾雪維克革命已經自然地放棄了它的國際性，放棄了它企圖以武力或計謀推廣它的教義使之普及全球的念頭。其次，已經從被證明為不實際的純粹馬克斯主義的方法轉變到資本主義方法中去了——在以外報酬或獎賞，高級階級或享受等等來作刺激等事是一種事實表現。

但是，問題是在斯大林是否已經放棄了布爾雪維克革命的基本目的，這革命是否能完全全和它丟掉的「革命性的運動」相比擬。

韋氏大字典中將「革命」一詞詮解為「政治組織或政府，憲法等根本之變更」，更進而以「英國革命」中奧蘭琪之威廉及瑪麗取詹姆十二世之統治權而代之一事為例。列寧及斯大林絕不會以權力之自一朝代轉入另一朝代為革命，而且列寧不以克倫威爾在英格蘭以共和代替皇帝之革命為真正的革命，因為它不過是權力之自統治階級或「布爾喬亞」中一部份轉入另一部份之手中。他認為美國革命祇是殖民地對其母國或一統治權力所行的成功的叛變而已。



據列寧看來，在俄國（一九一七年）以及在法國（一七八九年）發生的才是真正的革命，是權力從統治階級轉入大眾手中去的激烈改變——或者是權力轉入大眾認為滿意的代表。在法國，這許多代表經過內部的爭執，不能長久掌握政權，它不久即轉入了拿破侖手中，拿破侖成了一個軍事獨裁者而完成了另一種革命——現在所謂的反革命。可是在蘇聯，布爾雪維克非但保持了政權，而且使這政權合法化，得到了廣泛大眾的支持而永久化，這樣，在俄國就和在法國不同，沒有發生反革命，因此在蘇聯這些社會變化是不能和其它「革命性的運動」相比擬了。

如果我們假定列寧當時開始權毀金錢權力以及破壞用金錢來求私人利潤，以國家企業和集體主義來代替私人企業體系或資本主義，那麼托洛斯基和他的同情者們說斯大林「背叛革命」或者根本改變了革命這種說法是不能不受非難的。即使我假設中那位到莫斯科去的美國旅客也會馬上看出來在美國和蘇聯所採種種方法表面上相同的諸現象之下，仍然有着一種深刻而基本的分歧，這就是在蘇聯根本沒有財政，商業，工業或農業上的個人主義。這等於說蘇聯是決定地——縱然並沒有完全成功地——採取了一個社會主義或集體主義的體系，無論它對個人的創作力作了什麼程度的退讓。

這種體系可能維持下去，有三種基本理由。第一、是曾經一度公開聲稱他自己是「列寧最忠實的門徒，是列寧工作的繼承者」的斯大林的性質。斯大林是一個有不屈不撓意志力量而且非常堅毅的人物，而且我們有十足理由相信他繼續列寧的路線前進。第二、是目前蘇聯人民從沒有從私人資本主義中獲得過什麼利益，資本主義的利益向來是分配給很少數人的。和這一點相反，目前大多數人民在文化上和物質上是分沾着集體主義的利益的，雖然在建立這主義時，他們曾經受過很多困難和痛苦。最後，這種集體體系已經受了戰爭的最高試驗，全世界對它的力量都表示景仰。

現在就剩下最後一個問題了：集體主義的蘇聯和世界其餘各國將保持怎樣的關係呢？

各國之間政治，社會以及經濟上的歧異不一定引起相互間的衝突，這是一個歷史上的事實，也是值得接受的事實。說得露骨一點，祇有在一國決意要取得一些軍物而另一國有意要保有這些事物的場合，兩國才會發生鬥爭。取得很小代價而將阿拉斯加賣給美國商資本家，使美國人沒有相信他們想貪得（更不必說決心取得）一些屬於美國的東西的理由。至少在美國人不相信蘇聯人想摧毀美國文明或美國生活方式時，蘇聯不會有什麼考慮的。

希特勒機巧地煽動的歐洲對布爾維克主義的恐懼，也是鑒於同樣的信仰的。但如果我們現在認為蘇聯不再希望違背他們的意志強迫他國接受它的見解，如果我們認為它真正修改了它早期的觀點，那麼它當然和蘇聯未來關係相合，而西方世界也可能和平互利地相存。

從眼前以及實際的觀點上看來，蘇聯很清楚地在和美國和英國和平友愛相處的情況下，可能得到種種利益。蘇聯在戰爭中損失重大，而且面對着一個重大的復興工作。它的土地已經夠廣泛了，除了為自衛的基本理由外，它沒有要求擴大的理由，這種自衛的理由目前已不存在，以後亦必消滅無蹤。蘇聯雖然可能繼續努力以完成它集體主義的試驗，但是絕沒有引起戰爭的動機。從它這種試驗中，我們將可能如蘇聯人從美國私人企業的高等技術和工業方法上得到利益那樣地得到好處。在這個戰爭中我們更熟悉了蘇聯，但是蘇聯人民也學了一點東西——這就是說：一個民主的或個人主義的體系並沒有使它的人民軟化或損壞了他們爭取勝利時所需的個人勇氣和毅力。（文摘一二七期）

## 八、蘇聯資本主義化了嗎？

美國·史提芬斯

蘇聯正在轉向資本主義嗎？

論爭的根據是蘇聯播棄着社會主義恢復自由企業和價格制度，過去的馬克斯經濟學說正在被巴宋（Roger Barson）的經濟學代替了。

這種觀點常常最爲那些最急着想發現蘇聯政策基本改變的人們所引用，他們到處抓取材料用以證明他們這個得意之論。

辯論的內容常常如下面所寫的。

蘇聯沒有平等，只有廣大的工資懸殊。零工差不多已普遍全國。蘇聯人不但放棄貨幣制度，反而逐漸認識了它的重要。國家主義也着重地增長了，對於蘇聯歷史和傳統的興趣也復活了。

反宗教的宣傳已被停止。鞏固家庭的努力廢除了隨便的離婚，軍事訓練的加緊，表示等級的徽章肩章的恢復好像是沙王時代一樣，以及發制服給外交工作人員，這些都是蘇聯轉變的標幟。最後，但不是最少，第三國際的廢除。

#### 政策和表現

差不多人們可以無限制地舉出許多舊的因素回到俄國人的生活裏來的例子，特別是在戰時。這些便被無條件地當作可取的證據：蘇聯已拋棄了革命，資本主義正在恢復着。

這個論證的基本缺點是它把必要的與偶然的混淆起來了。沒有一個人可以否認自從戰爭開始以來，蘇聯的政策和表現都有很大的改變。在對德的全面戰爭中，蘇聯的政策會號召全國所有的力量。號召的基礎便是民族生存的普遍名義。

但是蘇聯的領袖只能應用這個廣泛的主張，因爲他們確信無論如何在戰爭以外，他們自己的國內

地位是鞏固的。從辯證意義看來，布爾什維克的領導，現在對於許多過去曾被放棄的「異己觀點」採取寬大的容忍。這個事實並不是說蘇聯制度包含弱點，而是說明它內部的穩定性。

那些自以為內行引證不平等工資，零工，和普遍的使用貨幣，算是表現社會主義已被資本主義代替了的人們，很容易就露出馬腳來了。

蘇聯從來沒有假定完全的平等。蘇聯憲法上所寫的口號不是「各盡所能，各取所需」而是「各盡所能，各取所值。」這個便是零工普遍的由來。

貨幣的確使用在蘇聯。但它的作用僅僅是作為一種交易的媒介，它的價值是被隨意地人為地決定了的，對於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意義。

與這些傾向資本主義的證據相反的，有着一個基本的事實，那就是戰爭不但沒有指出蘇維埃制度的不實用性，而恰恰有着相反的結果：社會主義工業和集體農業經過艱巨的試驗以後，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堅強而鞏固地建樹起來了。

#### 自治的增強

至於被引證得很多的蘇聯民族主義的普遍增強是怎麼樣的呢？蘇維埃政府的確鼓勵過俄國民族光榮與傳統的復興。但是並沒有恢復大俄羅斯的極端愛國主義，俄羅斯民族的優越以及統治弱小民族。而相反地——雖然這些方法的含義的目的戰後不會再出現——蘇聯十六個共和國已經正式被允許，在維持他們自己的武力和外交形式下，增加了他們的自治權。

同時，雖然俄國今天與西方列強聯盟，雖然第三國際已被正式解散，雖然宗教已留有立足之地，以及許多改變蘇聯生活的事實，但是蘇聯的國家哲學仍然是馬克斯列寧主義的，從來沒有一個教條被

修改或廢除。特別在近來，有一個可注意的趨勢，就是努力注意理論的重要。

共產黨出版的月刊「布爾什維克」上有一篇文章，埋怨研究與討論小組最近化費百分之八十的時間在一般的時事問題上，僅有不到百分之二十的時間化費在理論與黨史上。要求恢復適當的比例。

### 事實的邏輯

六月杪，蘇聯副外委員長維辛斯基，他是最有才能的一個，對於蘇維埃的性質發表了一串連續公開講演，這些演辭後來由真理報和別的俄國報紙完全登載出來了。

他那善於辭令的演講，內容與結論沒有一點比列寧「國家與革命」中正統的列寧主義者的觀念更好。這些恐怕不過是風裏面的草吧了。

然而人們不能因此假定蘇聯的表現，特別是對西方列強的態度是強硬的。史達林和他從前的先生列寧一樣，是一個理論與實踐統一的經驗主義者。他廣泛地用馬克思術語談話論事。但是他最喜歡用的一句心愛的話是，「事實的邏輯是所有邏輯中的最強者。」

就是這個「事實的邏輯」比世界革命的幻想還更重要地形成了蘇聯對西方列強的關係。真的，假若英美與這個最大的大陸國家處理得好，——世界未來的和平便依賴於此——互相的諒解必需基於事實而不是基於幻想或者希望的理想，雖然這些幻想或希望的理想在人們聽來是很動人的。（文匯周報三卷廿五六月期）（原載八月廿一日基督教箴言報）

## 九、蘇聯是否將轉變到自由企業制度

美國商  
業會長約翰斯頓

世界上最富集體色彩的俄國，是不是在改取新花樣，換上那自由企業的制度呢？

熱心盼望這種轉變的人士，都翹首企踵遙望着俄國。他們時常看見一些模糊的影子，似乎在擴大成明顯的跡象，覺得蘇俄的經濟生活好像在轉變成美國的模式。然而究竟有沒有確鑿的證據，足以證明蘇聯對於自由企業發生興趣呢？

我們以俄國官方賓客的資格，在蘇聯訪問了六個星期，在這時期之內，我們足跡所至，西自經過戰爭蹂躪的列寧格勒，東至粗野的西伯利亞，南達與阿富汗伊朗交界的地方。我們曾和各級的蘇聯官員談話，上自史大林，各省省長，下至各城市的市長以及各種工廠的管理及工人。任何地方都沒有絲毫的跡象表示他們願意放棄俄國共產主義的社會政治與經濟的原則，同時也絲毫沒有這種傾向。

一切生產事業的國有，爲蘇俄生活的基礎，自農具至水力發電廠，自理髮店至鋼鐵廠，自田地到都市的公寓都爲政府所有，所管理，所經營。美國生活恰好與之相反，一切的生產事業以私人所有，私人所管理，所經營爲基礎的。兩國的根本不同之點就在這裏，於是一切的情形也由此而不同了。

蘇聯絕對沒有跡象，甚至最微小的都沒有，表示它願意放棄這個生產事業國有的原則。

事實上，蘇聯的人民因爲戰爭的順利而對那種制度加強了擁護。不僅共黨份子如此，非共黨黨員也是如此。共產黨員約佔全國人口的百分之二。

有一個時期，大約在德國進攻俄國以前，或許有一部份人懷疑着這個制度的效率。如果曾有這種懷疑的話現在也給紅軍對德的勝利而打消了。

某次宴會，有一位高級的政府官吏，告訴我說：『我們蘇維埃現在由國際的共產主義轉變到國家的共產主義，即使世界上其餘的國家，都是資本主義的國家，我們仍將以共產主義的國家進行下去。如果我們人民能完全就業，提高生活水準，一方面發展國家，其他的國家就會追隨我們。這是不借武

力，而用實際的榜樣來作世界革命」。

但是爲什麼有人以爲蘇俄的經濟制度是在照我們的方式轉變呢？下面是他們所指出的若干發展。他們放棄了馬克思『各取所需』的原則而代之以『依照各人所作的供獻而分配』。

例如俄國的各種生產，差不多都是計件論酬的。用各種的方法鼓勵生產的增加。一個工人達到了分內的生產量之後，其額外的生產，用累進法計算他的酬報。如果超過了規定額的百分之十，即給予百分之十五的額外酬報，如果超過了百分之二十，則給以百分之三十三的酬報。

凡是大量超過規定的生產量，或採取新而有效的生產方法則更有鼓勵之法，如獎章獎狀等。這種榮譽同時還有金錢酬報上的實際優惠以及有較好的食糧券或戲院入場券等享受，甚至可以豁免賦稅。因此，在同一工廠內的工人，其所得酬報額之相差，較美國工廠內爲大。

我們就問：『這不是放棄馬克思均等分配的原則呢？第二步是不是會進展到更大的經濟自由呢？』他們答稱：『不是的，那個原則正是我們千年大計所欲達到的目標。但我們祇有用國有生產事業的制度去達到它』。

還有一個現象，人們常常說它也是有向資本主義發展的傾向。各個家庭都可以得到約五分之一英畝的土地去種植他們一部分的糧食。然而這個土地並不是人民私有的，收獲的一部必須繳納國家作爲土地與工具的租稅。

人民須在正規工作的餘閒，才可以去耕種這個土地。男女勞動者每日平均工作十一小時，每星期工作六天，而每隔一個星期日則爲軍隊服務，所以耕種這小小的一片土地其意義爲增加額外工作，額外生產與國家的額外稅收而已。也是另一種鼓勵工人生產的方法。

最後一點爲創設了所謂自由市場。這是一種公開的市場，人們可以出售他們剩餘的衣服或糧食。然而自由市場是禁止屯積的。買進的東西祇准本人的消費，而不能重復出售。違犯規則者有嚴厲的懲罰。甚至在這種最簡單的市場上也是沒有商人存在的。

德人佔領一份蘇聯領土的時候，他恢復私有土地工具，及生產與分配的制度。於是小商人也出現於各個鄉鎮。鼓勵農民自有田地。當俄國人收復失地之後，立刻把這種自由企業完全取消了。

他們告訴我，在那些解放區域，人們都自動放棄他們一切的私有權，恢復完全集體主義的蘇維埃制度是迅速而非澈底的。

年長而比較高級的共黨領袖，推行集體主義已有二十七年的歷史。他們認爲這個制度救了俄國的被德侵略。於是這些年長的領袖，就無意改變這種制度。工廠與農場的主持人，大都在三十餘歲的年齡，他們除此之外，不知道有別的制度可與之比較。此次戰事的順利使一切疑慮都消失了。

現在，不論用什麼方法來觀察，都不能發現俄國有私人企業發展的跡象。

(八月三日舊金山紀事報)

## 十、關於講授政治經濟學的幾個問題

戈賓權譯

——原文載一九四三年七八期合刊的『在馬克思主義旗幟下』

在過去這個學年中間，根據全蘇聯高等教育委員會的決定，在我們國家的高等學校裏而又重新開始了政治經濟學的講授。在目前的情況之下，在政治經濟學的講授的前面，正存在着一些嚴正的和重要的任務。我們的高等學校必須造就出一批在經濟的方面已有準備的專家，這些專家們既要能完成國



民經濟所有環節中爲了全力援助前綫的巨大工作，同樣地也要能做復興爲德國法西斯匪徒所破壞了的經濟的巨大工作。今天的學生——這就是明天的蘇維埃知識份子的幹部，他們要能在最大的破壞，和各種事件有着異常迅速的發展的時代行動，他們要能在處理各種政治與經濟問題的特別複雜的時代行動。在蘇聯人民反對希特勒德國的偉大愛國戰爭的各種條件下，特別重要的事情，就是要使得我們的幹部武裝着馬列主義的理論而出現，這個理論，用對於我們正義事業的勝利的明確的和不可動搖的信心，把我們武裝起來，用對於社會發展的法則的認識（其中也包括了對於戰爭的法則，進程及其趨向的深刻的認識），把我們武裝起來。

在研究馬列主義的理論時，政治經濟學是佔着一個非常重要的位置的。我們只要提起列甯的一個著名的指示就夠了，他曾經這樣說過，馬克思的理論在確定和應用兩方面最深刻，最徹底和最詳細的，這就是他的經濟學說。

在我們的高等學校裏面，政治經濟學的講授經過了幾年的間斷之後又重開始了。在這個間斷時期之前，政治經濟學的講授以及當時所用的教科書和提綱中，都有着許多嚴重的缺點。這些缺點，已在我們黨中央委員會的一個決定中及時地指出，而得出了這樣一個結論，就是大家在過去往往把政治經濟學從一個研究真正現實的活的經緯的一般的歷史的科學，變成爲一大堆反科學的抽象觀念與無生氣的公式的綜合。同時，政治經濟學的研究，應該在社會主義建設者的世界觀的形成上起一個突出的作用，它應該培養出我們大家對於蘇維埃祖國的摯愛和對於它的敵人的憎恨，但這種研究往往變成爲學生們的一個枯燥無味的義務了。

『蘇聯共產黨史』這部馬列主義理論的基本知識的百科全書的出版，武裝了所有科學工作者的隊

伍（其中也包括有經濟學者），給了他們一個重新改造整個工作的模範和榜樣。按照我們黨中央委員會的指令，現在正進行編著一本『政治經濟學簡明教程』。在這個工作的過程中，黨中央提出了許多關於政治經濟學最基本的最重要的和原則上的決定與指示。

#### 一 政治經濟學的對象是什麼？

政治經濟學的講授，在過去有着許多缺點。首先它所犯的第一個錯誤，就是政治經濟學的教師們，往往不能給聽講的人一個明顯、完整而確切的政治經濟學的對象的定義。他們甚至時常也沒有在自己的面前提出這樣的一個任務，就是給政治經濟學下一個足以包括它所研究的對象的各方面的定義。因此，爲了解決這個任務，我們就得將馬列主義經典作家們的許多意見正確地加以一個總結和再使它們通俗化。

馬克思主義的創始者在奠定科學的新途徑時，他們所指出的政治經濟學對象的特徵，是按照他們在一定的內容內接近這個問題時的情況，從這一方面或是另一方面而指定出來的。

在『資本論』第三卷的序言中，恩格斯曾警告讀者們要避免這樣的一個誤解，『好像馬克斯在實際上要加以發揮的地方，就是馬克思要下定義的地方』。恩格斯在這一點上指出道：『實際上，當事物及其相互關係不被視爲是固定的，而被視爲是存在於變動的過程中時，那麼在這個過程中，它們在人腦中的反映，概念，也同樣受到變動和轉形的……』

正因為政治經濟學的對象的這些定義須受到『變化和轉形』，我們在馬克思主義創始者的許多著作中，就可以看到那些尖銳的觀點用論辯的形式來反對那些過時的，陳舊的和錯誤的觀點的情形。

舉如馬克思曾經這樣指出，說政治經濟學的出發點，就是『個人們之社會地規定了的生產』（見

『政治經濟學批評』導論，一九三五年俄文版第九頁）。

大家都知道，生產是有兩方面的——技術方面的和社會方面的。政治經濟學和許多研究生產過程技術方面的自然與技術科學之不同的地方，就在於它所研究的，是生產的社會方面，是生產的社會機構。換句話說，它所研究的，是生產部門中那些在人與人之間所建立起來的各種社會關係。

在這一方面列甯又指出過：『政治經濟學所研究的全然不是「生產」，而是人對於生產的社會關係，而是生產的社會機構』（見『列甯全集』俄文本第三卷第三十六頁）。

生產的社會機構，既包括有生產本身，同樣地也包括有分配，交換（在交換所存在的那些社會裏）和消費（按它的社會作用來講）。用馬克思的話來說，生產，交換，分配和消費，它們本身是『構成一個整體的各個成份，是統一之中的差別』（見『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論，俄文本第二十三頁）。在這各種要素之間，生產是佔有首要的位置。這是由於這樣一個簡單的情況而產生出來的，就是所分配，所交換和所消費的，只能是那所預先生產出來的東西。正因為生產的社會法則，自身決定了其他過程的特質，某一種一定形式的生產，就限制了某些一定的形式的消費、分配和交換。

大家都知道恩格斯所下的一個政治經濟學的定義：

『政治經濟學，在廣義上講起來，是一種研究支配着人類社會物質生活品之生產與交換的法則的科學』（見『反杜林論』，一九三八年俄文版第一五一頁）。

可是在下這一個定義時，恩格斯同時還又指出，生產就是沒有交換也可以進行的。在另一處地方，他又給政治經濟學下了這樣一個定義，說它是『一種研究各不同人類社會的生產、交換，以及與生產，交換相應的生產品的分配之條件與形式的科學』（見同書第一五五頁）。

有一個曾經得到列寧贊同的政治經濟學的定義則是這樣說的：政治經濟學是『研究在發展中的生產與分配的社會關係』的科學（見『列寧全集』俄文本第二卷第三九三頁）。在這一點上列寧又指出過，說政治經濟學本身是種研究『在歷史上發展起來的各種社會生產結構的科學』，它提供出『關於社會經濟各種不同的制度和每一種制度的基本特點的主要概念』（見同書第三九三，三九四頁）。

在過去講授政治經濟學的實際中，常有這樣的情形，就是大家從一般的論述中，抓住馬列主義經典作家們關於政治經濟學對象的這一點或是另一點個別的意見，而企圖把這一點意見加以不正確的解釋。因此，給政治經濟學的對象下這樣一個定義，其中既要總結馬列主義經典作家關於這個問題的所有最重要的意見，而同時還要免除掉誤解或曲解，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這樣的一個定義應該是這樣的：

『政治經濟學是研究人類社會生產的關係，也就是經濟的關係之發展的科學。它要解釋出在人類社會中各個不同的發展階段上，那些支配着必要消費品（無論是個人或是生產的消費用的）的生產與分配的法則』。

## 二 關於原始公社制度的問題

政治經濟學的講授在過去曾經犯了這樣一個錯誤，就是在關於原始公社制度的論述中容許了一些錯誤的見解。這些錯誤可以歸納為下列兩點：第一點，是違背了歷史唯物論的原則，按照歷史唯物論的原則說：生產關係的一定形式，是由生產力的特質所決定的；第二點，就是容許了將原始公社制度理想化了的見解，很明顯地，這種理想化是違反歷史的現實的。

原始公社制度之發展的這種錯誤解釋的根源，就是恩格斯在『家庭、私有財產與國家之起源』一

書序文中的一個著名的意見；這個意見說，在文明之前的時期中，社會制度既由物質生活品的生產條件所決定，同時又由人本身的生產的條件，這就是說由家族的形式來決定的。而實際上，歷史唯物論的基本法則，認為人的生產關係是由人們在社會發展的某一特定階段所支配的各種生產力的特質來決定的。歷史告訴我們，這個法則不僅在原始時期發生作用，就是在社會發展的此後所有各階段上，也同樣完全地和不可分地發生着作用。

上面所舉出的恩格斯的這個錯誤的意見，和馬克思以及恩格斯本人許多非常明顯的指示是相矛盾的，這些指示說：生產關係的基礎，只是生產力的發展。並且這個錯誤的意見，絲毫都沒有爲恩格斯在這本著作中所包含的關於原始社會發展的具體分析所加以證實過。

因此，我們就沒有任何理由放棄馬克思和恩格斯兩人所提出的史的一元論的觀點，即使是在原始公社制度的問題上，拿二元論的觀點來代替一元論的觀點。

在好幾千年來的過程中，由於勞動工具的極度的不發達，由於獲得生活必需品的極端原始的方法，就限制了人們的一般的，集體的勞動。只有人們在一起才能和大自然鬥爭，只有用共同的勞動的方法，他們才能夠保障自己的生存。人在生產部門中的社會集體的勞動，就產生出原始社會對於土地及其他生產工具，以及對於生產品的社會的集體的所有制。原始的人在一起勞動，他們共同地擁有生產工具和他們自己的勞動的生產品，他們一齊消費他們所能得到的一切東西。

在人的支配之下的生產力的發展，限制了原始社會生產關係之發展的整個行程。向氏族社會的轉變，父權血統制代替了母權制，氏族制度的分化，私有財產和交換的出現，以及社會劃分爲各種階級——所有這一切過程，都完全可以從原始社會生產力發展的過程，以及獲得生活必需品的方法的改進

中來得到解釋。

在講授政治經濟學時的另一種錯誤，就是在研究原始公社制度時，將這個制度加以理想化和粉飾了——這個錯誤就使得學生們破壞了對於人類社會發展的進步的性質的觀念。從原始社會轉變為階級社會，被視為不是社會進步路途上的一個必要的階段，而被視為是陷人罪惡和被放逐出天堂樂園了。因此，對於共產主義就產生了一種不正確的觀念，以為共產主義就是要回返到人們在原始時期所生活過的那一種社會制度裏去。很明顯的這種類似的觀念是違反了馬列主義學說的基礎和整個精神的。

馬列主義的經典作家粉碎了資產階級關於私有財產、階級、剝削制度的永久性的傳說，我們用科學的方法證明出，在好幾千年的過程中，人們是過着原始公社制度的生活，而不知道所有這一切文明的『幸福』的。但同時馬列主義的經典作家，又教大家看出原始公社制度的歷史限制性，是和生產力發展的極度低下的水準，勞動工具的原始狀態和人民生活的極度的貧困相應合的。在社會發展的某一個固定的階段時，原始公社制度就成了更進一步發展的運動和社會進步的障礙。它必須讓位於新的生產方法，因為這種新的生產方法提供生產力的發展以更大的餘地，而它本身就被排棄了。

列甯曾經指出過，在我們已往的日子裏從來未曾有過什麼黃金時代，而原始時代的人是特別遭受到窮困和為生存而鬥爭的艱難的壓迫的。馬克思又指出過，在原始社會裏，集體的生產形式，是『個人力量的薄弱的結果，而不是生產工具社會化了的結果』（見『馬恩全集』俄文本第二十七卷第六八一頁）。大家同樣也知道，在這種社會裏，個人的存在是全為社會——羣、氏族——所吞沒了的。生產工具是那樣的不完備，生產力是那樣的低，因此只有在集體的勞動之下，人們才能夠維持自己的生存。工作者及其生產工具的一致性，照馬克思的說法，在此地，在這種『幼稚的形式』中是存在着，

這種形式是不能用於『發展作爲社會的勞動和社會勞動的生產力的』（見『剩餘價值論』俄文本第三卷第三〇八頁）勞動既然提供了這樣貧乏的成果，因此就有了平均消費的必要性；假如誰從公共的產品中稍微多取了一分，那麼這種產品就不能滿足原始公社中其他成員的饑餓，而這些人結果就只有死亡了。

所有這一切都證明出，就是原始公社制度，不是建立在進步的生產工具的社會化的基礎上，而是建立在公社公有制的基礎之上，這種公有制是由於勞動工具的幼稚和不發達所產生的，是由個人力量的特別薄弱所產生的，一個人只有和集體保持着緊密的不可分割的關係，才是他免於死亡的唯一方法。因此，原始公社制度和現代的社會主義及共產主義，是有着天壤之別的，因爲後者是建立在高度發展的生產工具的社會化的基礎之上的，這些工具保證了社會能有駕馭大自然的巨大力量，並保證了個人在同志的集體制的條件下能有着完全的發展繁榮。

### 三 關於研究資本主義的問題

政治經濟的講授在過去犯了這樣一個錯誤，這就是歷史原則的問題，當大家在研究原始公社制度，奴隸制度和封建制度的時候，這個原則還或多或少地被遵守着，等到進而研究資本主義時，這個原則就被粗魯地破壞了。在提綱和教科書中專講資本主義的這一篇，都好像是根據馬克思的『資本論』的結構而造成的一個簡單的雛型。在此地大家忽略了一點，就是馬克思寫作『資本論』時，並不是把它當爲一本教課用的課程，也不是當作着手研究政治經濟學的人們的一本參考書，而是當爲在科學中奠定新途徑時的一種巨大的研究著作而寫成的。從此我們就可以很清楚地知道，在研究這種科學的基礎時，機械地抄襲馬克思的『資本論』的結構，可能帶來的就只是害處。

在講授政治經濟學時遵守歷史的原則，就必須要使每個學生不僅僅對於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基  
本特點有一個明確的觀念，同樣地，對於這個制度的準備也要有一個明確的觀念。遵守歷史的原則，  
自然地，就必需首先研究表現出資本主義準備時期的各種歷史過程，只有在這種研究之後才能進而研  
究這個制度的基本特點。

在「資本論」關於合作的一章中，馬克思指出：「很多數目的工人聚集在同一個場所的共同勞動  
……爲了生產同一種類的商品，並且是在同一個資本家領導之下，無論從歷史上和從邏輯上講起來，  
這種共同勞動就形成了資本主義生產的出發點。」

從馬克思的這些話就可以得到一個結論，就是，從歷史上和從邏輯上看起來，資本主義生產的出  
發點就是企業，這種企業是屬於資本家的，並且就在這種企業中用了僱傭的工人。在歷史的現實中，  
這種企業最初是以資本主義的製造業的形式發生的（大家都知道，在這之前存在的是簡單的合作，繼  
而它就爲分工所代替了）。因此，我們應該要這樣來了解馬克思的指示，就是無論從歷史上和從邏輯  
上來講，正是資本主義的製造業，才是資本主義生產的出發點。

在資本主義發生的歷史中，是有着一個整個的時期的，在這個時期中，資本主義的企業以製造業  
的形式而存在着，大家都知道，馬克思說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最初的萌芽，可追溯到十四世紀：這就是  
中世紀意大利城市與共和國之中的最初的資本主義的製造業。十六世紀時，在當時歐洲各比較發達的  
國家和區域中，資本主義的製造業的數目已達到幾百和幾千之多。而從製造業轉變爲工廠，則只有在  
英國的產業革命的時候，這就是說，在十八世紀末和十九世紀初的時候。

因此，在資本主義機器工業的統治時期之前，是存在着整個的歷史時期的，馬克思稱它是資本主



義的製造業的時期。自然地，對於資本主義製造業時期的研究，應該先於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基本特點的研究。

更進而講，在研究資本主義的基本特點之前，應該先認識在歷史中形成爲資本主義發生的所有條件的那些過程。此地所講的，就是創造資本主義的歷史前提的問題：它一方面是僱傭勞動工人階段的發生，另一方面就是大資本的發生，這也就是資本的原始積蓄。

大家都知道，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是從商品的分析而開始它的敘述的。商品的分析，對於他是揭發剩餘價值的秘密的一個必要的階段，而剩餘價值是和將勞動力轉變爲商品密切地相聯繫着的。爲了揭發出這種獨特的商品——勞動力——的特點，馬克思就首先一般地從商品生產的基礎來分析起。

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所採用的這種敘述問題的程序，自然是從他要在科學中奠定的途徑，和重新改造政治經濟的科學作爲自己的目的這兩點發出的。但很明顯地，就是在研究這個科學的基礎時，特別是在學習它的基礎教程時，絕不能保持着這種同樣不變的秩序；這將會是種有害的拘泥，並且是違反將政治經濟學作爲一般的歷史的科學來講授的必要性的。

商品生產，交換和貨幣，是先於資本主義生產的發生的。商品生產的萌芽，在資本主義時代開始之前的好幾千年前就發生了。在中世紀末時，商品的生產和貨幣的流通，已經達到比較高度的發展。可是商品生產只有在資本主義制度之下，才成爲生產的統治形式，獲得一般的性質。

因此我們就應該知道，在講授政治經濟學時，爲了要遵守歷史的原則，不僅僅在專講資本主義的這一篇中，就是在教程的以前各篇中，就得講到像商品、貨幣這些範疇。在專講奴隸制度的這一篇

中，就已經要講到關於商品生產的發生，關於交換的發展與貨幣的發生的歷史階段，在進而專講封建制度的一篇中，在研究封建制度的分化與破產時，就已經必需指出單純的商品生產更加發展的特徵，指出商品的特徵，商品的使用價值和價值，以及社會地所必需的勞動時間。關於商品的完全的分析，特別是指出包含在商品中的勞動的兩重性的特質，是在關於資本主義生產的基本特點的一篇文章中講的。

列寧在評論A·波格唐諾夫的「經濟科學簡明教程」時，曾用贊同的態度批評了作者所採用的指出「經濟發展各相續時期的特徵的形式」的敘述方法。列寧這樣寫道：

「正應該要這樣來敘述政治經濟學。也許有人會反對，說用這種方法，作者就不可避免地要將同一個理論的部份（例如論貨幣）在各不同的時期中間分裂開來而加以敘述，並且會流於重復的情形。但是這種純粹的形式上的缺點，是可以由歷史敘述的許多基本的優點來加以補救。這難道是缺點嗎？至於所重覆的，只是那些不十分多的而是對於初學者有益的地方，因為初學者更想精確地通曉那些特別重要的原則。舉如按照經濟發展的各個不同的時期來講貨幣的不同的功能，一個初學者就能一目瞭然地，知道這些功能的理論的分析，並不是建立在抽象的推想之上，而是建立在人類歷史發展中所真實發生的事情的精確的研究之上的。而關於社會經濟的個別的，在歷史的一定的條件之下所產生的結構的印象，也就更為完整了」（見「列寧全集」俄文本第二卷第三九四頁）。

當把政治經濟學作為一般的歷史科學而加以研究時，我們必需把列寧的這個最重要的指示，作為研究的指南。

在目前的情況之下，在蘇聯人民反對德國法西斯侵略者的偉大愛國戰爭的條件之下，專研究資本主義的獨佔階段——帝國主義的許多論點，獲得了特別的意義。在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八年的世界大戰時，列寧就指出過，不弄清基本的問題，不弄清帝國主義的經濟本質的問題，就不能正確地決定這次戰爭的性質。爲了對於蘇聯及其同盟者反對希特勒德國的這次戰爭的正義的與解放的性質，能有一個完全的和深刻的瞭解，最重要的，就是一般地要武裝有列寧和斯大林關於帝國主義的理論，特別是列寧和斯大林對於德國帝國主義的掠奪的獸性的本質的分析。

在講授政治經濟學的過程中，必須指出資本主義獨佔階段的特點，列舉出它的基本的徵象的特質，和指出它作爲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的前夜的歷史地位。此外還應該拿相當的注意力，來研究列寧所發現的和由斯大林所發展的關於在帝國主義時期資本主義的經濟與政治發展的不平衡的法則，以及根據這個法則所得出的社會主義能在一國得到勝利的可能的理論。應該向學生們指出列寧和斯大林關於帝國主義的理論的重大的理論上與實踐上意義，這是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所作的關於資本主義的基礎的分析之直接繼續的發展。

列寧指出帝國主義的特徵，說帝國主義是獨佔的，腐朽的或者寄生的，和垂死的資本主義。在此地應該注意的，就是資本主義的腐朽性，其中是指技術停滯的傾向，是指獨佔者遲延技術的進步而言的，但因此決不能忘記列寧所指出的這一點，就是資本主義在整個上講起來，比以前的時期發展得和生長得更快。同樣地我們也應該注意列寧的這樣一個指示，就是帝國主義是垂死的資本主義，但不是死了的資本主義。

列寧指出過，獨佔經濟統治，是和在政治方面趨於反動的傾向相聯繫着的。在目前的條件之下，

反動的力量在希特勒德國已找到它極度的體現。在人類的歷史上，還從未見過這樣野蠻的狂暴、反動、和對於人類的憎恨，能像強盜式的希特勒的帝國主義的。

列甯時常着重地指出這一點，就是對於無產階級的革命者，在民主的問題上是和任何的無政府主義者有着根本不同的。他這樣寫道：

「從兩種意義上講，社會主義是不可能沒有民主的；一、如無產階級不準備爲了民主而鬥爭，那麼它就不能完成社會主義的革命；二、……不實現完全的民主，勝利了的社會主義就不能保持它的勝利」（見「列甯全集」俄文本第十九卷第二三三——二三四頁）。

因此，工人階級和現代社會的一切進步的階層應該知道，在資產階級民主國家的國家制度和法西斯國家的國家制度之間的差異，是不能沒有分別的。希特勒的制度，它本身就是最黑暗的反動，野蠻和食人的生番行爲的體現。希特勒的冒險家們是德國財閥政治的一批加着鎖鍊的狼犬，——這是德國的貴族地主、財政家、銀行家，獨佔家和實業家們的一批貪慾渴血和強盜式的僱傭兵。我們必須記得斯大林同志的話，就是希特勒匪徒是社會主義的死敵，是剝奪了歐洲各佔領區的工人階級與各族人民的基本民主自由的最惡毒的反動份子和黑幫份子。

「希特勒的匪徒爲了要掩蓋他們自己的反動黑幫的本質，他們就咒罵英美美的國內制度是財閥制度。但是英國和美國，却有着基本的民主自由，却存在着工人和職員的職工會，存在着工人的政黨，存在着國會，而在德國，在希特勒制度的統治下，所有這些組織都被消滅了。我們只要把這兩類的事實拿來對照一下，就可以瞭解希特勒制度的反動的本質以及德國法西斯們對於英美財閥制度的謾罵的全部虛偽性」（見斯大林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六日在十月革命二十四週年紀念會上

的報告)。

#### 四 關於社會主義制度的問題

在講授政治經濟學時，最重要的一篇，自然地，就是專研究社會主義制度的部分。爲了遵守歷史的原則起見，這一篇也應該分成兩個部分，其中有一部分是討論社會主義生產方式的準備時期的，而第二部分則是專講這種生產方式的基本特點的。第一部分包括了從資本主義轉變爲社會主義，也就是轉變爲共產主義的第一階段的過渡時期，在此地，要列舉出蘇維埃政權所實現的，和蘇聯進行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第一階段——建設時的各種偉大的經濟特徵。第二部分就專講社會主義的國民經濟制度的特徵，它的各重要方面及其特點。

正像在蘇聯憲法中所規定出的一樣，蘇聯的經濟基礎，是社會主義的經濟制度和生產工具與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的所有制，這種經濟制度和公有制，是由於剷除了資本主義的經濟制度，廢除了生產工具及生產資料的私有制和消滅了人剝削人的現象的結果而奠定的。社會主義和以前的所有各種生產方式比較起來，它是社會發展的一個更高的階段；它比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是擁有各種具有決定意義的優點的。

蘇維埃制度在平時的經濟建設條件下的各種優點，已使得我們的祖國能在很短促的歷史時期之間，消滅了成百年來的經濟與技術上的落後，保證了我們經濟發展的速度，比各主要的資本主義國家的發展的速度要快到十多倍，更進而社會主義這些比資本主義更好的優點，在勞動大眾生活的物質幸福和文化水準的不斷的高漲上，也特別明顯地表示出來。

在蘇聯人民反對德國法西斯侵略者的偉大愛國戰爭的條件之下，蘇維埃制度的優點，使得我們的

祖國能在兇暴的敵人的急襲之前站得住腳，能推翻了敵人的一切打算，能給敵人以龐大的力量的打擊，和抱着信心去完全粉碎希特勒的作戰機構。蘇聯的社會主義經濟，帶着無限的光榮受得住戰爭的一切攷驗；在我們國家的社會主義生產方式基礎之上所生長的蘇維埃社會不可摧毀的精神上與政治上的團結性，已使得希特勒匪徒想分化我們工人和農民以及引起我們各民族之間發生仇恨和鬥爭的一切冒險的希望都歸於破產。蘇維埃制度在它所遭遇到的偉大的試驗的年代中已拯救了我們的祖國。

在研究社會主義的生產方式時——無論是研究它的準備時期的過程，還是研究它的基本特點——首先必須弄清社會主義經濟法則的特質。瞭解社會主義經濟法則的特質的鎖鑰，這就是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的豐富經驗，而這種豐富的經驗，已在列甯和斯大林的著作中，已在黨的各项決議中，得到一個總結和理論上的通俗化了。

大家都知道，各種派別的社會主義的敵人——資產階級的經濟學家和危害者，來自法西斯主義間諜機關的托派布哈林派陣營的資本主義的復興運動者——他們企圖在社會主義經濟裏散佈各種資本主義經濟的法則。在他們這些有害的、反革命的目的中，他們用毀謗的口吻歪曲在我們國家中所建立起來的社會主義關係的特質，偽造這些關係，並且把它們染上資本主義關係的顏色。

我們只要指他們說我們社會主義的企業、商業、貨幣、銀行等等，都好像是具有「國家資本主義」性質的一些醜惡的理論就夠了。各種派別的資產階級的資本主義復興運動者，他們散佈了不相信社會主義勝利的毒藥，他們傳播一種可憐的思想，說從前統治着那些資本主義經濟的不變法則，在蘇維埃政權之下依然繼續發生作用，任何一種破壞這些法則的企圖，只會引起經濟上的動搖，這種敵視的看法，已遭到我們在斯大林同志領導下的黨的迎頭痛擊，並且也被社會主義建設的豐富實踐，社會主

義的最偉大和具有全世界歷史意義的勝利所粉碎了。

關於社會主義的經濟法則的特質的問題，在政治經濟學的講授中，在提綱和教科參考用書中，存在着許多本質上的錯誤和缺點。其中常有一種完全是皮表的因而也是不正確的觀念，認為只要一剷除了資本主義，凡是它所固有的一切法則就都消滅了；並且認為在社會主義的國民經濟制度中，是沒有任何經濟法則的，也不可能有任何經濟法則的。在學習政治經濟學的教程時，關於社會主義生產方式的問題，往往是用與教程的各篇相配合的所謂參觀的方法來講解的，可是這些「參觀」又組織得非常皮表和幼稚。結果，一切都得出這樣一個論證，就是在資本主義的時候還存在着某種的原理，某種的法則，某種的範疇，而在蘇維埃的經濟制度之下，一切都缺如了，一切都相反了，舉如在講完關於價值法則的一章之後所舉行的「參觀」，就證明出在蘇維埃的條件之下，這條法則是不能應用的。像這樣一類「參觀」，在講到每一種資本主義的法則之後都舉行一次，結果就使得學生會學着一個確信，在社會主義之下，一般地講，任何經濟法則都是沒有發生作用的餘地的。

這種非常錯誤的看法，在本質上，就斷絕了瞭解蘇維埃國民經濟制度的真實關係的可能性，因為沒有法則的地方，沒有合法的發展的地方，那兒就無科學之可言的。在這種認是社會主義制度之下經濟法則沒有發生作用的餘地的觀念的基礎之上，就存在一個完全是一種反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好像能稱為經濟法則的，只是那些人的意志與意識之外出現的法則，只是那些帶有自然的合法性的性質的法則，正像馬克思在某處地方所說，這些法則在發生作用時，就好像一所房屋，不知什麼時候會崩塌了打到某人的頭上去似的。對於經濟法則的特徵這種看法，當講的是資本主義的法則時，這完全是適當的；但當講的是一般的經濟法則時，那就不適當了。此外還有一種類似的看法，這就是所謂政治經濟

研究的對象的限制性的問題，照這種說法，經濟科學所研究的，只是資本主義的制度。

實際上，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真理，就是任何一種生產方法，假如其中沒有這一些或是另一些經濟法則在發生作用，則它是不能存在和發展下去的。否定了在社會主義制度之下的經濟法則的實際存在——這就會滾到俗流的意志中心說的坑裏去，結果就會拿任意，偶然性和混亂，來代替了生產的合法則的發展過程。自然的，這樣一種研究事物的態度，就失掉了根據這一種或是另一種路線，根據這一種或是另一種政策的正確性的任何標準，就失掉了對於我們社會發展中的這一些或是另一些現象的合法則性的瞭解。

實際上，馬克思主義的最基本的真理就是說，不管社會的形式是怎麼樣，它總是按着根據於客觀必要性的各種一定的法則在發展着的。這種客觀必要性，在各種不同的社會形式中，是以各種不同的樣式出現的。在資本主義之下，這種客觀的必要性，是作為一種自然的經濟法則而發生作用，它是經過了無數的偏向，經過了各種災變和激變的道路，經過生產力破壞的路程而表現出來的。在社會主義生產方式的條件之下，這種客觀的必要性，是完全按照另一種形式在發生作用的。它是作為由這個社會存在的外在與內在情況及這個社會的發展的一切歷史前提所限制着的經濟法則而發生作用的，但是這種客觀的必要性，是由於人的自覺，是經過了蘇維埃國家的人們（指社會主義社會的建設者，指指揮和領導這個社會的力量），和由勞動大眾的整個行動所領導的共產黨的意識與意志而產生出的。

因此，社會主義的經濟法則，是從社會主義社會物質生活的各種現實的條件中所產生出來的，是從它的發展內在與外在的情況所產生出來的。但是這些法則的存在，並不是自然的，自流的，而是自覺的，由蘇維埃國家在社會主義建設中實踐中自覺地應用和利用的。



社會主義的社會爲自己提出這樣的任務，就是要自動地改變那些從過去所繼承過來的一切條件，它並不將永遠保存這些條件的工作引以爲自己的責任，相反的，它是要去改變它們，並且時時刻刻地根本地，要使它們能和社會主義建設和進一步發展至共產主義更高階段的基本任務相應合。社會主義的經濟法則是靠了社會主義社會建設者的有組織的行動而實現出來的，這些行動先向着某些一定的，預先定好了的目的進行，而達到預先指定出的結果的。在此地，就存在着社會主義的經濟法則與資本主義的經濟法則的根本不同的地方。

講到社會主義的社會，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這樣寫道：

「在這以前環繞着人，統治着人的各種生活條件，現在是處在人的支配和統制之下了，人從這才開始成爲大自然的真實的和自覺的指揮者，因爲他們已成了自己的社會關係的主人翁。他們自己的社會行動的法則，在此以前都是和他們相對立的，而被視爲是一些外來的統治着他們的自然法則，這些社會行動的法則現在已完全爲他們自覺地來應用，因此也就處於他們的統制之下了。在這以前社會生活對於人們，好像是種超越自然與歷史之上的稟賦，而現在成爲他們自己的自由的事情了。統制着歷史的各種客觀的外來的力量，現在是在人的統制之下了。只有從這時候起，人才完全自覺地自己來創造自己的歷史，只有這時候他們所進行的社會因素，才達到他們所願望的顯著的和日益增長的階段。這就將是人類從必然的王國進於自由的王國的飛躍」（見「反杜林論」俄文本第二九六——二九七頁）。

#### 五 關於社會主義的經濟法則的問題

關於社會主義經濟法則的特質的問題，自然，是和關於蘇維埃國家的經濟作用的問題相聯繫着

的。我們的國家，在整個的社會生活裏都起着作用，而在經濟生活中所起的，則是種和其他任何國家在本質上不同的作用。某些皮表的觀察家，舉如很多的外國新聞記者和經濟學家，他們企圖把這一切不同只歸之於量的差別，歸之於蘇維埃國家比其他的現代國家，「更多地干涉了」經濟生活。可是，事實並不完全是這樣，問題應該在於根本上的質的差別，應該在於社會主義制度之下的國家；和以前所有的生產方式比較起來，有着原則上的不同的作用。

大家都知道，在資本主義的條件之下，國家往往很嚴厲地干涉了經濟生活。假如講到歷史，那麼我們只要舉出在原始積蓄過程中的國家政權的作用就足夠了，講到這樣一個時期的國家的措施，馬克思曾寫道，暴力是當舊社會懷孕了一個新的社會時的產婆。假如講現代的情形，那我們只要舉出所有交戰國家將經濟完全服從於進行戰爭的各種措施就夠了。

因此，假如我們否定在資本主義制度之下，國家在經濟生活中可能起着和真正起着很重要的作用這一事實，那就未免可笑而不合理了。但這個作用是受許多範圍的限制的，這因為整個的經濟是私有財產制的，整個經濟是建立在資本家對於生產工具私有的基礎之上的。國家可能並且真正地干涉它們的行動，這種干涉時常會採取很嚴厲的性質，並且是爲了某些私有主的集團的利益和損害其他的集團而實現出來的，這種干涉的性質是這樣的，就是私有財產制統治的整個基礎，依然在發生完全的作用。

在社會主義的條件之下，國家的經濟作用，意義和機能，在原則上是具有另一種特質。生產工具是在全社會的手裏，是社會主義的財產，而大多數的生產工具都是全人民的財產，這就是說，是屬於蘇維埃國家的。正因為這樣，社會主義國家所完成的許多這樣的機能和任務，在其本質上是與任何其

他的國家不同的。

蘇維埃國家是一個偉大的經濟力量。它執行着龐大的包括了社會發展各方面的經濟與組織的工作。國民經濟的有計劃的執行，對於勞動標準和消費標準的全民監察和統制制度的實現，保證國防的經濟需要，保護社會的財產——這一切所列舉出的主要的功能，就使得我們得到一個在社會主義國民經濟制度之下的蘇維埃國家所執行的工作範圍和意義的觀念了。

這種工作，無論在平時建設的條件下，以及在戰時的條件下，都是同樣龐大的。像這樣一類的龐大工作，在東方重新建立工業的根基，將好幾百個企業疏散到東部各區去，在當地創立數目很大的新的企業，保證它們有原料的根據地，勞動力和幹部，——所有這一切在生產工具私有制的條件下，是完全不能實現的。只有蘇維埃制度的優點，才有可能成功地解決這樣規模和這樣意義的任務。蘇維埃制度——是一個最進步，最前進的制度。研究社會主義的政治經濟學，就應該加強學生們心中的蘇維埃的愛國主義的感情，對於蘇維埃祖國的無透的摯愛，和準備拿自己的血甚至是自己的生命來保衛它。

講授整個的社會主義的政治經濟學時，無論是在講社會主義方式的準備時期的一小部份中，還是在專講社會主義的基本特點的一小部份中，都應該貫穿着對於社會主義經濟法則的真實的本質和特質的瞭解。

在研究社會主義制度的準備時期時，就應該注意保證社會主義在蘇聯勝利的兩個龐大的改造工作——全國工業化和農業集體化——這是我們社會的社會主義發展的法則。自從蘇維埃政權在我們國家

中勝利之後，在蘇聯的人民之前就出現了一個任務，這個任務要將蘇聯從一個農業國家的軌道上，從發展得很薄弱的工業，從技術的薄弱的基礎，轉移到一個在技術及經濟兩方面有着高度發展的工業國家的軌道上去。這個問題出現在蘇聯的人民之前，並不是一個能隨便作這樣決定或是另機決定的問題，而是一個只能有一種決定的問題：就是應該實現，並且要用飛快的速度實現蘇聯社會主義的工業化的計劃。

不實現全國工業化的計劃，社會主義就不能在蘇聯勝利，結果我們的國家就不得不喪失了自己的國家的獨立性，而成爲異族侵略者的犧牲品。我們反對希特勒德國的這次戰爭的進程，已很明顯地表現出，假如我們沒有實現斯大林的社會主義工業化的計劃，保證了高度發展的工業基地，能供應我們的軍隊以目前戰爭條件所需要的大規模的現代戰爭的技術的話，那我們的國家在全身武裝的敵人之前就站不住腳的。

因此，社會主義的工業化，就是我們社會的社會主義發展的法則。這種經濟上的必要性，是爲我們的黨，工人階級及時地瞭解到，而爲蘇維埃國家所採納的。它是建立在我們黨和蘇維埃政權在社會主義建設部門中的總路線的基礎之上的。

關於農業集體化的問題，也正是同樣的情形。斯大林同志指出過，我們絕不能將蘇維埃政權在一個長久的時期中都建立在兩種不同的基礎上；一方面是建在大規模的機器工業的基礎上，而另一方面則是建立在小的分散的農民經濟的基礎上。我們應該來一個龐大的革命的轉變——把千百萬的農民，轉移到大規模的集體農場經濟的軌道上去，而這種經濟是以農業中的社會公有制，集體勞動和廣泛地運用科學與技術爲基礎的。

集體化制度之勝利和作爲階級的富農制之消滅，是以農業中的社會主義在我們農村中的勝利，並消滅了產生出人剝削人的現象的一切原因。在這次愛國戰爭的條件之下，集體農業制度的許多最大的優點，已保證了我們在極大困難的條件下，特別是當敵人暫時地佔據了我們國家的某些主要的農業地區時，解決了糧食的問題。

因此，農業集體化的制度，就是我們社會的社會主義發展的法則。

同樣地，當我們在研究社會主義制度的準備時，我們所研究的那些經濟法則也是這樣的情形。這都是社會主義的經濟法則；它們在性質、內容和發生作用的方式各方面，和資本主義的經濟法則是有着根本上的不同的，當我們研究社會主義生產方式的基本特質時，我們所碰到的那許多經濟法則，也是具有着同樣的性質。

大家都知道，社會主義的社會除掉有計劃的實行國民經濟之外，是不可能發展的；社會主義和計劃是不能分離的，而在我們經濟的發展的基礎之上的，就是計劃。社會主義如無計劃，那就不可思議了。經濟的有計劃的實行，這對於社會主義社會是一個絕對的經濟上的必要性。

在資本主義之下，國民經濟有計劃的實行是不可能實現的，這因爲資本主義是建立在生產工具的私有制的基礎之上。私有財產制創造出競爭。它將全國的經濟機構裂成和分散成許多個別的部分，這些個別的部分，一方面是在於密切的經濟互助性的情形之下，而另一方面則造成了各個單獨的和獨立的單位。在資本主義的經濟裏面，統治着自然性，無政府狀態的生產，和市場的盲目法則，而這一切情形已經由價格波動和市場各種條件的變動等等，來指揮着個別的資本家和個別的企業的這一些或是另一些措施。

社會主義的國民經濟制度所表現出的，則完全是另一種情景。生產工具的社會公有制，把整個的國民經濟聯合於一個統一的集體中。在這些條件之下，國家的國民經濟，除去按着計劃之外是不可能其他的發展的；社會主義的經濟，除去建立在包括了整個國民經濟的整體的計劃的基礎之上，是不可能存在和發展下去的。社會主義經濟的計劃性質，是從生產工具社會化所產生出來的。對於社會主義社會，國民經濟的計劃已成爲這樣的一種必要性，就有如滿足人們的最日常的需要一樣。

因此，有計劃的實行國民經濟，對於社會主義並不是一個願望的問題或者是一個任意的問題，而是一個客觀的經濟必要性的問題。

按勞動分配的原則，可作爲是另一個例子。在社會主義制度之下，社會生活的領導原則就是：各盡所能，各取所值。在社會主義社會之中，沒有剝削制度，並且所統治着的是生產工具的社會公有制。它是這樣的一個社會：它已達到了生產力發展的某一定的水平，這種水平已高到足以管理它們的程度，將這些生產力掌握在整個的社會手中，和消滅了剝削制度；但它的水平還沒有高到這樣的程度，就是足以保證勞動的高度生產力，足以出產必要數量豐富的生產品，達到實現各取所需的原則，和完全滿足人們的所有一切的消費。

現在問題就是：在社會主義社會存在的這些客觀的條件之下，這個社會的分配應當怎樣解決呢？關於這個問題，只能有一個答案：分配應該按照勞動的原則，生產品應該按照社會成員每一個人所付出的勞動的量和質來分配。例如採取任何其他一種分配的原則，這個社會就不能正常地存在和發展下去，無論是平均的分配，或者是按需要分配，還是按照其他的原則。

因此，按勞動來分配，這對於社會主義社會是一個客觀的經濟必要性。

研究這些例子，更一度地證實了這樣一個結論，就是社會主義的社會，是按照一定的經濟法則生存着和發展着的。在這些經濟法則的基礎之上，就存在着客觀的經濟必要性，而這種必要性是由社會生活的各種客觀條件的總和所指揮着的。

#### 六 關於價值法則的問題

在社會主義制度之下，以前各種生產方式之下所曾經發生過作用的法則和範疇將怎樣處置呢？在過去的政治經濟學講授的實際情形中，在提綱和教科書中，都廣泛地傳播着一種完全不正確的觀念，好像從社會主義革命的第一天起，資本主義經濟的法則和範疇就失掉了力量和停止發生作用了。實際上，事情是比此還更加複雜的。

特別是在講授的實際中和我們的教科用書中，有一個不正確的觀念是已經根深蒂固了，就好像在社會主義的經濟中，是沒有價值法則的地位的。這個觀念，和馬克思主義的經典作家的許多的指示，以及社會主義建設的全部經驗是相矛盾的。大家都知道，價值的法則遠在資本主義發生之前就開始有作用了：恩格斯斷定這個法則的『年齡』，大約在五千年至七千年。在資本主義消滅之後，社會主義社會以自己國家的形式把握着價值法則，並且爲了社會主義的利益，爲了有計劃的領導國民經濟，而自覺地來利用它的機構（貨幣，商業，物價等等）。

說價值法則在社會主義之下不起任何作用的這個觀念，在本質上是違反馬列主義的政治經濟學的全部精神的。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許多著名的意見，指明出他們很知道這個問題是非常複雜的。在馬克思主義的創始者們看來，資本主義變爲社會主義之後，價值法則就會自動地機械地消滅掉和立即消失掉這種思想，是完全不對的。

關於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社會的第一階段的問題，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中曾這樣寫道：

「我們在此地所要講的，並不是說那種如何在自己的基礎之上發展起來的共產主義社會，相反地，我們要講的是那種剛從資本主義社會產生出來的共產主義社會，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經濟方面，風俗方面以及精神方面，還保有着它所從而生產出來的舊社會的許多污點。因此，每一個個別的生產者，他從社會所取回的，（其中除掉各項被扣除的東西）正和他所給與社會的相等。他所給與社會的東西，組成了他個人的勞動量。舉如一個社會的勞動日，是代表了各個人勞動時間的總和；每一個個別的生產者的個人的勞動時間——這就是他們所供給的社會勞動日的一部分，是他在社會勞動日的一部分。他從社會取得一張證明他供給了多少勞動的證券（扣除了他爲社會的儲蓄所供給的那一部分勞動），於是他憑了這種證券，就可以從社會的儲蓄中取得與他的勞動相等的數量的那樣的消費品，他在一種形式中所給與社會的同一勞動，又在另一種形式中取了回來。

「很明顯地，就是此地通行着一個規定商品交換的同一原則，只要這些交換是同等價值的。內容和形式在此地改變了，因爲在改變了的環境之下，除了自己的勞動之外，沒有一個人能供給其他的什麼東西，因此，從另一面講，除了個人的消費品之外，也沒有其他什麼東西可以成爲各個人的私產。但是關於消費品在各個別的生產者之間的分配，就通行着在商品等價物的交換裏的同一原則：某一種形式的同量勞動，可以交換另一種形式的同量勞動」（見「馬恩全集」俄文本第十五卷第二七四頁）。

在「資本論」第三卷的下冊中，我們可以讀到這樣一段話：



「斯托爾赫的話，不僅表現了他自己的意見，同時也表現了其他許多人的意見。他說：「構成國民所得的各種可賣的生產物，在政治經濟學上，必須用兩種不同的方法來加以考察；一方面是當作價值，就它對於個人的關係而來考察；另一方面是當作財富，就它對國民的關係來考察；因為一個國家的所得，不能像個人的所得那樣按照它的價值來估計，而必須按照它的效用，和它所能滿足的需要來估計」。

「第一，把一個以價值為生產方法的基礎，並進而用資本主義形式組織起來的國家，當作一個只為了國民的需要而擇作的集合的有機體來看，這完全是一個錯誤的抽象觀念。

「第二，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消滅之後，但在社會生產仍然保持着的情形之下，價值的決定，仍然會像此前一樣地在這樣一個意義上繼續發生支配作用，這就是說，勞動時間的調節和在各生產個體間社會勞動的分配，以及最後，包括這一切事情的簿記制度，會比任何時候變得更加重要」（見「資本論」俄文本第三卷第七五〇頁）。

實際上，假如我們以為馬克思和恩格斯，能預見到和預先指出為了社會主義的利益而如何運用價值法則的具體的實際的途徑，那就是在對於事實的不合理和死抱着書本的看法了。這些途徑是由蘇聯的社會主義建設的最豐富的實踐所制定出，而為斯大林同志所天才地總結和通俗化了，他指出蘇維埃國家怎樣使得像貨幣，商業及銀行等等資本主義經濟的機構，來為社會主義而服務。斯大林同志關於在社會主義社會條件下資本主義各種經濟範疇的命運問題的指示，是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龐大經驗的理論上的總結與通俗化，並且是馬列主義經濟科學發展上的一個新的階段。這些指示，是斯大林所創造出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重要的基礎之一。

斯大林同志在這些指示中，提供了許多特別新的，不僅是馬克思，甚至也不是列寧所能預見到的東西，這些東西只有在我們國家的社會主義建設豐富經驗的總結與通俗化的基礎之上，才能達到的。

在過去，關於在社會主義之下的價值法則問題的錯誤解釋，使得我們不正確地瞭解許多問題，這些問題不僅作為理論的問題，同時也是作為我們經濟政策的實際問題而特別尖銳地提出在我們前面。在社會主義之下，社會生活的領導原則，就是按照勞動來分配，按照勞動的量與質來分配。這就是說，勞動成為經濟生活中的一個尺度。因此，自然就可以得出這樣一個結論，就是在社會主義之下，價值的法則不但沒有消滅掉，反而是存在着，雖然它是在另一一些條件下，在另一種情況下發生作用，並且和資本主義比較起來是有着很多本質上的改變。

在社會主義之下的社會生活的領導原則就是，各盡所能，各取其勞動的所值。這就要求要使得每一個社會主義生產的工人，能得到在他爲了整個社會的利益而花費了的勞動的量和質上，有着嚴格的相應的報酬。列寧曾講過對於勞動尺度的全民計算與管制的制度，不實現這種制度，社會主義就不能實現的，但是蘇維埃國家對於社會每個成員的勞動尺度與消費尺度的嚴格的計算與管制，怎樣才能實現呢？

最初看起來，最簡便的方法，就是按照時和日來計算勞動，和按照馬克思所稱謂的勞動的自然尺度：勞動時間，勞動小時，勞動日等等。但問題在於社會主義社會的公民們的勞動，在質上並不完全相同的。在此地，它和共產主義社會的成員的勞動比起來，有着許多本質上的特點。這些在社會主義之下的勞動的特點，是從下列許多情況中產生出來的。

在社會主義之下，已經破壞了城市與鄉村之間對立的基礎，已消滅了工人階級和農民之間的根本

區別，但是城市與鄉村之間的差別，工業和農業之間的差別，工人和農民之間的差別，依然還存在着。這些差別在勞動代價的支付上可以看出來，這因為工人和職員所拿的是嚴格規定出的——大部份是按件的——工資，而集體農民所得到的，則是按照勞動日計算的，其中一部分還是實物；此外，集體農民還有着自己個人的副業。

更進而在社會主義之下，智力與體力勞動之間多少年來對立的最深的根源已被破壞，但體力與智力勞動之間的差別是存在着。某一類的工人需要很多的學習，另一類的工人只需要較少的學習，換句話說，就是在熟練的和不太熟練的勞動之間，如各種熟練程度不同的勞動之間，還存在着差別。有一種形式的勞動在技術上武裝得很好，另一種形式的勞動在技術上武裝得較差；在各種不同的生產部門裏勞動機械化和生產電力化水平是不同的。

這一切都指出，就是這一個工人的勞動時（或日），並不等於另一個工人勞動時（或日）。因此，在社會主義的社會裏，勞動尺度和消費尺度只有在運用價值法則的基礎之上才有可能實現。各種不同形式的勞動的計算，以及其比較，就不能直接地，靠了「勞動的自然尺度」——工作時實現出來，它應該是曲折地，靠了勞動生產品——商品的計算與比較的方法而實現出來。社會主義社會成員的勞動，創造出了商品。在社會主義經濟中的勞動生產品，一方面，是有着使用價值，這就是說：是滿足社會這一些或是另一些需要的必需的物質生活品，另一方面，社會主義勞動的生產品，是有着價值的。因此，就必需利用像商業，貨幣等類的機構，作為有計劃的社會主義經濟的工具。社會主義的出產品，經過了商業，這就是說，在貨幣的幫助之下轉到消費者的手裏。工人和職員的勞動的支付，是用貨幣表現的，集體農民的勞動日，同樣地，大部分也是拿貨幣來支付的。除此之外，集體農民還

可以從他所賣了的部分的生產品（這是按照勞動日用實物付給他的）和副業而得到貨幣。勞動者用他們的貨幣收入，就可以去購買商品。

過去講授政治經濟學的許多錯誤，特別是否定了社會主義社會中價值法則的作用，就使得在解釋社會主義制度下的像貨幣、銀行、信用等等的範疇，發生許多難以克服的困難。瞭解了社會主義制度下的價值法則的作用和意義，就可以確切闡明所有這一切問題，指出它們和在社會主義之下價值法則發生作用的一件事有着邏輯上的聯繫，同時還可以指出那些和在社會主義之下價值法則的作用相編聯的許多本質上的特點。

在蘇聯有計劃的社會主義經濟之中的商品，是種買與賣的對象，它們是有價格的，而這些價格就是它們的價值在貨幣上的表現。因此，就發生了商品的價格及其價值在量上的不相符合的可能性。出賣的主要大部分的商品，都是屬於國家及其機關，以及屬於合作社的。在此地就包括了徹底地是社會主義型式的企業的全部出產品，和集體農場及工業組合的屬於社會經濟的那一部分的出產品，以及集體農民的個人的副業，個人經營的農民和不屬合作社的手藝人的出產品，後面這一部分人的出產品，是經由必要的賦稅，交納實物和收買等等的形式而受國家和合作社的支配的。可是有某一部分商品，還是由個別的公民在未組織過的市場上出賣的。在此地就包括了集體農民的個人的副業的出產品，個人經營的農民和手藝人的出產品，以及集體農場中屬於社會經濟的那一部分的出產品，最後一種出產品是按照勞動日用實物分配的，所以集體農民就可以拿到市場上去出賣。大家都知道，這些商品是按照市場上所形成的價格而出賣的。因此，在蘇維埃的經濟中，實際上是存着兩種市場，兩種物價。

利用了價值的法則，蘇維埃國家就爲自己提出了一個目標，就是按照社會地用在商品生產上的必

要的費用來規定商品的價格。在規定價格時，既要顧及到社會主義積蓄的任務，同時又要注意到提高勞動羣衆的物質幸福和文化水平的任務。而生產的社會的費用，就成了規定價格時的一個出發點。價格是包括了商品生產的全部費用，這就是說，包括了在社會主義企業中所出產的商品的全部價值。商品的價格規定，有時是遠離開它們的價值，而是按照它們和擺在蘇維埃國家之前的這一些和另一些任務的關係，以及根據某種一定形式的商品，在生產的某種高漲與社會需要的情形下出賣的數量而定。

在屬於蘇維埃國家手中的有組織的市場，與自流性的市場之間是有着鬥爭的。爲了能整個地管制所有的市場，爲了要完全可能地指揮市場上的價格，蘇維埃國家就應該有着龐大數量的商品和各種形式的商品的龐大的儲藏以供配置之用。

我們要記得，就是社會主義社會中生產出的商品，它一方面是有着使用價值，另一方面是有着價值，這種情形在有計劃的社會主義的經濟中，是具有着本質上的意義的。

國家的經濟計劃，首先就預見到一個企業生產某一種出產品，換句話說，就是生產某些一定的使用價值。同時在實行計劃時，又要注意到生產的勞動與原料費用的某一一定的水平，換句話說，這就是出產品的一定的價值。有計劃的任務，在決定企業中實物與價值的指數的生產綱領時，它既要注意到商品的使用價值，也要注意到商品的價值。

在蘇維埃社會裏，商品的種類及其質量的問題，是整個國家的事情，並且是受到國家的嚴格地管制的。這就要考慮到作爲社會主義生產的出產品的商品之使用價值的問題。而在有計劃的社會主義的經濟中，商品價值的問題也是具有不小的意義的。

在社會主義制度之下，有計劃地領導國民經濟的必要的�方法，就是實行成本會計經營制，這種制

度是建立在自覺地運用價值法則的基礎之上的。

社會主義的經營，一方面是根據於勞動與物質資料的費用的精確的計算，另一方面是根據於生產的結果而定，這種比較，是存在於每一種社會主義的企業裏面的。但是在每一個相當的時期中的企業的費用，和在這一個時間中整個生產出品數量的比較，就不得不用一個公同的代表物來表現這些出產品的費用和結果。這樣的一個公同的代表物，就是商品的價值。成本會計制是建立在這一個基礎上。就是生產的費用和結果要用價值的形式表現出來，換句話說，就是用一定數量的貨幣表現出來。在社會主義社會中的商品的價值，並不是由各個人實際上用於商品生產的勞動的費用來決定的，而是按照商品的生產與再生產時社會地所必需的勞動的數量來決定的。嚴格地實行成本會計經營制，就是揭發和根絕各種不必要及不生產的支出與損失，以及各種形式的「不經濟」的一個工具，並使得在這個企業中的個別的一些生產費用減至最低限度。

在社會主義的社會中，勞動的生產品是商品，它是具有使用價值和價值的。這就是說：在社會主義社會中的勞動共有兩方面：一方面是具體的生產出使用價值的勞動，另一方面是抽象的，用於社會生產所用的整個總和的勞動中的一部分的勞動。

但是這種勞動的兩重性，與私人的和社會的勞動之間的矛盾已無聯繫，因為這種矛盾只是建立在私有財產制度基礎之上的商品生產的特點。在社會主義企業之中的個別的工人的勞動，是直接地具有社會的性質的。每一種有益的勞動的支出，都不是經過迂曲的道路，而是直接地組成社會勞動的一部分，同樣地，這種社會勞動是按着整個國民經濟的規模而有計劃地組織起來的。因此，在此地就克服不了商品生產的這樣一種特性：用在有用物品的生產中的勞動，也許對於社會是不需要的，它無法得到

社會的承認，以至生產出的商品賣不掉。在私有財產制度統治的基礎之上，商品生產者只能平均地，經過無數的偏向與破壞而在交換的過程中，獲得他們所付出的勞動的補償；而在資本主義之下，作為資本主義生產法則的生產者對於自己的勞動出產品的私有權，已為資本家能搜得其他人的不付費用的勞動的出產品的權利所代替了。在社會主義社會中，每一種對於社會有益的勞動的支出，都可以得到社會的報酬的。

作為社會主義的出產品的商品，已經不再包含着那些和作為小規模商業生產和資本主義生產的出產品的商品不可分離的矛盾了；也已經不再包含在使用價值和價格之間，以及在私人的和社會的勞動之間的矛盾了。因此可以說，它已經不是資本主義制度中的那許多矛盾的體現者，而這些矛盾的進一步發展，必然會引起資本主義的剝削和經濟危機等現象發生的。

因此，我們就沒有任何理由，說在社會主義的國民經濟制度中，價值法則已被消滅。相反地，它在社會主義制度之下還發生作用，但它是在另一種改變了的形式之下發生作用的。在資本主義之下，價值的法則是市場上的一種自然的法則，它不可避免地要受生產的破壞，經濟危機和生產的無政府狀態的影響的。但在社會主義之下，它是作為由蘇維埃國家在國民經濟有計劃進行的條件之下。在經濟發展沒有危機的條件之下，自覺運用的法則而發生作用的。在有計劃的社會主義經濟中，價值法則作用的改變，首先從這一點可以看出，就是價值法則，已經不受在各種不同使用價值的部門（即生產）之間的社會勞動與生產資料的自然分配的秩序所統制了。在社會主義的社會中，在生產各個部門之間的基金與勞動的分配，是按照有計劃的秩序，再配合社會主義建設的基本任務而發現出來的。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國民經濟各個別部門發展時的那些比率 and 均衡，和在資本主義制度條件之下由市場的自然

力量來規定的那些比率 and 均衡，是有着根本的不同的。

更進而在資本主義下，價值法則是經由平均標準的利潤而發生作用的；在社會主義的國民經濟制度之下，平均標準的利潤已失掉了它的意義。在資本主義之下，平均標準的利潤會得出這樣一個結果，任何企業所產的利潤低於平均利潤，那麼這個企業就會破產，最後以至停業。因此，資本家們就帶着他們的資本，羣趨向那些利潤高的生產部門中去。

在社會主義社會中，絕大多數的企業，組成了全民的財產，這就是說：屬於唯一的主人——蘇維埃國家的。因此蘇維埃國家就能從此進行生產，這種生產是爲了社會主義的根本利益爲出發點，而不是根據那一個不發展最初就遭到損失和不產生利潤的生產部門的法則的。

我們的冶金工廠，曾經很長一個時期都是損失的。最初的利潤，是基洛夫瑪開耶夫工廠在一九三五年才得到的。更晚一點，瑪格尼托高爾斯克和庫斯奈茲克聯合工廠也獲得了利潤。冶金工業在第一個時期，全靠國家的領導。假如在我們國家存在着的不是蘇維埃的制度而是資產階級的制度，那我們國家早已就變成一個沒有重工業骨肉的國家了。並且這就是說，在戰爭的時候，它一定會成爲敵人們最容易取得的犧牲品了。大家都知道，如帝俄時代，冶金工業是靠了沙皇政府的支持而發展起來。但雖然有着這一切的支持，冶金工業依然是國民經濟中的最弱的一環。我們粉碎了資本主義的法則——平均標準的利潤的法則。消滅資本主義的利潤和廢除了生產工具的私有制，蘇維埃國家就創造出一個有威力的工業的基礎，沒有這個基礎，從戰爭的關係方面講起來，我們國家在敵人面前就變得手無寸鐵了。

在社會主義條件之下的這種價值法則的特點，不僅僅具有巨大的理論上的意義，同樣地也具有巨



大的實際上的意義。

價值的法則只有在共產主義的高級階段上才能被克服，那時候勞動生產力儘可能地發展，而社會也享有非常豐富的出產品，足以過度到按需要多少而分配生產品的制度。

因此，我們就可以看出，在社會主義經濟中，價值的法則已不是一種支配生產的自然力量，因為社會的生產是按照計劃而發展的。更進而，由於在社會主義中統治着生產工具（工廠，工場，機器拖拉機站，集體農場等等的裝備），都已經不再是商品了。在蘇聯，土地是有貨幣上的估價的，但它並不是買賣的對象，所有其他的一切生產工具都有價值，這種價值是用貨幣的估價表現出來的，但它們並不是買賣的對象，而只是按照蘇維埃的法則與國民經濟的計劃所預定的秩序，從生產者的企業，轉移到消費者的企業的手中去。在生產工具私有的統治之下，價值法則的作用必定會引起資本主義剝削制度的發展；而在社會主義的社會中，生產工具的社會公有制的統治，則阻止了剝削制度的發生。

#### 七 關於在社會主義條件之下的剩餘生產的問題

在過去講授政治經濟學的實踐中，關於在社會主義條件之下的剩餘生產品的問題，時常是紊亂不堪的。教師們也往往這樣說，好像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剩餘生產品是不存在的。當然，這是完全不正確的。

馬克斯在「資本論」第一卷（第十五章）中，曾發表過這樣的意見：

「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廢除，勞動日就可以限制到僅限於必要的勞動。但在這種情形之下，由於其他的各種條件，必要的勞動應該擴大它的範圍。因為一方面，工人的生活條件應該變得更加富裕，他的生活的需要也應該增長起來。從另一方面，現在作爲剩餘勞動的一部分，那時就會被

轉入必要勞動，因為這種勞動，爲了造成社會的準備基金與積蓄基金是非常必要的。」  
在此地有一件有趣的事可以指出的，就是在法文版的「資本論」，最後的句子是這樣的：

「同時不應該忘記的，就是現在作爲剩餘勞動的這一部分，並且正是這一部分用於形成準備基金和積蓄之用的，那時候就被視爲是必要勞動了，而目前必要勞動的廣度，只是由於僱傭工人階級所支出的能力所限制着的，並且這些僱傭工人是被迫了去爲自己的主人們生產財富的。」

這樣看來，馬克思的意見是很明顯的。這個意見總括起來說，在消滅了人剝削人的制度之後，剩餘勞動正像必要勞動一樣，對於社會是同等必要的；而並不是說，那時候滿足像形成社會準備基金與積蓄基金那些社會的迫切需要的剩餘勞動的要求，就會完全消失了；在馬克思著作中所指出的社會準備基金與積蓄基金，是整個社會需要的實例，在社會主義制度之下，它們的意義不僅沒有減少，甚至還更加增長了。

更進而，在「資本論」的第三卷中，馬克思又直接指出，在轉變到社會主義制度之後，是有着保存剩餘勞動和剩餘出產品的必要性的。最後，他在「哥達綱領批判」中，更詳細地講過這個問題。

在揭發了拉薩爾派反動的烏托邦觀點時，馬克思詳細地討論過「不折不扣的勞動所得」的口號——這是小資產階級的烏托邦的要求「有權享有全部勞動出產品」一個口號的拉薩爾式的再版。馬克思揭破了這個要求的不合理和錯誤的地方。他指示出總合的社會出產品是由什麼東西組成的，並且又怎樣再分配的。在還沒有講到個人的分配的問題之前，從整個地總合的社會出產品中，必需扣除掉：

「第一、作爲那已經消費掉的生產手段的補充之用的。

「第二、爲了擴大生產的補充部分。

「第三、作爲預防不幸的變故和自然的災害等等的預備或保險基金用的」（見「馬恩選集」一九四〇年俄文版第二卷第四五一頁）。

照馬克思的說法，在扣除掉這一切東西之後，剩餘下來的一部分總合的出產品，就預定作爲各種消費用的。但從這一部分裏面，在還沒有供個人的分配應用之前，必需扣除掉：

「第一、一般的不屬於生產的管理費用的。

「這一部分一開始和現在的社會比較起來，是大大地減縮了的，並且跟着新社會的發展的程  
度而更加減少。

「第二、屬於滿足公共的需要的，如學校，保健機關等等。

「這一部分一開始和現在的社會比較起來，是大大地增長起來，並且跟着新社會的發展的程  
度而更加增長。

「第三、作爲無能力勞動者等等的基金——這就是今天屬於所謂官辦的慈善事業（見同書）。

我們很容易看出，就是馬克思所預見的這一切從總合的社會出產品中扣除的部分——除去補償消費掉的生產手段之用的部分——只能拿社會主義社會成員的剩餘勞動來補償的。並且實際上，剩餘勞動（指超過直接滿足勞動者個人需要之外的所必要的勞動），在任何制度的社會中，都應該永遠存在着的。社會主義在我們國家裏消滅了人剝削人的現象。它消滅了寄生者和剝削者階級專有剩餘勞動，剩餘出產品和剩餘價值的情形，社會主義在蘇聯結束了不勞動階級的寄生的消費，這些階級是專掠奪工人和農民的剩餘勞動的成果的。但同時在社會主義之前存在着巨大規模的任務，要解決這些任務，蘇聯的每個工人，農民和知識份子不拿出剩餘勞動，那就不可思議了。

在社會主義之下，社會勞動的出產品的相當部分，是應該有系統地用於積蓄的目的。這是擴大再生產的最重要條件，它的重要性，不僅是指滿足勞動大眾的不斷增長的重要性，也是人口自然增加所使然的。由於這種從每年總合的社會出產品中相當部分的積蓄，換句話說，就是從每年社會剩餘出產物中相當部分的積蓄，在蘇聯就實現了龐大的建設。

更進而，剩餘出產品的某一部分，是用於補償整個全社會的目前的需要的。我們只要指出鞏固蘇聯國防力量的支出，就知道它對於我們國家的意義了。正因為蘇維埃政權有洞察力和遠見的政策，能供給紅軍以它所必要的現代作戰技術，而在他國建立了強有力國防工業，這個現代作戰技術的鑄冶廠，在偉大的考驗的年中，就拯救了我們的祖國。某一部分的剩餘勞動，用到實現蘇聯公民的權利上去，如教育權（建立小學校，大學和圖書館等），休息權（療養院、休養所等）疾病與年老的安全保證權（醫院、藥房，養老金等）。

從這一切就得出這樣一個結論，就是在社會主義之下，勞動者應該以自己的勞動——超過他們為自己個人的生產以上的勞動——生產作為滿足整個社會需要的許多東西，這就是剩餘出產品。作為社會主導力量的工人階級，不能不關心到滿足各種社會重要的問題，因此，在社會主義制度之下。勞動者應該比滿足他們個人的直接的需要還更多地工作。這從我們這次戰爭的條件中，更特別清楚地和明顯地看出來，在後方幾十個蘇維埃的愛國主義者幫助紅軍的自我獻身的勞動，就使他們能戰勝敵人。因此，在社會主義社會中，剩餘生產品是供整個社會用的，是爲了滿足所有的社會的需要的消費的。列寧曾經指出：在社會主義社會中，「剩餘生產品並不是歸於私有產者的階級的，而是歸於所有勞動者，並且只是歸於他們的」（見俄文本「列寧論文集」第九卷，第三八二頁。）

(附註：這篇文中的許多小標記，都是譯者加上的，至於文章中所引用的馬恩列甯等人的文字，凡已有中譯的，都間或覺出作爲參考之用，但爲了行文和忠實於本文的原文起見，大體上都重新譯過。文章中有許多專門名詞，至今尚無妥當的中譯，因此這些譯名或尚有不確當之處，容日後再爲改正。同時值得提及的，就是這篇文章是篇理論的文章，其中有個別的部分相當艱深。因之在譯文上也時有費解或語句不順之處，這是要讀者原諒的。——譯者)

## 十一、關於「蘇聯立國精神」答客問

孫科

問：自從希特勒發動侵略戰爭開始，歐洲大陸十幾個國家都不能抵抗他的兇鋒，只有蘇聯苦戰三年，轉守爲攻，轉敗爲勝，不但驅逐敵人出境，而且現在已經直入波蘭和東普魯士——蘇聯之能成爲摧毀納粹德國的第一支主力軍，究竟爲什麼？

答：因爲在大陸上只有蘇聯的軍事力量最強。

問：蘇聯以什麼方法強大它的軍事力量？

答：蘇聯除了軍事訓練、軍事動員、武器補充、防禦工事等都非常精強，使其能經常達到勝過敵人的水準以上外，更能隨時確定最正確的戰略，提高巧妙的戰術，以不斷地增進自己的軍事威力，保持永遠壓倒敵人的優勢。

問：這似乎是軍事上必具的原則，德國方面也可以理解，問題是爲什麼蘇聯就能做得如此完滿？

答：這就不專在於軍事本身，而是因爲蘇聯能使它的政治、經濟、外交等等完全與軍事配合一致，真正做到「全體戰爭」的程度。

問：希特勒不是也驅使了德國一切的力量爲了他的侵略戰爭嗎？

答：是的。但最後的效果必定是總崩潰，而蘇聯最後的效果却是總勝利；這原因就在於蘇聯的立國精神之根本不同了。

問：蘇聯的立國精神是什麼？

答：蘇聯這一國家創造的歷史，建設的方法，以及對國內國外的種種措施，至今還不免有些人不完全理解；其實在它自己是以簡潔始終一貫的。我以爲蘇聯立國的基本精神有三種——

(一) 革命與進步的精神；

(二) 民主與團結的精神；

(三) 和平與戰鬥的精神。

問：請依次解釋一下，好嗎？

答：蘇聯共產黨組織工農，領導全俄大多數人民。以最勇敢最艱苦的長期奮鬥，推翻沙皇，建立蘇維埃聯邦，方向始終正確，態度始終堅決，這是革命精神。他們能一面徹底肅清國內的反革命力量，一面打退當時十幾國的軍隊，決不屈服於國外的壓力，這也是革命精神。但是僅止於此還不夠。革命政權建立以後，還要一個五年，兩個五年，三個五年的計劃，改進農村，建立集體農場，發展大規模重工業，力求經濟生產上進步，頒佈新憲法，完成高度的民主政治制度，力求政治上進步。剷除文盲，普遍設立學校，提高各民族人民的智識，發展新的文學、美術、電影、戲劇和自然科學、探險事業等等，力求教育文化上的進步。以最大的力量努力國防事業、軍事訓練、強化陸空海軍，力求軍事上的進步。此外，在外交上，協助弱小民族，參加國聯，號召集體安全，與各國訂立互不侵犯條

約、互助條約，首先主張制裁侵略，保障世界和平，最後與美英中國等反侵略國家合作，最堅決的打擊德寇，以求得國際地位的進步——這都是全世界人所共見的事實。人類原是為了進步才需要革命；所以革命以後更須要不斷地進步；如果起初以革命而取得政權，取得政權以後便停止進步，反對進步，那正是希特勒所以失敗的理由了。所以革命與進步在實質上是一個不可分的基本精神。

問：革命與進步誠然是蘇聯立國的第一種特質，但革命是一種力量，進步也須要力量；蘇聯是怎樣才能鞏固和擴大這種力量的呢？

答：這就是全靠他們的民主與團結的精神了。蘇聯名為「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但所謂無產階級專政的目的，是為了消滅國內階級的對立存在。就是要把壓迫剝削大多數人民的地主階級，資產階級，即是他的當時少數的特權者打倒，這樣才能實現最大範圍的民主政治。如果國內還有沙皇時代的特權階級，便存在着政治社會上的衝突。人與人不能平等互助而相處，試問怎樣能團結一致而成爲一種牢不可破的力量呢？現在蘇聯人民，不分男女，凡年滿十八歲者，除精神病者以及由法院判決在一定期間內褫奪選舉權者，都有普通、平等、直接、秘密投票的選舉權；蘇聯憲法並保證人民有先期撤回代表之權（類似我們所說的豁免權）。蘇維埃代表成了人民的公僕，蘇聯真正實現了我們國父所說的「主權在民」的理想。蘇聯人民所獲得的言論、出版、集會、示威遊行、結社、身體、居住、通訊、信仰等自由，非但有法律的確定，而且有實際的保證。此外，蘇聯憲法還規定人民獲得勞動權、休息權與教育權。因此在蘇聯國內，已消滅了失業和文盲的現象，人民的身體精神都是非常健全。享受着政治自由生活幸福的蘇聯人民，誰願意斷送自己的權利而受希特勒的奴役與虐殺？因此他們才每個人都要爲了保護自己可愛的祖國而拚命。這是政治上以民主制度所造成的團結。希特勒以爲蘇聯人

民必有許多不滿於他們的無產階級領導的政權，一經戰爭，便會引起內部矛盾，這完全看錯了。蘇聯在民權平等以外，還能實行民族平等。自十月革命以後，蘇聯國內各民族間便沒有了壓迫與被壓迫的區別。當年帝國時代除大俄羅斯以外，各民族政治地位既極低弱，經濟文化生活也很落後；可是現在都在隨年逐月地發展起來。一九二二年，各蘇聯共和國自願結合成爲『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蘇聯憲法第十三條規定：『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爲各平權蘇維埃社會共和國按自願聯合原則所組成之聯盟國家』。整個蘇維埃聯邦是每個聯邦都參加政權共同統治的，由於『自願』，才有堅固的聯合；有了『平權』，才能鞏固民族的友誼。希特勒的入侵，使蘇聯一部份民族喪失了自由平等的生活，剝奪了他們的自由平等的地位，斬斷了他們經濟文化的發展，蘇聯各民族人民自然會更加團結起來抵抗公敵。以爲紅軍一失利，就會使蘇聯各民族發生分解，這又完全是希特勒的妄想。我敢說，對於國內民族問題之解決，蘇聯在今日世界上是最成功的；而所以能成功的原因，是由於他們實行民族間的民主制度。民族間有民主才能有團結。至於民生方面，大家都曉得，蘇聯二十幾年來的刻苦建設，使他們的國家經濟力量已超過了歐洲各國，僅次美國，全體的人民的生活都一律得到豐衣足食，無有剝削人的富有者，也無有失業的貧困者，更絕無所謂社會經濟恐慌這個名詞。這原因是在於他們能夠做到了『各盡其能，各取所值』。全國任何人在經濟上都一律平等，平時毫無苦樂不均的怨望之心，大家休戚相關，安危與共，敵人打來之後，斷沒有少數人發財，多數人受難的事，這就是經濟上民主制度造成的團結。總起來說，無論是民族、民權、民生那一方面，沒有民主就不能團結，沒有團結就不能打勝敵人；民主與團結便是蘇聯立國的第二種基本精神。

問：蘇聯完成革命，鞏固和發展國內力量，確是已經成爲無法否認的事實。但大家都知道在這個



世界上和蘇聯性質不同的國家還是很多，力量很大，而且國際變化又是非常複雜；任何國家都不能離開國際環境而閉門孤立生存，有人說蘇聯原是想一氣呵成完成世界革命的；他所說的「一國之內建立社會主義」，不過是一時的手段；目前與盟邦合作，也不過是渡過今日難關；戰勝之後，蘇聯仍要向外推行社會主義革命運動。甚至於有人說蘇聯既有如此強大力量，就很難保他沒有領土野心。在另一方面，蘇聯在過去，現在，以至於將來，常不免受人疑懼：或要防範他，或要孤立他，或要侵害他。但事實上他是越來越堅強了，這到底又由於什麼原因，他將來究竟怎麼辦？

答：這個問題是極重要的，不但我們應該要認識清楚，全世界的人也應隨時注視着，需要深切的理解。蘇聯自己對這問題的解答便是他立國的三種基本精神——和平與戰鬥。首先應說明的蘇聯由國內經濟制度的規定，無私人資本的發展，無人民失業的恐慌，無殖民地的需求，所以他根本上無侵略別國的必要。所以他若干年來常在聲明無領土野心。同時，他既主張弱小民族解放，又反對帝國主義，尤其他自己必須在一無戰爭的世界中才能安定地生存，他也不想別人的戰爭中乘機取利；所以他堅決反對任何種侵略戰爭，主張世界各國和平相處。我們 國父在二十年前便說過蘇聯「這種新政策不但沒有侵略各國的野心，並且抑強扶弱，主持公道。」這是真知灼見的話。最近蘇軍追擊德寇，直入波蘭，波蘭人民在解放的地區建立起自己的民族與民主的新政權；蘇聯的外交委員會便立刻發表聲明說：「蘇軍進入波蘭領土，充滿了單純的決心——擊潰德意志敵軍，並援助波蘭人民，從德寇羈絆之下解放出來，使獨立的強大的和民主的波蘭復興」。『蘇聯政府是不打算在波蘭領土上設立自己的行政機構，認為這是波蘭人民的事情』。『決不追求關於獲得任何部份的波蘭領土，或關於變更波蘭社會制度的目的』。『紅軍在波蘭領土上的軍事行動，專為戰爭的必要，專為援助友好的波蘭人民從

德軍佔領下獲得解放而迫於不得已」。像這樣具體而切實的自白，還不可以得到波蘭人民和全世界的放心嗎？我相信蘇聯對波蘭如此，對別的國家也一樣。至於過去如捷克被侵的時候，蘇聯主張和法英共同保障捷克，以後又主張和英法及各國共同制止納粹發動侵略戰爭；這都是爲了維持歐洲的和平。到了蘇聯與各盟國并肩作戰以後，第三國際宣佈解散，蘇聯毅然同意，也是爲了使全世界各國對所謂世界革命問題都能放心，而消滅法西斯挑撥的謠言，以增強各盟邦之團結。蘇聯自己是相信共產主義而施行蘇維埃制度的國家，如果有別的民族由自己全體人民的民主決定而採取和蘇聯同樣的主義與制度，乃至於自願加入蘇維埃聯邦；他必不拒絕。如過去立陶宛、拉脫維亞、愛沙尼亞三小國之實例。但蘇聯決不以武力強制別人效法自己，或以陰謀去顛覆別人的政權。他必須尊重別國人民對自己國家政治制度的選擇自由。他最多是幫助別國抵抗外患，自力更生，如對我們中國革命與抗戰之所行，就是一個最好的實例。蘇聯最高蘇維埃決議各加盟共和國賦有編置各自的軍隊和對外建立直接關係的權力，把國防、外交兩人民委員會，從聯盟的變爲聯盟與共和國的人民委員會；這樣一來，蘇聯如要對外作戰，除非是保衛祖國的神聖戰爭，決難獲得十六個加盟共和國的一致的同意。所以這種措置，也充分表示蘇聯沒有侵略野心。

問：照此說來，蘇聯竟是一個善良的和平使者了。

答：雖然是善良，是和平，却絕不是一個無觀察力的愚人，無抵抗力的懦夫。有人說：「對於蘇聯，你若和他做朋友，和他交好，他是你最忠實的朋友；你若和他做敵人，侵害他，也就是你最忠實的敵人。」這話是對的。誰要使他無端的「從火中揀栗子」，他決不上當。誰不先去打他，他決不先打別人。所以他可以在希特勒未攻他以前和德國訂立互不侵犯條約，而決不先發動攻德；但同時他

早準備被任何人攻擊時的抵抗力量；等到一旦德國向他進兵，他便一口氣打到底，比任何一個國家打得英勇，打得厲害。在莫斯科，列甯格勒，斯大林格勒圍攻最危險的時候，他只知道盡全力，死命奮戰，決無絲毫動搖，終於把國家存亡所繫的三個城市，作了反攻致勝的發動點。在戰爭中，他常請求盟邦接濟軍需，更常呼籲開闢第二戰場，這是他深知非大家合力不足以提早把納粹德國擊潰；但應該他自己做的事一絲一毫不放鬆自己，決沒有妄想因人成事或嫁禍於人。所以他能成爲這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擊潰第一個強盜的第一支主力軍，成爲使盟邦終獲勝利的第一種決定因素，毫無愧色。事到如今，全世界的人都應該知道蘇聯民族真是一個不取巧，不畏難，「禁硬寨，打死仗」的鐵漢子了吧！戰鬥而不爲了和平，是強盜；只和平而不能戰鬥，那是甘受宰割的綿羊。蘇聯是根本主張和平的，但和平必須以戰鬥來支持它。蘇聯爲了和平，爲了自衛而戰鬥；他不怕侵害蘇聯和破壞和平的任何敵人；同時除了爲着和平，爲着自衛，他也決不使用戰鬥，別人也不必疑慮他無端的侵害。我們但看近年來蘇聯和各盟邦——尤其是和美英的合作關係越來越密切，便可以曉得他完全是以自己的和平與戰鬥的精神換取得來的成果。從前有些人常在懷疑蘇聯與英美關係會不會中途變壞；德寇又常常散佈謠言說蘇聯將要與德國中途媾和，現在都被事實否定乾淨了。至於大戰之後，我相信蘇聯也一定本着過去一貫精神，一方面努力求自己的經濟恢復，力量的更加鞏固，文化的更加提高；而另一方面也要與各盟邦共謀世界的永遠和平，而決不許再有什麼所謂「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決戰」之發生。

問：日本帝國主義是蘇聯敵人德國的朋友，是蘇聯朋友中國美國英國的敵人，可是蘇聯至今還和日本維持中立的關係，這怎樣解釋呢？

答：凡是施行侵略反對民主的力量，從本質上講都是蘇聯的敵人。但軸心的領導主力是納粹德

國，直接打進蘇聯內地威脅蘇聯生存的是德國。蘇聯竭盡全力，還必須美英一致夾擊，才能戰勝德國，如果德國勝利，日本雖然敗亡，也終會變成法西斯世界，如果德國敗了，日本終無獨勝之可能。這就是蘇聯必須集中力量打擊德寇的理由。而這一戰略是爲英美所共同認識的。如以蘇日關係而論，日本自然願意緩和蘇聯，不先發動攻蘇，以免多增敵人，在蘇聯則一面維持着不先發動戰爭的法則，一面却也經常準備着張鼓峯教訓日本的力量。現在西戰場的勝利結束不久就要來了。美軍對日本本土英勇的大規模的進攻，一天逼緊一天；而美蘇關係之緊密，蘇聯輿論對日本帝國主義者之斥責，都是大眾所共知的。說蘇聯會在消滅德寇之後，還坐視東方存在着另一種侵略力量，以爲毒害於明日的和平世界，那是他立國精神所能容許的嗎？

問：蘇聯的立國精神與我們中國的立國精神比較起來怎麼樣呢？

答：蘇聯是社會主義國家，中國是三民主義國家，在革命過程與建國制度上說，當然有不同之處。但若就兩國的基本精神而論，那應該是一致的。中國是以革命建國的，中華民國的成立還在蘇埃聯邦成立之前，然而革命工作沒有澈底，進步程度趕不上需要。我們今日既須加強革命精神，更須力求政治經濟文化軍事各方面的切實進步，這是不能諱言的。中國的三民主義本是百分之百的民主路線；而爲了抗戰勝利建國成功，更非全民族各階層實行平等自由的團結不可。必須民主才能真團結，必須團結才是真民主，這也是一樣的道理。今天有誰在說中國應當不給人民自由，不許國內各民族平等，要使得社會貧富階級對立，各黨派關係分裂嗎？這民主與團結的精神，正是解決中國一切問題的基本要素。第三，中國過去主張世界和平，現在正爲和平而戰；將來更要求世界的永久和平。自然我們的戰鬥力量比不過蘇聯和美英；但如果真能發揚革命精神，力求進步，實行民主政治，力求團結之

堅強和平與戰鬥的信念；效法蘇聯，使政治經濟一切一切的力量都與軍事配合一致，不要把「軍事第一，勝利第一」只當一句空口號。那麼全中國軍民的戰鬥力量自然會很快的加強起來。蘇聯的成功與勝利的另一種祕訣，便是常肯檢討自己的缺點，虛心學習別人的長處，以不斷地增加自己的力量。當年我們的國父，曾教我們學習蘇聯的革命；現在我們更要學習他的建國與抗戰。尤其是首先認清蘇聯立國精神既然與我們根本上一致，就可以確信中蘇兩國關係必須更密切，更合作，把那過去許多無理解的猜疑，澈底掃蕩清楚，以求共同努力躋登於世界和平之大道。（中蘇文化十五卷六七期）